

LIVING AGE

新

聞

創刊號

目 要

發行者的話
 西南經濟建設的瞻望
 日本經濟發展的特點
 對於『新啓蒙運動』的檢討
 法西斯治下的意大利文學
 馬克思的情詩
 我們怎樣參加西班牙的內戰

華盛頓印刷出版公司

The Alexander Publishing and Printing Company.

目錄

第一期

| | |
|--------------|----------------|
| 發行者的話 | 白克孟 |
| 卷頭語 | 全人 |
| 世界動向 | 鳳岡 |
| 西南經濟建設的瞻望 | 陳育才 |
| 日本經濟發展的特點 | 梁石生 |
| 對於『新啓蒙運動』的檢討 | 南冠 |
| 法西斯治下的意大利文學 | 雙山 |
| 馬克思的情詩 | 三男譯 |
| 安那其主義在中國 | 張道同 |
| 窮巷的一年(小說) | 謝少翁 |
| 我們怎樣參加西班牙的內戰 | 克利維次基作 劉素英譯 |

動向 (每月二十五日出版)

第一卷 第一期

民國廿八年七月二十五日出版

編輯者 張瑞清

發行者 白克孟

出版者 上海海寧路華真坊三號
美商華盛頓出版印刷公司
電話四三一九〇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店

定價 零售每册一角五分
預定全年壹元五角

(本刊已呈請工部局登記)

THE LIVING AGE

Today is an age replete with scientific wonders, with new processes, with new ideas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Day by day, history unfolds at a breath-taking pace. The menace of war hangs over the entire world and a new, world-wide conflict draws inexorably nearer, threatening to wipe away all progress.

Into this vibrant era we launch "The Living Age." It is the aim of the publisher to give to readers not just another magazine. Rather is it the aim to give them a new kind of magazine: a magazine which fearlessly probes the contemporary era in all its phases. It is our aim to present authoritative and stimulating articles on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rt, literature, science, and history. The rich, historical past will not be forgotten, the present will be chronicled, and what lies ahead—though we are no prophets—will be charted with the aid of our knowledge of the past and present. The contents of the magazine will be presented by competent Chinese writers, and, when pertinent, translations from foreign languages will be published.

The Alexander Publishing and Printing Company is a new name on the Chinese literary horizon. In its few months of existence, several books have been published bearing the Company's imprint. The publisher hopes that "The Living Age" will live up to the motto of the Company: "Reading Material with a Purpose."

Alexander H. Buchman

Alexander Publishing and Printing Company

發 行 者 的 話

現在是一個充滿了科學的奇蹟，新的過程，理論上與實際上的新觀念的時代，每一天，歷史以一種急促的步子開展着。戰爭的威脅籠罩了全世界，一種新的普及世界的衝突，愈來愈近了，有掃除一切進步之虞。

在這樣的時代當中，我們創辦了『動向』(註)。發行者的目的不在於簡單地給讀者們多得一種雜誌，而在於給他們一本種類不同的雜誌：這雜誌將以無所忌憚的態度，從各方面來探討目前這個時代。我們的目的是在於提供一些關於現代國際政治，藝術，文學，科學與歷史的具有權威的與令人鼓舞的文章。那豐富的，成爲歷史的過去，將不爲人所遺忘，現在的事物將被記錄，至於未來——雖然我們不是預言家——則藉助於我們關於過去與現在的知識

，行將加以描繪。雜誌的內容將由勝任的中國作家來供給，且遇有適當的時候，還要登載一些從外國文裏譯來的作品。

華盛頓印刷出版公司在中國文學的地平線上是一個新的名字。在牠幾個月的存在期間，已經有好幾種書由這公司的名義出版了。本發行人希望『動向』能信守着本公司『讀物具有目的』的格言。

華盛頓印刷出版公司亞歷山大白克孟

(註) 本雜誌英文名爲 Living Age，意爲『活的時代』；今依華文名譯爲『動向』——譯者。

卷頭語

全人

世界上祇有一件事情是不變的，那就是變化。

舉凡人類社會的一切事物：政治，經濟，學術，思想，無一不在永恆的變動中，蛻化中；尤其在目前這個充滿了危機，戰爭與革命的時代裏，一切人事的變化是更加迅速，更加奇幻了。

不過縱然迅速，縱然奇幻，所有的變化都還是遵循着一些軌道與原則的。這猶之乎物質的千變萬化，都跑不了一些物理的與化學的法則一樣。

誰如果發見了這些變化的軌道，那他就可以不被時代進展的輪子所輾斃；不為殘酷的無常所懾服，不會向反動的力量低頭，而能担当起贊助歷史前進的使命。

但是要做到這個地步，首先得認清楚一切事變的動向。

我們今後的努力，就是要應用着唯物辯證論的方法，試指出當今世界一切社會現象變化的動向。社會現象光怪陸離，有的似前進而實後退，有的似後退而實前進，我們都將還牠們以一個真實的面目；使假冒者得以暴露，蒙冤者得以大白，至於明顯的倒

車，公開的反動，有如法西斯侵略之類，那自然毋需乎指出，而只需加以撲滅就是了。

但撲滅的方法也並非不重要的，譬如有三人焉，目的都想到美國，然第一人想乘船，第二人想坐車，第三人竟想跑路，結果當然不同；所以對於正確的動向，我們還將試行指出那走上這一動向的正確方法。

要在紛亂現象中指出前進的動向，並求得加速此種動向的方法，自然不是一件輕易的工作，我們不妄想由幾個人來完成，希望很多人的參加，所以本誌的態度是公開的，我們的立場是坦白的，我們反對專橫與頑固，我們歡迎批評，歡迎討論，祇要是秉着科學的良心說話的，我們都願加以披露。

因為我們深信：祇有澈底的批評與討論，纔能發現真理，纔能排除一切虛偽與反動。百科全書派的批判哲學，開啓了法國布爾喬亞革命的道路，馬克思的批判哲學則指出了社會主義鬥爭的動向，同人等生息於思想窒息的現代，也妄想追步先賢的後塵。

世界動向

鳳岡

四

從英國說起

世界無論那一個角落裏，發生了無論什麼事情，總不免與英國有關。戰後不列顛帝國雖然顯出了迅速的衰落，但是百足之蟲，畢竟不凡；一百年來居於工業資本主義創造者與領導者地位的國家，到目前資本主義的衰老時期，也還不失為舊世界的領袖。因此，英國的政策及其活動，我們毫不誇張地可說是了解國際問題的鎖鑰。

英國既是資本主義的奠基人，當然她享有了最大部分的世界富源；但資本主義的發展是具有國際性的，英國並不能永遠叫全世界做她原料的供應地，與銷售商品的市場。歐洲興起了法，德國，尤其是後起銳進的德國，在工業化方面竟趕上了英國，並且要同英國一爭雄長，這就促成了上次大戰。結果是德國敗了；但同時却使北美合衆國達到了資本主義發展的極峯，而英國在遠東的工具日本，則也乘機崛起，公然向英國的利益挑戰。更不幸的，大戰中俄國產生了一個社會

主義的國家，竟把一百年來英國所賴以繁榮強盛的那種制度給推翻了。蘇聯的存在，給英國廣大的殖民地，甚至給英倫三島本部的勞動者，立下了一個危險的榜樣，這使 London City 與 White Hall 的紳士們寢食不安。所以戰後的英國政策，一直和蘇聯是站在不可調和的地位。『約翰牛』始終認為北方的大熊乃是她最主要的敵人。

因此，希特勒的反共運動竟能得倫敦紳士們的援助而統治德國，繼而雄視歐洲，並且波及世界；而日本軍閥在反共烟幕下進行的對華侵略，竟邀得了西門爵士等的優容。

當希特勒吞併奧國，且實行把捷克圈入第三帝國版圖的時候，張伯倫先生還想『綏靖』一下，請納粹黨的力量向東方——即蘇俄——擴張。

這次希特勒占領摩，希兩省，莫索里尼侵吞阿爾巴尼亞，日本在中國加緊反英之後，張伯倫等的政策才表示『轉變』，要同蘇聯締結三強軍

事同盟了。

三強同盟的困難在那裡

由英法德意的四強協定轉變到英法蘇的三強同盟，如果具有相當誠意的話，那不能不說是英國政策上的一個重大轉變。因為至少在暫時間，總似乎放棄了以蘇聯為主要敵人的信念；但我們就十餘星期間的英蘇談判看來，覺得這種『轉變』是決非誠意的。

簡單一句話，英法之所以要和蘇聯同盟，目的並不在於聯蘇反德，而在於利用蘇聯來逼德國與英法妥協，使她接受東進的計劃罷了。

假使不信，則英國歷次對蘇聯提出的建議就是明證。按照第一次的建議，蘇聯應予波蘭和羅馬尼亞以片面的保障，倘蘇聯因履行義務而引起戰爭，則英法之應否援助，尚須待當時磋商。克靈姆宮裏的要人當然不是傻子，所以他們拒絕了。

後來的提議總算是『平等』了，但關於波羅

的海諸國的保障，英法還是不願意接受，這無異對希特勒說，如果他要從波羅的海進攻蘇聯，那末英法絕不反對。同時最近一次的國聯行政院會議，又准許芬蘭在埃倫島設防，這更對希特勒送了一個親善的秋波。因為波羅的海沿岸的小國：芬蘭，拉脫維亞，愛沙尼亞與立陶宛，業已受德國的誘惑，如果聽他們投入德國的懷抱，則在未來戰爭中，蘇聯海軍將全部被封鎖於芬蘭灣內，而且列寧格拉將受到嚴重的威脅。反之，假使保障了波羅的海諸邦的現狀，則當大戰發生之時，蘇聯海軍可統治波羅的海，可斷絕斯干地那維亞諸國對德國的糧食供給，這對德國將是一個致命的打擊。現在英法偏偏不願保證這幾個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的小國，那末究竟英國政策的目的是聯蘇反德呢，還是聯德反蘇呢？可就不言而喻了。這是三強同盟難於締結的主要困難。

講到蘇聯方面，我們知道她也不是很願意締結這個同盟的。自從去年慕尼黑會議以後，再加以本年西班牙及法國人民陣線的失敗，蘇聯的領導者早就放棄了『民主陣線』與『集體安全』的口號。希特勒此次吞併捷克，故意把喀爾巴阡烏克蘭送給匈牙利，並不與蘇聯接壤，並放棄了『大烏克蘭』的口號，停止在報章上攻擊蘇聯，最近又提議促進德蘇貿易，對蘇貸款之後，史太

林的態度更不同了。李維諾夫的『辭職』，莫洛托夫的演說與齊丹諾夫的論文，便明確地表示了這一轉變。莫斯科現在的心願很明白：『不做火中取栗的貓爪』。與其和『民主』國家締結不可靠的同盟來替人作戰，還不如直接與法西斯妥協來取得中立的地位。雖然這種『妥協』與『中立』很成問題，但我們不能否認這是目前蘇聯統治者中一個重要的思想。

有些人說：『蘇聯與納粹黨的德國決無妥協的可能』。這祇能證明這班人頭腦之公式化，硬把『民主主義』或法西斯主義等思想來決定國際關係，更可憐的，他們甚至連史大林的報告，與杜朗底及安娜·魯意·斯屈朗的文章都不讀一下。

目前英，法，蘇的談判雖然還在進行，同時其結果也不能完全確定，但假使國際間一時不發生特別嚴重的事變，英法不能完全滿足蘇聯的要求，則該項談判的結束，多半祇能以發一空泛的宣言了事了吧。

但澤·天津與蒙邊

英，法，蘇的同盟既夜長夢多，另一方面，德意的軍事同盟又急行簽定，再加以希特勒拉攏波羅的海諸小國的成功，以及英國在遠東之公開主

張妥協，結果使軸心國的活動更加積極起來。德國之威脅但澤，日本之封鎖天津英租界與進攻蒙邊，都是這一連鎖中的事件。

『太陽永照』，『領地遍天下』，本來是不列顛帝國最堪誇耀之點，但現在這優點却變成爲弱點了。英國在目前最大的痛苦，就是所謂『顧此失彼』。而軸心國家得意的戰略，却是『東西響應』。處在這樣的情形中，英國免強應付的辦法，即在東西兩處，輪流使用着『綏靖』（即妥協）與『抵抗』，然而狼狽之態，是難於掩蓋的。

自希特勒進據捷京，英國的政策在西歐似乎由『綏靖』轉入『抵抗』，在遠東則準備由『抵抗』轉入『綏靖』。但如得不到蘇聯的援助，根本就談不到西歐的『抵抗』，倘英，法，蘇的談判終於失敗，則希特勒將立即奪取但澤。至於遠東『綏靖』的企圖，則更助成了日本進攻的姿態。東京的軍閥看出了英國的意向，知道她不願與不能在遠東作戰，且不願將英法蘇同盟擴大到遠東，於是先在天津下手，並封鎖中國所有的商埠，進一步地壓迫英國，使她完全屈服。

同時爲要振奮國內的民心，誇示日本的軍力並不曾因長期侵略而削弱，更爲要給世界——尤其給目前競向蘇聯求盟的英德——證明紅軍的力

量並不像想象的強大，藉以一方面破壞英法蘇同盟，另一方面阻止德蘇的接近起見；日本的軍人又在外蒙和『滿州國』的邊境從事賭博了，並大事宣傳戰事的勝利，究竟布爾湖畔的戰鬥，是否會導成日蘇間的大戰？那恐怕在最近的將來，還不見得如此吧。

東京會議與中日戰爭

天津的租界事件，已經在東京開始談判了。日本這次動員了她全部的力量，予英國以壓迫，想造成『遠東的慕尼黑會議』。

究竟這次會議的結果如何，現在我們還不願做出過早的論斷。不過就已有的消息，并根據我們上面的分析來看，英國多半是會屈服的，問題不過是屈服到何種程度吧了。英國的讓步會不會妨礙到中國的抗戰呢？這多半還要看美國的政策，法國的態度，英法蘇三國談判的結果，以及德意在歐洲所加於英國的壓力等因素來決定的。

不過所有這些因素，至少在目前這一階段，似乎都不很有利於英國。但澤問題與三國同盟問

題我們已經說過了，前者的鬆緊完全操在希特勒的手中，而後者的締結，則又是無有確期，美國羅斯福企圖修改中立法的努力，顯已為孤立派所擊敗，對遠東的企圖自不得不暫時延緩；法國據六月三十一日巴黎的半官報晨報所發表的意見，竟公然主張對日屈服。這樣說來，東京會議的結果多半會叫日本滿意的吧。

因此，我們不能，同時也不必否認東京會議表示出中國抗戰的最大危機，我們的任務在於看清楚冷酷的事實，決不在於把希望寄託在幻想之上。

一個國家的解放戰爭，必須依存於其他強國的政策，這是苦痛的，但這是歷史給我們造成的苦痛，當然怨不得誰。但人們是否應該自安於歷史給定下的厄運呢？當然也不是的。中國如果不願步阿比西尼亞，捷克，阿爾巴尼亞，與西班牙共和派的後塵，總得從增強自己的力量着手吧！

不過東京會議即令做到像日本軍人所期望的地步，成功了所謂『東方的慕尼黑會議』。但於目前世界的基本動向，仍絲毫不會有所改變。這

不過是向新的世界大戰更進一步罷了。

要逆轉這一個動向，藉以取得永遠的和平，那決不是這些紳士與將軍們所能辦到的。

第二期要目預告

世界動向

中國的合作運動

日本政治結構的發展

思想復古與抗戰

談談經濟戰

哲學消滅論批判

論馬爾勞

馬克思給柯格爾曼的信

德蘇關係的演變

西南經濟建設的瞻望

陳育才

落後的西南已成了抗戰的主要根據地。爲了達到抗戰的最後勝利，我們當然應該傾全力以開發並建設西南的經濟。但西南經濟的開發與建設，由於那裏的落後與多山，是一種堅苦而巨大的工作。這工作將來成就的大小，不但要看我們的努力程度及努力成效如何，還要看許多客觀條件及解決客觀困難的方法如何。

川滇黔桂，這西南五省的糧食產量，過去勉強可以自給，今後如加以農民生產技術的指導，其能充分自足自給，毫無問題。但在現時，我們開發與建設西南經濟的目標，不是要達到農產品之自足自給，而是超過這種自給而實現工業的發展。因爲我們所需要的抗戰的堅實力量出自工業的發達，而非出自農業的發達，而且如果工業發達了，則條件優良的農業，即不提倡也會發達。所以在今日而談西南經濟開發與建設前途的問題時，我們應當首先注意於發展工業問題，首先觀察那裏發展工業的條件是否俱備，是否優良。

西南工業發展的條件是否俱備，是否優良呢？

一國工業無論怎樣電氣化，但工業發達的兩個基石還是煤和鐵。據地質調查所估計，中國鐵礦儲量約十二萬萬噸，四川佔一百萬噸，只當全國儲量一千二百分之一。四川以外，康滇黔桂亦

有鐵礦，但尚未調查。全國煤礦儲量共二千四百三十六萬萬噸，而在川滇黔桂四省約佔全國儲量百分之五強，而且煤質又壞。這樣一個客觀條件，決定西南工業無有單獨飛黃騰達的前途，假如五省不能發現新的煤鐵礦藏的話。

不過這話說得太遠了。任何帝國主義者都不能使西南與中國別處分裂到幾十年之久，所以在四川的一百萬噸鐵礦還未開採使用完畢時，中國民族早已獨立而且統一了，早已在全國資源統一使用的條件下工作了，因此我們在現在可以不必爲西南鐵礦或煤礦量少作杞憂。現在，爲了應付客觀需要，爲了便於將來發展重工業，我們所最當注意的是怎樣發展西南的輕工業。

是的，目前西南所急須發展的是輕工業。機製棉紗棉布之類，西南不生產，自海岸被敵人封鎖後，這類必需品在西南已缺少到可怕的程度。故在今天，發展西南的紡織工業實是客觀條件所要求的，順水推舟，容易成功的。再就資本主義生產發展的歷史程序說，因爲輕工業所需的資本少，技術低，並且產品的市場大，故在各國的產業發達史上，如果沒有特別的天然障礙，大都是輕工業首先發達。在今日的西南，首先建設紡織工業之類的輕工業實是勢所當然的，即是比較輕而易舉，前途成功的希望比

較有把握的。不錯，直接地最有益於抗戰的軍事需要的是發展西南的重工業，但重工業的大規模發展有待於資本的雄厚，時間的培養，輕工業之支持，非可一蹴而及。故在今日的西南，應首先注意於發展輕工業，自然亦當盡可能發展軍事工業。但不幸西南在發展輕工業上又有兩種障礙，即原棉的缺乏與輸入機器的困難。

中國的產棉區均在華北華中各省，西南各省的產額，向來是少得極不足道。全國每年的棉產額約二千萬担，然貴州所產不過八萬担，四川產七十五萬担，雲南產四萬担，廣西產一萬六千担，總計不過佔全國總額約百分之四而已。巧婦不能為無米之炊，無棉花怎樣能發達紡織工業呢？

其次，西南各省原是无機器工業基礎的地域。像箇舊那樣有名的錫鑛，也向來是用土法開採，更不必提較小的工業了。現在要在那裏發展工業，首先便要有機器，舊有的也好，新購的更好。可是交通太困難了，外邊的機器幾乎無法達到川黔。在淞滬退出及武漢失守以前，政府曾叫上海及其他地方的機器工廠向西南遷徙，當時遷徙者不在少數。然由於距離過遠，戰時交通工具的忙碌，及機器之過於沉重，各廠機器之輾轉遷到西南者固然有若干噸（據說在十萬噸以上），但許多都毀在半途或遺棄在半途，宜昌上下江岸之那些生鏽了的鐵東西，全是費了千辛萬苦，由別埠運來的機器。茲後，自武漢失陷而長江上下游的水運聯絡

由公路運輸，而且公路的運費太貴，即使輕而小的機器能由公路運輸，也無人願用汽車運輸機器，於是新舊機器便無法再到四川貴州去，而重慶成都一帶的機器工業，只好靠由下游運去的十萬噸舊機器來支持。在這種情形之下輕工業怎能發展呢？

這種種客觀條件的不利，自然阻害了西南工業的發展。現在是如此，最近將來還要是如此。但抗戰是民族爭生存的苦鬥，我們當然不能因為困難而就停止努力，反之應該更努力，更奮鬥。政府當局於去年曾收購了豫陝鄂各地的一部分棉花，儲以備用，並資助已遷到西南的各鋼鐵廠、機器工廠及紡織工廠能開工生產。此外，更就四川遂甯一帶土壤之宜於植棉者選種試植，並向滇桂兩省調查氣候土壤，推行植棉，以求將來西南各省的紡織工業原料之充足。據統計，由長江下游遷入西南的工廠大小共有二百餘家，分類計之，最多的為機器工業十二廠，遷去機器物材一千四百餘噸，遷到地點為重慶與北碚；次多數為紡織工業四廠，遷去機器物材六百十五噸，亦遷到重慶與北碚。至於各遷去工廠的現在是否開工及開工情形，則本年四月十七日大美晚報載該報總編輯高爾德的重慶通信中所報告云：『重慶方面的工業區，廣達十數方英里，余與朋友往參觀時，見數千工人，猶在鋤築石基，建立新工廠。已建成之工廠已多開工，其機器大抵是上海或其他淪陷區遷來者。一鋼鐵廠中，有熟練工人三百五十名，備有電氣溶鐵爐二隻，每隻皆能溶鐵一噸，此外有鍊鐵廠，機器廠數

萬五千，唯現已開工者僅五千。『重慶一帶是計劃中的西南最大工業區，豫豐大概是遷到的四家紡織廠中之惟一開工者。』

人力的奮勉與不懈固然可以克服許多客觀上的困難，然專靠上海或其他淪陷區運入西南的些少機器，終不足以開發與建設西南的工業（按：戰前西南各省幾無機器工業之可言，除過廣西有小規模的紗廠外，昆明在前年曾成立雲南紡織廠一所，資本八十萬，有紗錠五千二百枚，布機六十台，這是戰前西南最著名的機器輕工業）。因之，西南工業之發達，必有待於新的機器的輸入，而新的機器的運入，必須在交通比較便利之後。更肯定些說，公路不足以負擔輸入機器之責，機器之大量輸入，即西南輕工業的高度建設的機會之來到，至少必須在川滇鐵路，這條聯絡西南中心的四川與海口的幹路築通之後。現在西南建築鐵路的工作，正在積極測量，分段合築，加之鐵軌機車等材料，前於我軍退出已成鐵路線時，曾拆卸搬運了許多到後方，這些材料可以幫助新築鐵路，至少是湘桂鐵路之容易築成。我們希望川滇鐵路及與此相接的滇緬鐵路能在兩年以內築成，接着能看見西南各省的機器工業尤其是輕工業之蓬勃發達。到這時，工業發達了，農產品的產量自然容易增加，西南的經濟文化可以突飛而猛進，在發展過程中，牠自然早已成爲抗戰的堅鞏基礎了。

雖然如此，自然力的偉大限制，終究不是人力所能容易克服的。我們當然應該爲發展西南工業而盡力奮鬥，但我們決不要對西南工業的發展可能性閉起眼睛。如上所述，西南是煤鐵貧乏的

地域，紡織工業不大能發展的省份，但因爲是多山區域，所以那裏將來最有希望的工業是礦業。如川滇的岩鹽，川康的砂金，滇省的錫，黔省的汞，這些藏量極豐的礦物，現在都是用法開採，將來可以借機器之力而大大開發。但礦業的大大開發，必須在交通工業已經發達之後，因爲大規模的採礦業需要大量資本，需要高等技術與重大機器，不像發展輕工業那樣的容易。這前途說明了西南經濟的可能發展的限度。

詳細言之，西南經濟的開發與建設自能增強抗戰的力量，但西南的天然缺點太大了，牠的歷史落後性太重了，所以充其可能發展之量，牠仍不足以單獨負擔收復失地的重任，更不容易在短期內對於抗戰有宏大的經濟方面的貢獻。今後，爲了爭取民族生存，我們當然要盡力於西南交通的建設，要盡可能加緊建設輕重工業，以充實抗戰的經濟力量，並盡量開採礦產並發展農產，以補償抗戰的消耗，換言之，天然的與歷史的限制越大，我們就越應該努力。但同時我們必須認識西南經濟發展的這樣限度。

由此看來，可知於加緊發展西南經濟之外，抗戰最後勝利的希望必須寄托在全國，尤其是淪陷區的廣大民衆自發地起來抗戰之上。

日本經濟發展的特點

梁石生

日本帝國經濟發展的特點，決定了她目前的全部政策，並命定了她未來的結局。

日本一般的歷史家總喜歡把日本歷史加以神化，彷彿這個太陽帝國是神賜的天國，她不僅要統治亞洲，還要統治整個地球。

究竟這個野心是否有絲毫實現的可能，我們不想訴之感情，而要從冷酷的經濟分析來加以論斷。日本帝國的地理位置既在亞洲，總不能逃出東方那種長期停滯和緩慢發展底歷史環境的影響。整個亞洲急劇捲入西方資本主義的漩渦裏，還是十九世紀的事情，而日本之正式脫離中古的野蠻狀態，不過起於一八六八年的明治維新，距離現在不過七十一年，但距離英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差不多有兩個世紀了。當歐洲的資本主義逐漸征服全世界，逐漸佔據世界上最肥沃的領土，而且正在分割亞洲，即當工業資本主義轉向帝國主義的過渡期間（一八六〇——一八七〇年），日本資本主義才呱呱墮地。她之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顯然不是她歷史底正常發展的結果，而是受了外來的影響推動的，這是她的第一個特點同時也是她缺乏充分原始積累的基本原因。

日本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過程非常短促，她差不多與明治維新的政治改革同時發生，因此，她的實現較之歐洲各先進國更依

賴於政治的權力，更帶強迫性，而且更帶野蠻性。明治維新的結果，經過公債證書一下子把四百八十家的華族轉成爲資本的榨取階級，並嚴厲的確立土地私有權和自由買賣制，現物地租迅速改爲金錢地租，四十萬戶的士族（約二百萬人），和因土地迅速兼併而被排擠出來的農民，形成了天然的勞動市場。一切資本主義經濟的先決條件，都彷彿是二十四小時內一下子用法令造成的；日本的整個社會外表上沒有經過巨大的震動，實際上在明治維新以來已舉行了天翻地覆的改革工作了。日本經濟的發展沒有認真經過手工業和手工業工場的階段，她沒有像歐洲中世紀的自由都市（建築在手工業基礎上的），她沒有一個成熟的第三階級和封建皇朝作長期的鬥爭。因此她的改革，只有從上面由開明的封建地主和商人採取妥協，互相影響，並以同化的手段來執行的，這與普魯士的發展同一類型，雖然日本的物質基礎比普魯士的還要貧弱些，她的歷史條件比普魯士還要不利些。日本的原始積累不僅與政治的變革同時，而且與產業革命綜合地發展。在明治維新初期，日本的原始積累過程很快便和產業的發展交織起來，但正因爲原始積累過程的短促，日本的產業必須放在天皇的溫室裏才能發展，換言之，日本的產業必須更多依賴於政治手段的扶持，

這是她的第二個特點。

差不多日本所有重要產業的發展，都是由政府一手培養起來的，明治初期最重要的產業之一，便是郵便汽船三菱會社，政府除了把官府的船隻借給她之外，每年還補助她二十五萬元的航海助長金。在政府的推動之下，從一八六八年至一八九四年（中日戰爭）不到三十年期間，日本已完成她的工業基礎。我們試拿日本的重要輕工業——棉紗紡織來看，一八七八年的紡織工廠只有三個，錘數僅八千二百餘，生產額約二十萬元，但再過二十年，到了一八九八年，紡織廠數已增至七十四，錘數增至七十六萬八千三百三十八，生產額增至二千六百一十三萬四千一百二十元。又在一八七八年，日本尚輸入棉紗及棉織物約一千萬元以上，一九〇〇年，日本能輸出價值二千三百六十四元的棉紗，而輸入則已大為減少。日本從入超國轉到出超國，從農業國轉到工業國，是以飛躍的姿勢發展的。但日本的產業發展愈快，則她各部門間的不平衡發展亦愈烈。這是她的第三個特點。

日本因受資本貧乏的限制，不能在一切部門中立即採用近代式的生產制，而且為着與先進國的廉價商品競爭，她必須採取最落後和殘酷的剝削方法，因此，自明治維新直到現在，日本最發達的製絲業，染織業，陶器業等，大都還採取小規模的家內工業制或手工業工場制，就是大規模的近代工廠制，也與手工業的生產間接直接的發生連繫。大機器生產與家內手工業及手工業工場制相結合，資本的高度有機構成與工資血汗制相結合，形成了

日本產業發展的基礎。而由于上述同一理由，日本產業的集中化也異常迅速。日本的產業差不多一開始便採取壟斷的形式。早在一八八一年，日本的製紙聯合會便開始壟斷紙的市場。一八八三年紡織聯合會亦為壟斷的目的而成立。一八八七年以後日本、札幌、大阪三家麥酒公司瓜分了市場；一八九七年又合併為大日本麥酒株式會社。製蘆業也經過一模一樣的過程，三家大公司很快便合併成爲日本製蘆株式會社了。產業迅速集中化又促進了銀行資本的生長，而後者很快便與壟斷相結合了。一八八五年，日本銀行總數爲一千零九十七家，但總資本額不過八七、一〇〇（日金千元爲單位）。十年之後（一八九五年），銀行數減至八百五十六家，但資本額已增至一〇一、三七九（單位日金千元），這表明日本銀行資本本身的集中化。至於銀行與產業的關係，遠自一八八五年，在各產業資本中，銀行的投資已佔了七成五。進至二十世紀初，銀行與壟斷的結合更加明顯。一般的說來，日本的工業資本時代與財政資本時代的劃分是非常不明顯的，因爲日本從自由競爭過渡到獨占，完全採取綜合發展的形式。這也可以說是她的第四個特點。

在日本資本主義發展中，表現最不平衡，最奇特，最富於綜合發展的意義的，便是農村經濟與城市經濟之間的關係。明治維新的『土地改革』不過簡單的把土地的所有者由封建主蛻化爲資本家，剝削關係沒有多大變動，而生產方法則根本沒有改進，歸根到底這當然還是因爲日本社會的總資本太少，無力兼顧到農業

生產的改革之故。據烏特萊女士的調查，日本一共有一百多萬地主，他們都是兼營高利貸和小商業的，他們完全過着一種寄生的生活，他們把土地零細的佃租出去之後，便不負任何生產上的責任，而且每年吸收佃農的租額經常佔產額的百分之六十或七十。日本農民佔在業人數一半，而農民的四份之三是佃農。他們一方面受地主的掠奪，一方面還在市場上受獨佔商的剝削。地租——高利貸——獨占的價格，使他們根本無法積壘資本，改革農業生產的技術條件。他們中只有極少數發展到富農的地位。日本農村，事實上與中國農村的情形相差無幾，地主富農高利貸往往是三位一體的，而大多數佃農則淪為僱農和貧農的地位。而且日本比中國更甚，地主的利益已和都市的壟斷業及銀行業緊相連繫，他們已天然成了後者的農村經紀人。封建式的按額繳租制，與土地之任意的零細的分租，乃是農村生產力驚人低落的基本原因。農村中落後的剝削關係與最進步的資本主義關係相結合，零細的佃租制與城市的機器生產綜合地發展，這是她的第五個特點。

上述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五個特點，事實上也就是一切後進國經濟發展的共同點。這五個特點說明了日本資本主義本身的脆弱和不健全，同時也說明了她何以一出世便迅速過渡到衰落。日本資本主義經濟愈是迅速的發展，則農村中封建的剝削關係與城市工業高度集中化之間，城市產業的各部門之間，龐大生產組織與狹窄的市場間，工業品與原料品間，重工業與輕工業間……種種矛盾便愈是積重和緊張。這些矛盾，日本不能在國內求得解

決，因為她一出生便連起碼的土地問題也無力解決，她現在唯一的出路，便只有對外侵略。但日本帝國主義對外侵略的資本，敵不住歐美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而且我們已經說過，日本帝國主義出現時，整個地球差不多已分割完盡了，或者整個地球的沃土都給先進的資本主義盤據了。就是她唯一可以發展的對象——中國也差不多分割成英法德俄的勢力範圍了。朝鮮在未被日本佔領之前，也開始被英美等國染指。在這樣的形勢之下，日本帝國主義者終不能走『和平侵略』的道路，她的對外侵略必須一開始便與對外戰爭綜合進行。一八九四年她把老大的中國打敗，奪取了朝鮮和台灣，並得一筆巨大的賠款及其他利益。一九〇四年，她又打敗了沙俄，奪取南滿的勢力範圍。一九一四——一九一七年她利用大戰的有利時機，奪取了德國在遠東的勢力範圍。一八九四年的戰爭奠定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基礎，一九〇四年的戰爭把日本帝國主義帶入黃金時代（一九〇四——一九一七年，日本方完成了她的重工業的基礎）。

從一八九四，一九〇四至一九一七，日本靠對外戰爭的每一次勝利來緩和她國內的矛盾，但隨後很快又在新的基礎上把舊有的矛盾弄得更集中和緊張了。日本帝國主義既然無力改革她的農村生產，那末她也無法使她的殖民地工業化。日本是個輕工業的帝國主義者，她的重工業和銀行資本一樣的無力負起開發殖民地的責任。她對殖民地的榨取和剝削，是軍事掠奪和殺戮與商業洗劫的混合。這就是說，日本帝國主義受了新的矛盾——宗主國與

殖民地間利益緊張的衝突——的牽累了。嚴格的說來，朝鮮和台灣的殖民地化促進了日本帝國主義的繁榮，同時也促進了她的衰落。一九〇四年——一九一七年南滿勢力範圍和山東勢力範圍的佔取，使她的產業膨漲到空前的地步，同時也使她更接近於死亡。

沙俄之後，日本已成了帝國主義中最弱的一環了。

一九一七年大戰終結之後，日本帝國主義開始被歐美各國排向世界市場。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中國的大革命，使她最後的市場也震動起來了。一九二七年日本的財政恐慌終於暴發出來，田中大將的進佔山東，表示日本帝國主義第一次臨死的掙扎。一九二九年的世界恐慌，對日本帝國主義給予極大的打擊，國內六十餘年來積壘和集中的矛盾，開始醞釀和爆炸了。她迫得絕望地把國內的產業迅速改編為軍事工業，把國家收入一半撥歸軍事機關，她的全部經濟和政治的機構完全改成為永遠侵略的戰時機構，於是發動了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變，並開始她征服中國的『百年戰爭』。

但假如一八九八年的中日戰爭是日本帝國主義的產婆，那末這次戰爭就是她臨死的最後掙扎了。日本這次在中國不是碰到一八九八年的腐朽的瓦解的封建經濟，而是碰到新興的民族工業；她不是碰到一個無知的蒙昧的中國，而是碰到一個經過了兩次革命和長期土地鬥爭的中國（其內部矛盾的緊張性不下於日本）。此外日本帝國主義還碰到兩個一樣瀕於絕境，但較她遠為強梁的

英美的競爭。

日本帝國主義要全部收奪和毀滅中國民族工業來維持她的輕工業市場，她要中國簡單的變為日本的農業附庸國，她要收奪全部中國的原料，她要中國的白銀完全『引渡』到東京來穩定她的日圓的基礎；一句話，她要獨占中國。這樣就必然迫使中國民族永遠放棄『中日經濟提攜』的夢想，同時也使英美與日本之間的矛盾空前的緊張起來。日本帝國主義必須準備長期的戰爭來應付中國民族的長期抵抗（這裏包含着中國民族在新興階級領導下進行長期革命戰爭的遠景），和應付未來的世界大戰。但日本帝國主義的脆弱基礎又是最經不起長期震動的，她尤其經不起一個打擊！那末日本的命運多半在重踏着沙俄的覆轍：這是悲劇，但這是無可挽回的宿命的悲劇！

一九三九年七月十日。

『政治家』的演變

木君

一九三七年七月三十日，南京有一位大政治家發表了一篇沉痛的演說。其中有如下的名句：

『我們抗戰而勝則已，不幸而不勝，甯可國亡而種隨以滅，不可遺留一個做內奸的種子。……我們抗戰而勝則已，不幸而不勝，則必須使我們的土地，隨我們同為灰燼！』

兩年之後，即在一九三九年七月九日的晚上，就是這位大政治家在上海播音，其中的『警句』是：

『在目前的時局中，中國可採的道路有二，即追隨蔣介石繼續抗戰呢，還是與蔣氏斷絕，實行與日本講和，確立東亞的和平呢？前一道路的結果是國家民族的滅亡，後者的結果則是中國與東亞的復興。』

對於『新啓蒙運動』的檢討

南 冠

所謂新啓蒙運動，自最近三年前被人提出後，曾有一個時期在某些刊物上頗出風頭。即到最近，也還有人把牠當作討論或宣傳的對象。可是結果怎樣呢？結果似乎同近年來其他的許多運動（如普羅文學運動，大衆化運動等）一樣，除了散播一些不高明的影響外，都成了無花果實，並且逐漸地逐漸地被人們淡忘了，就是提倡這些運動的人也銷聲匿跡了。

這裏證明中國某些智識份子，對於任何思想運動都是不負責任的，他們不是根據於一時的投機衝動，就是盲從某方的命令等因奉此而行事，一等到個人的私圖達到了，或某方的命令停止了，於是『運動』也就隨之而置諸高閣，不管原來的目的達到與否。

我們爲了澈底推進思想前進起見，對於過去的一切思想運動，尤其所謂左派或號稱前進的思想運動，都不得不加以檢討，分析其社會根原，派系作用，以及對於羣衆的影響等等，以便藉此得出今後思想及社會運動的指南。站在這個觀點上，我們現在來把所謂新啓蒙運動加一番檢討，大概不是多餘的吧！

歷史上一個典型的啓蒙運動

我們要想正確了解什麼是新啓蒙運動，必須把啓蒙運動的歷史來追溯一下。所謂啓蒙運動，也同歷史上一切偉大的思想和社會運動一樣，決不是偶然發生或人工造成的，而是在一定的歷史發展階段上代表一種新興勢力或新興階級的思想解放運動。在歐洲先進國家的啓蒙運動時期，就是十七世紀至十八世紀，其中以英法爲代表。而這種運動的典型表現，也就是最澈底的表現，是法國。

這種運動的社會根原，乃是當時正在開始發展的資本主義要求擺脫一切中世紀殘餘勢力的束縛，而爲其代表者即當時新興的資產階級。這個階級在經濟上已逐漸取得優勢，但在政治上和一般的文化上還是居於被壓制的地位——這情形在法國表現得特別尖銳，正因爲如此，啓蒙運動也在法國表現得特別澈底。

啓蒙運動的策源地是英國。但英國因爲經過一六四〇——一六八八年的大革命以及一六八八年的所謂『光榮革命』，資產階級在政治上已取得了部分的權利，因而英國資產階級的啓蒙運動澈頭澈尾是調和主義的。他們以提倡自然神論去代替獨斷的基督教，提倡個人主義的倫理說去代替絕對服從的倫理，在哲學上起初是二元論（洛克）隨後則轉到純粹的唯心論或唯我論（柏克萊與休

謨) 在政治上則以君主立憲制度為滿足。但在法國的情形則相反。法國的政治是絕對的君主專制主義，而其支柱就是當時貴族和僧侶兩個極端反動的階級。這兩個階級不但壟斷了國家一切收入，一切政權，而且壟斷了一切文化機關(如教會，學校及出版機關等)，一切思想領域。凡是維護舊社會制度和反動階級利益的宗教，法律，道德，哲學，藝術以及其他的思想風俗習慣等，都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在這種情形下，負有發展法國資本主義歷史使命并已在經濟上取得相當優勢的資產階級，當然不能忍受，不能不根據自己的要求，自己的見解起而從事反抗。

這種反抗運動表現於思想上，就是法蘭西十八世紀著名的啓蒙運動。牠的唯一武器是『批評』。牠確曾猛烈地尖刻地批評了當時的專制政治，愚昧的宗教，不平等的法律，貴族的藝術，反動的唯心哲學，農奴制度的殘滓，以及一切束縛個人自由發展的思想風俗習慣等，牠批評的標準是『理性』。不用說站在這個理性背後的，就是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但在這個長期批評奮鬥的過程中，却展開了并完成了近代資產階級最進步的世界觀和政治理想。百科全書派的唯物論與無神論，盧騷的民約論以及孟德斯鳩的法意等，都是那時啓蒙運動之最高的產品。而一七八九——九三年的大革命，乃是這一運動的直接後果。如果我們可以說法蘭西的大革命是『武器的批評』，那末，牠的啓蒙運動就是『批評的武器』。所以啓蒙運動在法國乃是資產階級的澈底的思想解放運動，而後來的大革命正是完全由這種思想解放運動

準備起來的。

中國啓蒙運動的意義

『啓蒙運動』既是資產階級的一種思想解放運動，那末凡是已經發生了資本主義，出現了資產階級的國家，便或遲或早地要發生這一運動，因此不但歐洲一切先進的國家都經過這樣的運動，就是落後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國家，如埃及，印度和土耳其等，也都曾經有過牠們自己的啓蒙運動。而我們中國的啓蒙運動，就是『五四運動』

無疑地，五四運動的社會根源，在本質上是與法蘭西的啓蒙運動一致的。我國雖然經過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的專制政治，但由中世紀殘留下來的封建勢力還是依舊保存着，并且加以國際帝國主義的侵略，及其與一切腐舊勢力的狼狽為奸，致使我國民族無法前進，因而激起了新興階級的反抗。五四的啓蒙運動便是在種情形之下爆發出來的。這個運動的主要『武器』也是『批評』。牠曾大膽地批評了當時軍閥制度的專橫腐敗，帝國主義的無理侵略；牠批評一切迷信，一切傳統，尤其對於舊禮教(以孔子為其代表，這略相當於歐洲的基督)，施行了無情的攻擊。牠的口號是自由，解放，民主與科學(所謂德先生與賽先生)，并極力提倡文字改革(白話文)。這個運動，在中國思想界確曾開關了一個新時代，一切舊制度，舊思想，舊道德，舊習慣，舊文學等等，都在『批評』面前遭受了嚴重的打擊。所謂新

人生觀，即現代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民族民主主義，新科學新文學等，都成了當時一般智識界，特別是學生青年中間的口頭禪。尤其在文字改革方面獲得了光輝的勝利。如果說法蘭西的啓蒙運動是西方先進國家中的典型的啓蒙運動，那末我們的五四運動便可以說是東方落後國家中的典型的啓蒙運動。自然，我們的運動比起法蘭西的運動來要膚淺而狹隘得多，因為牠還沒有深入到各方面，沒有形成自己的（中國資產階級的）思想和文化系統，就分裂了。就是說，其中的右派，因為所代表的大資產階級的卑怯性和反動性，在很短期內就停止，甚至往後退了；而其中最前進最激烈的一派，則因為受了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及本國新起的工人解放運動的啓示，很快地便轉到了社會主義運動的一方面（『新青年』的轉變，就帶有象徵的意義）。但正因為如此，也就表示了我們的啓蒙運動的一個鉅大特點：我們的民主主義思想運動與社會主義思想運動中間的聯繫性與不斷性，換句話說，即表示了中國的民主主義思想運動一達到某種程度時，即要產生社會主義的思想運動；由此便預示了中國未來的民主主義革命運動，一達到某種程度時，必然要直接轉入社會主義革命的前途。五四啓蒙運動中這種思想上的特徵，到一九二五——二七的革命中即變成了行動上的特徵。雖然這次革命是失敗了（主要是由於國際領導的錯誤），但牠所給予中國未來革命的教訓是異常之偉大而極可寶貴的。

所謂新啓蒙運動究竟幹的是什麼運動

如果『舊』啓蒙運動是代表布爾喬亞的思想解放運動，那末所謂新啓蒙運動究竟是代表一個什麼階級的思想解放運動呢？提倡新啓蒙運動的主要人物，關於這一點，而且是最主要的一點，却沒有明白地指示出來。在陳伯達，張申甫和艾思奇等所解釋的新啓蒙運動，不過是『團結救亡運動』，『民族解放運動』，或『愛國運動』及『民主運動』等（見陳伯達的『新啓蒙運動雜談』，張申甫的『什麼是新啓蒙運動』以及艾思奇的『新啓蒙運動和中國的自覺運動』等文），這顯然說的是一種超階級的運動。但思想上的超階級運動是沒有的，凡表面上所說的『超階級』，實際上往往是代表資產階級。

至於這些新啓蒙運動家對於新啓蒙運動所提出的主張和口號，也是開倒車的反動的。他們口頭上都說新啓蒙運動是繼續和加深五四運動，但實際上他們的主張和口號却比五四運動時代要倒退得多。例如陳伯達竟公開地說：『如果我們稍為涉獵一下過去一些啓蒙思想家的著作，那末，我們就可以看到他們對於一些問題的提出，有時甚至比我們現在所提出的更爲無顧忌地激烈。一般說來，我們對於許多問題的提出是很謹慎的』（見『讀書』第三號）。所謂『謹慎』，就是對於現行的制度，現時佔統治地位的思想或主義，不宜多作批評，而應盡量與之妥協。甚至對於『國粹』，對於孔子的『舊愛國說』，對於禮記上及康有爲和譚

嗣同的『大同說』（見同上所引）都得加意『保存』，這就是說，即封建時代的『排外主義』和『烏托邦主義』，也得繼承下來。張申甫更說：『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見『什麼是新啓蒙運動』），彷彿『孔夫子』的封建反動思想對於我們的時代還大有益處似的。艾思奇也跟着說：『國難的緊迫，不容許我們完全推翻什麼或建立什麼……就把孔家店去作例子吧……我們……不必要澈頭澈尾把它打倒』（見『文化食糧』第一卷第一期）。……夠了，夠了，原來這班新啓蒙運動家所提倡的新啓蒙運動，不但主張投降布爾喬亞的思想，甚至還企圖與舊封建勢力和封建思想（五四運動所堅決反對的）妥協調和，然而這正是第二次革命失敗後布爾喬亞自己所努力幹過的工作呢！由此可以充分地明瞭，所謂新啓蒙運動也者，不過是向一切舊勢力舊思想之屈服投降而已。

我們需要什麼樣的新啓蒙運動

我國經過了『五四』運動和一九二五——二七年的第二次革命運動後，一般的啓蒙運動時期，即歷史上所謂資本階級的思想解放運動時期，早已過去了。換句話說，就啓蒙運動這一字的嚴格意義或歷史傳統來說，這種運動在中國是再也不會有了。但如果我們不拘拘於啓蒙運動的歷史傳統，而僅就啓蒙運動是一個新興階級對一切反動思想的批評運動或思想解放運動來說，這樣的運動還是十分需要的。尤其是現在，不但反動的統治階級用盡一切

權力和手段在壓制和束縛被剝削被壓迫階級的思想自由，就是以被剝削被壓迫階級的代表自居的人物或派系，也是不顧一切地壓迫和鉗制勞苦大眾及革命者的頭腦。人們用詭辯代替了辯證法，用偽造代替了事實，用造謠代替了宣傳，用誣陷代替了爭論，用妥協代替了鬥爭，用投降代替了革命，用邦拉巴特主義代替了普羅列達利特的狄克推多，并且把任何革命的悲慘失敗都說成爲最高指導者的領導之絕對正確，把一切對反動思想和反動政策的批評都指爲奸細行爲……總而言之，指鹿爲馬，顛倒黑白，成了我們這個世界最流行的技巧。這種思想界上的『中世紀主義』，這種被壓迫階級內部的『宗教法庭』，如果不用『批評的武器』予以嚴厲的澈底的清算，則我們對於剝削階級和壓迫階級之『武器的批評』將永無希望。因此在這個歷史階段上，以真理爲標準，以歷史事實爲根據，來一個大膽的絕決的深刻的批評運動，實在是絕對需要的——如果批評是任何啓蒙運動的最高表現，那我們就叫這種批評運動爲新啓蒙運動亦無不可——但人們近年來所提倡的『新啓蒙運動』，却恰恰與此背道而馳！

如果新啓蒙運動就是站在普羅列達利特觀點上的批評運動，則我們不但對於任何的封建殘餘勢力，任何的封建思想，任何侵略者的壓迫與欺騙應予以嚴厲的抨擊，就是對於一切布爾喬亞的反動制度和思想，也得採取不可調和的批評態度。最後，而且最重要的，是關於被壓迫階級內部的一切虛偽和毒害的思想，更應拿來放在『批評』的光線之下，予以透澈的揭露。

在目前的國際範圍內，須要反對法西斯主義的橫暴，反對侵略，這是毫無疑義的。但究竟誰是法西斯主義的真正幫凶，誰絞殺了德國的革命運動，幫助了希特勒走上政權；誰閹割了西班牙的革命勢力，使弗蘭哥獲得最後勝利……；這一切都應受『批評』的檢查。至於在現時的我國，團結人民大眾以反抗當前的死敵，把抗戰支持到底，更是天經地義。但對於敵人侵略我們的歷史根源，我國當局過去及現行政治上和軍事上的一切設施，以及各種在野政派的主張和行動，也都得加以批評的揭發。

法西斯治下的意大利文學

——評西龍的豐塔馬拉——

（編者按：中譯改名意大利的脈搏，綺紋譯，金星書店出版。）

實際上，我祇想，同時也祇能介紹一位意大利反法西斯主義的作家——伊格那次·西龍。但偏偏加上這麼一個堂皇的題目，似乎有點誇張，不過編輯先生既歡喜這個題目，而內容方面，如果談到西龍，本來也不能不多少牽涉一些目前意大利文壇的近况，所以也就勉強把這個題目寫下來了。

意大利，這一個地中海濱的古國，誰都知道是文藝復興的搖籃，是詩人但丁的故鄉，她到處點綴着古羅馬文明的遺跡，徧地都能喚起人們的詩情畫意。但是現在，誰如果懷着這樣一個浪漫

但爲了有效地順利地進行批評運動，無論在任何一個國家內，一個階級內，一個黨派或集團內，爭取民主自由是絕對必要的。

一切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批評的武器』，乃是保證『武器的批評』之勝利的前提。我們希望被壓迫的人們起來大膽地忠實地運用『批評的武器』吧！

一九三九，七月十二日

雙 山

與美麗的想象去觀察法西斯治下的意大利文學，那他一定會受到幻滅的懲罰的。

在目前的意大利，人們祇能找得到歌功頌德的，千篇一律的文學，談不到藝術，談不到文學，甚至還談不到所謂法西斯的文學，在莫索里尼的刺刀統治之下，一切『文學』作品的任務，祇在於把黑衣宰相從維尼齊亞宮洋台上大喊出來的粗野的謾罵，改成精緻的『藝術』；又在於把意大利日報蓋達先生的論文，鋪張成美麗的詩歌。意大利的文學家事實上只是法西斯黨宣傳部的走

卒，充其量也不過是愛麥虞爾陛下與莫索里尼閣下的宮庭中的玩物與侍臣罷了。

關於意大利這種侍臣與玩物式的文學，伊格那次·西龍在其所著法西斯主義的創立及其發展中有很好的敘述：

『意大利的作家，就其對社會的關係而論，與文藝復興時期的關係是一樣的，即祇是一種宮庭侍臣。意大利人民對於他們自己的文學，從來不會表示過興趣。在目前的意大利，革命前的俄國作家，特別是道斯陀也夫斯基與果戈理，最爲流行。凡是在資產階級，手藝人，農民，或工人中，有誰想在文學中找尋到他本人希望與需要的回聲，那他就到俄國人的古典作品中去尋找。至於意大利文學則不能給他以任何東西的，因爲這是一種諂媚拍馬的文學。』

『當法西斯黨掌權之前，有所謂自由派的文學，在法西斯的治下，則有所謂法西斯的文學。但在實際上，前者一點都不是自由主義的，而後者也不是真正法西斯的。有多少在從前以自由主義爲職業的作家，現今在新制度之下還是自由主義者呢？沒有，一個都沒有。因爲 Benedetto Croce 與 Guiglielmo Ferrero 並不是文學家，而是歷史家。P. Gobetti 與 M. Vinciguerra 也不是文學家，他們實際上是文章家。至於 Roberto Bracco 則當法西斯黨進兵羅馬之時，早已從文壇上隱退了。其他所有的人都對法西斯主義屈了膝。誰假使要替無論那一個文學家寫一本小傳，都可以用下面這一個主題的，即：『怎樣變成一個舔靴者

。』當他們一成爲文學的愛好者，並加入了那狹隘的僱傭智識分子的範圍以後，他們就失去了一切精神上的獨立性，一切獨創力，以及一切與民衆間的聯繫。憑我心中偶爾記得的，就有以下的證據：安東尼奧·倍爾脫拉梅里開始寫過一本名叫 Cavalleria Mostardo 的小說，其中描寫着共和黨人與社會主義者在羅門那的鬥爭，但現在則被認爲一個職業作家，他所創作的只是一些叫人讀不懂的抒情詩式的小說。阿登可·索非雪在他的 Giornale de Bordo 一書中，曾經描繪出世界大戰前意大利青年知識分子的煩惱與苦悶，但此後却變成一個『純粹的』作家了。鮑其斯 (G. A. Borghese) 在他的 Rube 與我的生死中，曾將他的時代做了一個極好的分析，但他不能始終如一。他不能不和意大利的作家遭受同樣的命運，近來竟寫出 L'Arciduca 與 Le Belle 那樣無聊的作品來了。阿爾道·派拉瑞奇曾經寫過 Il Codice di Perela 其中講一個由烟形成的小人，在鐵人王國裏探險的故事。但他後來出版的金字塔，却只是一些文字的堆砌。馬可·倫潘底最初以社會主義作家出名。後來他在民主主義的治下成爲民主主義者，在法西斯黨治下成爲法西斯主義者的時候，他簡直默默無聞，追當誰都不能預見世界社會變成怎樣，誰能繼續生存，誰將是最強者的那一年中，倫潘底出版了一本幻想的書：La Corona di Cristallo。里屋尼達·雷巴西是以共產主義的作家出名的，後來却寫些神秘的悲劇。……

『這樣的例子，可以漫無休止地列舉出來，沒有一個著名的

意大利作家是例外。這就很正確地表示出職業作家在現代意大利生活中的地位。這又可以解釋爲什麼每一個稍具傲骨或珍惜自己聲名的人，都不願意接受文學家這個頭銜。在意大利語中，這名詞是一種侮辱。有一次，一個年青的意大利知識分子——羅莫洛·脫蘭奎里問道：『我們怎樣纔能避免這個可怕的命運？』我對他說：『我們一定要把全身心貢獻給那成爲意大利現存社會制度之死敵的那個階級。這是唯一的方法，可使我們不成爲舔靴者。』他接受了我的忠告。他要做一個工人，一個印刷工人。但他爲此却付了極高的代價。政府將他殺死在監獄裏了。

『當我和意大利的一切文學流派斷絕了一切精神關係之後，我一定也要和他們斷絕一切藝術的關係。在那注重論爭（註）的 *Contentisti* 派與注重作品形式的 *Calligrati* 派間，經常發生的爭吵，就像是宮庭侍臣之間的假決鬥——茶杯裏的風波。』

『同時也有不少像考拉道·阿爾凡羅那樣的真有天才的青年人；但他們在精神的箝制中給窒息死了。』

『莫索里尼很不滿意，因爲他的制度沒有產生一點像樣的文學，雖然意大利的作家，業已盡其所能，以圖邀得他的讚美的了。但藝術是一朵野花；牠愛好自由。』

一點都不錯，藝術是一朵愛自由的野花，但獨裁者把產生藝術的必需養料——自由——毀滅之後，偏歡喜有好的文學作品來替他粉飾門面；他希望一切文學都合乎他的『總路綫』，都歌頌他『地上天國』的政績，結果文學變成爲阿諛的刻板文章，沒有一

點生氣，沒有一點創意，終於連獨裁者自己都覺得索然無味了，反過來埋怨文學家不給他爭氣，其實這是矛盾，是獨裁者的悲哀，也是專制魔王壓迫自由的報償。

莫索里尼因見沒有好文學而嘆氣，但如果真有好文學出現的時候，他卻不得不憤怒與恐懼了。他看不起自己這一批御用的文學應聲蟲，但如果真有不應聲的，確有天才的文學家出來的時候，莫索里尼只有趕緊把他監禁或殺死了。伊格那次·西龍是當今意大利唯一有天才的作家，但他却不得不在瑞士周立黑的街頭流浪，甚至還不得不受着國外法西斯黨的追迫。因爲西龍的作品是意大利民衆，特別是貧農們的呼聲，所以就恰恰成爲莫索里尼政制的死敵。他忠實地描寫着意大利貧農的愚陋，貧困與屈辱，因而反襯出法西斯政制的欺騙，牠的強暴和牠的殘忍。

不過要給西龍的作品以正確的評價，光這幾句是萬萬不夠的。因爲暴露一種橫暴政治的實情，不能就成爲有價值的藝術作品，普通宣傳品也能完成這個任務。而且以暴露爲目的的文學作品，往往會降落至與傳單同價。所以對於西龍作品的價值及其在文學史上的地位，我們不得不予以更詳盡的研究。

伊格那次·西龍還很年青，現在還只有三十多歲。他生平的事蹟很簡單，寫過一本法西斯主義的創立及其發展，小說有豐塔馬辣，酒與麵包，還有亞里士多德先生等短篇，最近又有一本小

（註）『論爭』（Contests）疑係『內容』（Contents）之誤

說集出版：獨裁者學校。他還編輯一種工人的報紙。

但祇憑他的一本豐塔馬辣（此書已有中文譯本，改譯為意大利的脈膊，金星書店出版），這位年青的意大利亡命者已經可與他幾百年前的先輩亡命者——但丁——共垂不朽了。

『豐塔馬辣』是意大利馬西加省一個小鄉村的名字，其實牠並不真的存在，西龍祇拿牠來作阿勃魯齊省幾百農村的一個象徵罷了。在這本小說裏，你看不到風光明媚的地中海，祇有一只乾涸了的孚齊諾湖；你看不到意大利南方秀麗的景物，與豪華的別墅，祇見些饒瘠的田地，石質的童山，『不整齊的，黝黑的，受風吹雨打破損了的屋子』！在這本小說裏，你尋不到威尼斯或佛洛倫斯少爺小姐們的風流韻事，而只能遇到些赤貧愚陋的農夫村婦，他們那種『播種，鋤草，修剪，施肥，收割，採葡萄的走馬燈般』的生活，以及他們受欺，被壓迫，遭殘踏，終至於反叛的故事。不過雖然如此，同時也唯其如此，豐塔馬辣裏所記載的卻是更為真實的人生，比一切高貴的優美生活更為真實的生活。

豐塔馬辣出版之後，歐美文壇（法西斯的當然不在其內）上對於西龍的批評，可以說是毫無例外的讚美；但真正能稱得上扼要與肯切的，却還是少見得很。許多人稱他是反法西斯的宣傳家，另一些人，例如Nettie Sutor，則竭力要把西龍描寫成一個為藝術而藝術的文學家。這兩者都是不對的，都是片面的。依我的淺見，覺得俄國革命的一位領袖對於他的批評，要算是最公允與最深刻的了。他說：『豐塔馬辣不僅是一本熱烈的政治控告

書，其中的革命熱情而且高揚到一種程度，以致於產出一部真正的藝術作品。……』又說：『西龍以正確的馬克思主義方法分析了社會現象，再把這正確的分析變成爲高超的藝術。』

這評價給西龍以無上的光榮。一個深刻的馬克思主義者，同時是高超的藝術家！這是難能可貴的。有多少優秀的文學家，能同時是深刻的馬克思主義者呢？有幾個把握得住正確馬克思主義方法的人，能兼有文學的天才呢？蕭伯納，普通是被尊爲社會主義者的，然據恩格斯的批評，『……他雖是一個很有天才與聰明的作家，但將他當經濟學家與政治學家來看，却是絕對沒有價值的。』（見恩氏給考次基的書信集，第三三八頁。）高爾基更是公認的革命文學的導師了，並且還是一位參加過長期實際鬥爭的戰士，但是政治家的高爾基却遠不及文學家的高爾基，開始他主張把社會主義變成宗教，待俄國工農真的把社會革命實行起來的時候，他老人家就受不住鬥爭的殘酷了，他躲到了意大利的卡不列島，一直到一九二八年革命烈焰已被和平建設代替之後，他才回到故國。反過來說，那些具有『絕對正確的意識』的作家，可曾寫出過幾本好的藝術作品給我們讀過呢？由此看來，西龍之得能兼具二美，實在不是一件輕易的事。

我們就以豐塔馬辣爲例，試行觀察他的兩種特點。

說起來似乎叫人難信，當今法西斯勢力雖然橫行天下，但人們關於法西斯的認識卻是衆說紛紛，莫衷一是。有些學說而且還荒謬得可笑。例如有人說：凡是兇暴無理的人，都是法西斯，又

有人說：法西斯主義是一種思想，當牠取得了羣衆之後，就形成法西斯運動；更有人則以爲反對革命的人，甚至贊成革命而懷着異見的工人派別，也都是法西斯，譬如那有名的所謂『社會法西斯』，就是把改良主義的社會民主黨罵成法西斯的。結果人們的口裏反對着法西斯，而客觀上却正好幫助了牠。德國希特勒的上台，就是一個最痛苦的經驗。

至於馬克思主義者對於法西斯主義所持的正確見解，現在我不想作學理的抽象說明，祇想由西龍的作品去找尋活的解釋。

西龍對於法西斯主義的理論，雖有許多馬克思主義者不完全同意；但他在豐塔馬辣整部書中所描寫的法西斯制度，我們却不得不認爲是正確無誤的。他借了貧農的眼與嘴，觀察着與說明着法西斯主義的根源及其發展，並暴露出法西斯制度整個兇惡的真相。法西斯意大利真實的統治者，並不是那位叱咤風雲的莫索里尼，而是以『安洛倪王爺』作代表的那個階級。『安洛倪王爺』是誰呢？據西龍告訴我們：

『他在羅馬做投機事業，起初靠着戰爭，以後靠着和平，以後靠鹽……一八六〇年之後，由於一個西，法，拿三個合股公司股票底跌價，他居然占有了這個公司；依照拿破里國王賜予這個公司的權利，安洛倪有九十多年使用這齊諾湖乾涸地面之權，但因他有功於畢孟王朝，他就得到這肥沃區域永久占有權以爲酬報。初時他僅封公爵，以後陞爲王爵。』（引文根據綺紋君譯本）

他擁有『孚齊諾區域一萬四千公頃的地產，連同羅馬附近以及托斯堪那區域許多巨大的地產。』此外，安洛倪王爺當然也和『企業家』一樣，『他就是銀行，他有一個印刷鈔票的工廠。』而『銀行的生意』甚至還做到『養豬，造屋，硝皮，燒磚等類的事情……』安洛倪王爺在意大利等級制中所占的地位，據貧農彌迦勒看來是：

『頭一個是上帝，他是天底主人。其次是安洛倪王爺，他是地底主人。其次是安洛倪王爺底護衛。其次是安洛倪王爺護衛養的狗子。其次沒有了。其次又沒有了。其次仍舊是沒有了。其次就是貧農。以後就沒有了。』

『那末政府呢？你把政府放在那一級呢？』

『政府麼？』邦丟士·彼拉多插進來解釋道，『政府一部分是在第三級，一部分在第四級……就是狗子那一級，數目是非常之多的。』

原來莫索里尼只是『安洛倪王爺』即意大利財閥與地主的護衛。而大批的法西斯徒黨則是『安洛倪王爺』護衛養的狗子！

這些『護衛養的狗子』是什麼人呢？中間經過的變化，西龍讓那個『辟亞門的英雄』佩平諾，戈良諾告訴我們了。大部分是那些想到羅馬發財去，結果非但發不了財，還每天在生死線上掙扎着的貧農。我們被警察僱去做『政治工作』，以每天『五里爾』的代價，去和『電車工人，煤氣工人與燒磚工人……打架』，有功之後，則可以『每天領二十個里爾，還有一張電車派司，還有

打人的權利，而且不會給別人打……」

至於『安洛倪王爺』的護衛們，即構成法西斯黨幹部的是些怎樣的人呢？據『佩平諾』的話說，那是『軍官，大學生，官員，時髦太太，商人，教士，其中一個是加洛羅哲大人』。

佩平諾式的流氓化的貧農替『安洛倪王爺』及其『護衛』們打敗了工人之後，『法西斯拿了權柄』，論理，『佩平諾們應該得到更好的位置了』，但是『其中的老年人竟觸霉頭了……』『法西斯不容許那曾為盜竊而受刑事處分的人在牠的組織以內』，『辟亞門英雄給開除了，其他的朋友也是這樣被開除了。貧農們妄想爬上『第四級』去，一下又跌到末級了。』

從上面簡單的引文裏，我們可以窺出了法西斯主義的秘密：財政獨占資本的統治之下，農村極度破產，小資產者迅速地赤貧化，工人在這普遍的太平中奮起革命，安洛倪王爺們就指使『加洛羅哲大人』以及軍官與大學生等出來利用『佩平諾們』，藉以打擊工人的社會革命。然後再打擊那些『辟亞門的英雄們』，鞏固了獨裁政制，這便是法西斯主義發生的經過，也就是馬克思主義者關於法西斯主義的正確見解。

不過正確的意識，雖然是某一種作品的重要因素，但非決定的因素，所以要確定某種作品的價值，還得從藝術方面來研究。

俄國十九世紀最傑出的文藝批評家培林斯基，當他論到戈果理的小說時說道：『對於任何著名的作家，假使要給予一個確當的評價，那就必須要確定他那創作的性質，以及他在文學上所應

占的地位。』我們對於西龍的作品，也應該以這樣的方式來加以批評。

讀了西龍的作品，尤其是豐塔馬辣，總不能不使人發生像培林斯基讀了果戈理小說後所發生的那種驚嘆：『這一切是多麼單純，普通，自然與真實，同時可又多麼的獨創與新鮮呵！』西龍作品裏描寫的對象，不過是些意大利窮鄉中的『卡風尼』（貧農），他們的生活既是『走馬燈式』的乏味，他們的故事又是那麼樣的平淡。至於他描寫的方式，則更是農夫村婦平舖，直敘的老法；是不管這一切，他的作品仍舊是這般的生動活潑。他絲毫沒有把可『卡風尼』的生活美化，也沒有滲入任何幻想的成分，他描寫的只是真實，是醜陋的，悲慘的與日常的真實，但你讀着這些平淡的故事，却莫明其妙地會感覺到一種美，一種祇能稱之為『詩意』的情感！為什麼會如此呢？這兒唯一的解釋就在於西龍是一個貧農的詩人！

培林斯基說：『故事愈通俗，愈平常，這就是說，假使那小說底內容愈能引起讀者底注意，那末著者方面也愈需有偉大的天才。當一位中才的作家，來描寫強烈的情感與深刻的性質之時，他能怒立，能緊張，能說幾句響亮的獨白，講幾件美麗的事物！他能以漂亮的結構，雅緻的形式，很好的內容，成熟的故事，綺麗的詞句，即以自己的博學，智慧，教育與生活經驗的結果來欺騙讀者。但是他要他描繪生活之日常的圖畫，描寫普通的與散文式的生活，那你相信着吧，這將成爲他真正的絆腳石了，他那滯

鈍，冷淡與無靈魂的作品，將永遠不能副你的期望。』這一段話，我們可以不改一字地拿來稱許西龍的天才。

西龍作品中還有一個特點，我們不得不指出來的，即是他那種巧妙的與平靜的幽默。西龍和果戈理一樣，『他能在自己的憤懣中維持平靜，在自己的狡滑中保存仁厚。』本來在西龍的作品裏，每一個字都反對着法西斯制度，但表面上你決計看不到咬牙切齒的仇恨；他每行每句都在暴露着意大利現存統治的欺騙與殘酷，但你所見的却是些愚蠢可笑的『卡風尼』，甚至還不大找得到『法西斯』和『莫索里尼』這一類的名字。他書裏祇告訴你一些令人苦笑的真實生活，不向你作這樣的叫喊，例如：『看哪！這是法西斯的罪惡！』但你却自然而然地會對法西斯制度表示極度的憎惡。如果愛密爾·左拉的話說得對，那末西龍的作品確實達到了『小說不應該祇描寫環境，而也應該改進這些環境』的這一目的，實在說來，真正的藝術品總是不為人生而又為人生的。而那所謂『為藝術的藝術』，如果仔細地將牠分析起來，又何嘗不為着某一階級的人生呢？不過這階級多半已耗竭了牠歷史上存在的進步意義，所以不得不拿『純粹藝術』的幌子來做掩護罷了。

西龍的小說是最好的藝術品，同時也是最好的宣傳品。

西龍在文學上的地位，現在一般人最歡喜把他和左拉相比。

兩者無疑有許多相似的地方。但如果一定要在自然派 (Naturalists) 中尋找他的前輩，那我個人是甯取果戈理的。因為在十九世紀後半期的法蘭西，即左拉創作的全盛時代，資本主義正在

向前邁進，那時政治上與社會上的醜陋與罪惡，和目前的意大利相去甚遠。那時已在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的治下，民主主義與自由主義占據着絕對的優勢，所以左拉的作品是比較可以公然說話的。而目前法西斯治下的意大利，雖然『城裏人坐着飛機飛上天，而貧農們則仍舊用着他們的木犁耕田』，牠雖然是銀行資本統治了全國，但鄉村中的落後與愚蠢，却與沙皇時代的俄國鄉村差不多遠，至於莫索里尼的獨裁與『安洛倪王爺們』的統治，則更與沙皇和他的地主貴族專制一模一樣。正因為有這點文化與經濟上的相似，所以西龍說：『革命前的俄國文學，在目前的意大利最為流行』。在痛苦無告的高壓的政治之下，幽默是反抗的最初步的亦是最有效的表示。西龍與果戈理在這一點上是同樣的聖手，而且也會收得同樣的結果，雖然西龍是『卡風尼』的歌者，而果戈理畢竟還是地主們自己的詩人，他把『靈魂』們描寫成一無靈魂的東西，但這不是果戈理的錯誤，那應該由時代來負責的。

總之，當莫索里尼的政制崩倒，消滅，乃至被人忘卻以後，西龍的作品還將永遠做着人們精神的食糧。

馬克思的情詩

三男譯

石濱知行作

馬克思幼時，贈給他的未婚妻，後來成爲他一生之妻的燕妮·方·魏斯脫法倫，作爲愛的紀念的三冊『愛之書』『詩之書』詩稿，法朗次·

梅林格讀了之後，說：『依我之見，他那詩的粗野性，決不會因爲他的創造才能而稍減，現在如把牠重印，那對於作者，怕是一種不愉快的錯舉吧』。（遺稿集第二卷書後）莫斯科馬恩研究所從事編輯全集的梁尙諾夫，（今已代以阿特拉次）

以前也贊成梅林格這個意見，但當搜集馬克思之著作時，特別爲要知道與『阿台諾衣姆』雜誌的關係起見，就覺得非把這些詩稿重印出來不可了，嗣後，特別當那贈給父親的詩稿發見以後，梁尙諾夫認爲比以前的有顯著的進步。『這些詩的試作，對於馬克思之教養過程，發展過程之歷史的了解，具有重大的性質。』（全集德文版第一部第一集第一第二分冊的序言。）據梅林格的意見，像他在後來說的，馬克思的詩，是祇值得低下的評價的，但想到馬克思那時才是十八

九歲的青年，再把當時的各種狀態想想，那末梅林格的評價，我想也不能說是不變的與絕對的吧。我以前曾把馬克思的詩請專門研究德國詩的人看過，讀了，他對於這些詩的作法，非常驚奇，就詩論詩，據說也值得相當高的評價的。

現當馬恩全集中，安崗，佐佐木兩氏將該詩譯成日文之時，此地做一點解說的文章，我想多半不會是『對作者的一種不愉快的錯舉』吧！

馬克思幼時，在那愛好維德與來辛奴的父親之養育下，又與那博通荷馬及沙士比亞的燕妮之父相接近，這一切，對於他文學的素質上，有不少的影響。

馬克思於一千八百三十五年十月，讀畢了故鄉脫利哀爾的五年中學課程，進了盤恩大學，當時，馬克思適十七歲，在盤恩大學祇讀兩學期，不過聽了一年的講。在盤恩大學時代，他似乎時常作詩，馬克思因爲他寫得不好，所以就是寫給父母的稀有的幾封信，現在也不存留了。唯有那

永遠關心兒子的身體與學業的人，寫給馬克思的書信，如今還在，且被發表出來，在這些信裏，時常有論到馬克思的詩作的意見。尤其在一千八百三十五年一月十八——十九日，以及三十六年年初的幾封信中，最看得出來，十八——十九日信的一節說：『你的詩，我一字一句地讀了，可是，我親愛的加爾，我不客氣地告訴你，因爲這詩的狂暴，及狂暴的傾向，我不能諒解這首詩。』在那首詩裏，曾將康德的人類學等加以論述，由此看來，馬克思似乎時常將詩寄送到父親的前面的，愛子遠離了，『看不到你一點兒痕迹』的寂寞的雙親，埋頭貪讀着兒子的詩，這是很可想像得到的，但最可惜的，這時代的詩，現在一點兒也不存了，或者這時代的作品，雜入以後的詩稿中也未可知，但關於這一點，現在在文獻上還不能加以證明。

得了父親的許可，馬克思於一八三六年之秋，轉學柏林大學，爲此，從盤恩回到脫利哀爾

來，與幼年的伴侶燕妮訂婚。秋十月，與燕妮作別，懷了無限的相思，離開了故鄉到柏林去，那時，馬克思的痛苦，於次年（三十七年）十一月十日致父親的信（唯一現存的信）中，很好地表示了出來。初嘗愛的滋味，即離故鄉。旅行到柏林，但並不有趣，和燕妮的分別，比臨危崖更險惡更難過，藝術和燕妮比起來，也是不美的了，這一類甜蜜的文句，充滿了篇幅。

進了柏林大學，因以前的苦痛，他斷絕了各種關係，也不去訪問什麼人，專門埋頭於『學問與藝術』之中，所謂藝術這東西，依馬克思自己的話說來，彷彿就是『抒情詩』。

這些詩，後來集成三卷，贈與可愛的燕妮，關於這三卷詩，馬克思的兒女，後爲阿威林妻的愛林那有如下的話：我藏有三冊詩，上面有如下的日子『一八三六年秋末，柏林』『柏林，一八三六年十一月，』『柏林，一八三六年』，這三冊詩很厚，寫得極美麗，頭兩部的題目是『愛的書，第一，第二部，』第一部署名爲 K. H. Marx，第二部署名，Karl Marx，這三卷詩集，獻給我尊敬的，永遠愛的燕妮。（新時代，十六年度，第一卷，第五頁）

馬克思死後，這三冊『愛的書』『詩的書』，落於其女勞拉之夫拉發格的手中，梅林格曾見

過，在遺稿集的序文中，說過一些感想。據梁尙

諾夫於一千九百十一年訪問拉發格的家時，曾由勞拉之手借來看過，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拉發格夫妻在特拉凡也的別墅中相偕自殺，因此，三卷詩集，又自拉發格家轉入馬克思之外孫（係馬克思之長女燕妮與夏爾·朗格之子，馬克思唯一生存着的孫子）約翰·朗格之手，被人借去看，以後就不知道弄到誰的手中去了，梅林格的地方又沒有，這據說成了不能猜破的謎了。因此，這三卷詩集，如今是看不到完成的形式了。只有梅林格在前記的感想中引用了四節及在他獻給父親生日的詩集中，推測出以爲是混入的幾首（『人魚之歌』，『羅興台』，『二人的豎琴歌』，『星歌』，『蒼白的少女』等）外，再沒有別的了，就梅林格所記的看來，那末內容除上述幾首以外，彷彿還有如下的幾首：『妖魔之歌』，『格諾門之歌』，『鐘樓守者之歌』，『歌者最後之歌』，『關於阿爾本及羅沙門台的敘事詩』，『坟墓的史詩』，『浪漫的豎琴之音』等，全部究有幾首，那是不明白的。

現在我們試把其中的一兩首講一講吧，『二人的豎琴之歌』，是一首敘事詩，詠的是兩個彈豎琴的女子，思慕着城中一個不相知的男人，來到城下，在關閉着的城門之前，交談着戀他的

話。

她黑髮在風中飄盪，
淚潮兒不住的流淌；
還有一個拭乾她的面頰接吻，
將她緊抱在熱情的胸膛。

這樣，她倆在那關閉着的城門前蜷伏了幾日。

幾日來她倆在此處蜷伏，到黃昏弦聲飛渡，這哀婉淒切的怨訴，感動了小鳥和花朵。

有一個時候她倆枕着腕，躺在軟軟的苔床上假眠，突然出現了一位巨大的半神半人，把她倆載在他的金翼上，向高處升起了。

『蒼白的少女』，也是一首敘事詩，此地佇立着一個臉色蒼白的少女，她忠厚優雅而信神，那裏，『眼中有愛的海與情熱的箭』的騎士，跨着美麗的馬過去了，那情熱的箭，深深的射入少女的胸中，騎士却迅速地馳去了。

寂靜的安閒飛去了。
天國沉淪，
心兒變作愁城了，

相思昏昏。

少女在晚上祈禱，追想着那逝去的男子的面影，幻想着他正抱着別的女人吧，很爲苦惱。

洶湧的大波中，

少女捨身，

幽黑的寒夜裏，

惘然而行。

少女充滿了愛情的眼睛閉着，紅的嘴唇也變了色，少女的眼睛再不醒來了。

尊貴偉大的騎士，

被情婦的柔腕擁抱，

彈着愛與幸福的琴調，

在靜靜的夜裏響着。

『坟墓的史詩』據梅林格說，是講拿破崙的，其中，拿破崙被地裏的精靈控訴其破壞世界，但光明之神却加惠於他，引他到星上去。

批評這些詩，不是我的責任，馬克思自己對於這三卷詩集，有如下的批評：『我的立場，乃以前一切的發展使然，這詩是唯心論的詩，正與我的戀愛一樣，遙遠地橫在彼方，是我的天國，是我的藝術，一切現實的東西都消失了，這些消失的東西，看不出有何等界限，及與現實有何等關聯，只是漠然的一點無形的破碎的感情，絕無類似自然的事物，一切是由月亮裏造成的玄

物，在這裏，所有的東西，並不是可能有的東西。修辭上的雕斲，代替了詩的思想，不過，在做到感受性與感興的努力上，恐怕還有一點熱情，這是我送給燕妮的最初第三卷詩中的一個特徵。』（改造社版，馬恩全集，第二十卷，福田德三本多謙三兩氏譯文），勞拉·拉發格寫給梅林格的信上說：馬克思把這三卷詩看成無益的東西，每當談及這些詩作時，馬克思總是大笑他青年時代的傻事。

梅林格在遺稿集一卷的序文『幻想的詩人』中，對於這些詩的批評，茲簡單地介紹於後，梅林格警告人家道：若以爲馬克思青年時代的詩，是有美學上的價值，那是不對的，馬克思十八歲時，離狂飈時代差不多有六十年了，如不明此時的空氣，而當牠是狂飈時代的詩來批評，那是不對的，講到馬克思藝術的才能，自然是有的，他屬於十九世紀第一等的古典散文作家中，可與萊辛及歌德相媲美，但詩的技術是粗野的，假使不知道這些詩作的時期，那末誰都不會想到牠是寫於白來登死後一年，海涅的『歌集』出版後九年的吧。就他青年時代的詩來說，雖然是馬克思，但還是未曾有過的幻想與平凡的，就詩說，馬克思比當時的希脫老司或郎格，在其未成名時所作的爲差，『他缺乏那從虛無中構造成一個世

界的詩的創造力』，馬克思批評自己的詩說，『只有在做到感受性與感興的努力上還有一點熱情』（前述），這是他詩的特徵，是他贈給燕妮之詩的特質，而這熱情是幻想的，甚之是誇張的，與其說是浪漫的，毋寧說是古而不美的，例如席勒的『羅拉』。

以上是梅林格批評的概略，至於馬克思的父，對於馬克思的詩，也是評得很低的，這一點，可以從盤恩時代的父信中推測而得，有一點，對馬克思的詩，曾加以『醜惡的生產物』之酷評，使年青的馬克思悲哀，但父親的批評，主要是從道德立場上來的，常常用以警戒年青的馬克思的狂熱的氣分。

受着這熱烈的情詩的贈與的未婚妻燕妮，對於這些詩究竟怎樣呢？馬克思之姊素斐於一千八百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致馬克思的信中，有一節說：『燕妮在愛你了，昨天她到我們這裏來，接受了你的詩，哭出了歡喜與痛苦的眼淚。

（全集第一部第一卷第二分冊，一九九頁。）寫給父親的信中，有一節說：『贈給你最近的一分冊』。這一分冊，係史坦因氏受了馬恩研究所的委託，在那於一千八百五十一年與馬克思友善的開恩醫生羅蘭特·但尼爾斯（一八五五年死）的文庫中發見出來的，一千八百四十九年，

馬克思因二月革命後的反動，逃到開恩時，所有

的書籍都寄託給但尼爾斯，五十一年，賣去了一

部分，其他的送至倫敦，馬克思的詩稿，即於此時贈於但尼爾斯，以致謝意，這稿是贈與父親的詩稿，是當父親五十五歲誕辰紀念時的贈品，封面上寫着：『一點永久的愛的微意，於一千八百

三十七年之誕生日，獻給尊敬的父親，——H. Marx, Berlin，這是馬克思第二個詩集所搜

集的詩，一共是選出來的三十九首，主要是一千八百三十六年至三十七年四月之作，在此近四十首詩中，有幾首是前述贈燕妮的詩集中有過的，其他諸作，怕是以後的作品吧，對於這一詩集，梁尙諾夫以為同那被梅林格評得很低的詩集比起來，在馬克思的教養過程與發展過程的歷史上，有重大的意義，前後兩詩集的創作期，僅差兩三個月，而後者中，已經看得見『內部發展的進步』了。

三十九首詩中，十二首是史詩或敘事詩，其餘，大部分還是抒情的，幻想的詩。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其中的一首『私奔』吧，騎士立在銖門前，美麗的姑娘探出窗來，但是怎樣下來呢？騎士拋給她一條繩子，姑娘是一味地戀着那男人，因而說：像盜賊那樣地逃罷，騎士說：我們二人同逃。姑娘同自己的房子告了別，

縋索下來了。

姑娘縋索未及半，
二眼昏眩臉蒼然，
腕力欲竭猶掙扎，
抵死往下落。

姑娘對騎士說：讓我們擁抱了同死罷，他抱住了姑娘。

『再會吧，我可愛的人兒喲！』
『等等吧，我跟你走遍天涯！』

永久的火焰在他倆的頭上閃耀，
二人相偕，白頭到老。

此詩，帶着前一詩集的同樣調子。

敘事詩與史詩仍舊是最多，這是對的，但在這中間，馬克思的眼睛已經轉向到社會的殘敗者了，在『被宰割者』中，詠着一個受盡了人生的冷酷與貧困的女子之末路。

惟本集較之前集，其顯著者為加進了諷刺詩，或藏着諷刺之針的詩，與嘲罵的詩，對於俗人根性或其他現實的批評詩，題為『醫生之心理』的二行詩為：

黃昏時狂吞麵條與團子的人兒，
半夜裏願你夢魘罷。

『數學家的智慧』，係諷刺數學家的戀愛觀的，因他一切都以數字來解釋。對於醫生的諷

刺，則有『在你們說來，全世界只是包着骨頭的袋。』

『柏林的維也納猴子戲』，乃是給『猴子演的喜劇』迷了，於是另一個男人對男人講，關於猴子姑娘一邊說話一邊假死的情形。

猴技嚙我心，
恍被磁石引，
猴演妾自身，
此奴實可恨。

『阿爾密達方·力達克而克』也是講某人與貴婦人在戲院中會話的諷刺詩，從這些諷刺詩與嘲罵詩中出來，使馬克思後來成為大的嘲刺家。

康德與費希德在宇宙上彷徨，
探求那國土——遙遠而渺茫，
我只是堅定地把捉着
那街道上發見的事物。

就是在這首詩裏，已彷彿地現出了後來馬克思的面影，在這一點上說來，贈父的詩，較之前三卷詩集，對於我們有更多興味，倘就詩而論，也當分別評價的。

自贈父之後，馬克思到底做了詩沒有，怎麼也不能知道，至少，以後的詩，現在是已無有存留的了，只有由柏林大學青年文學家發行的週刊雜誌之一千八百四十一年一月二十三日的一號

上，有馬克思的兩篇詩，『樂人』與『夜之戀』，但這兩首已搜入贈父的詩集中了，以後所作的就沒有了。

一千八百三十七年以後，馬克思似乎沒有做詩，雖然他的週圍集合着很多的詩人，如海涅，弗拉利拉，威爾特·皮納爾，布黑納爾等。

恩格斯在年青時，也作過很多的詩，自有一次讀了歌德的評論『爲青年詩人而作』以後，爲什麼不作了，這原因可不知道。

馬克思詩中，有一首名叫『魔之豎琴』的敘事詩，有一樂人，某時被一種不可思議的樂音喚醒，金色的光輝閃耀着。他聽見說，樂人喲！來吧！樂人被這種力量引着走去，到一扇門前，門中傳出一派美妙的歌聲來，樂人是精神恍惚了，說道：

琴兒在歌着自己的心，

這是我的苦惱，我的自身，

這是我靈魂裏出來的聲音。

馬克思歌着自己的靈魂，與『魔鬼的豎琴』衝碰了，因之自己停止了歌唱吧？這也是未可知的。

x

x

x

讀者雜感

義方

如果歷史不常在重演的話，那末歷史也許將失去其全部意義。最近無意中翻閱巴金譯克洛泡特金的自傳，讀到關於波蘭一八六三年獨立戰爭那一節，不禁引起了無限的感喟。

『一八六三年波蘭革命爆發的時候，……勇敢的波蘭人底壯烈的奮戰，以及他們用以抵抗強敵的那種不屈不撓的精神，終於買得許多人對於這英勇的國民的同情……俄國的急進派也不滿意波蘭革命政府中純粹國家主義派之得勢。革命政府完全不肯把土地給與農民。這是一個大失策，俄國政府竟利用着這個失策來表示自己是保護農民以抵抗波蘭地主的』。

『我底堂哥（他參加鎮壓波蘭獨立運動的戰爭——義方）對我說：「革命黨底武裝隊伍守着鄉間，我們沒有力量去擊敗他們，甚至於找不到他們在什麼地方。他們底小隊時時來襲擊我們底更小的分遣隊，他們非常善戰，又熟悉地理，而且得本地居民底幫助，所以他們每每在小的混戰中獲勝。因此我們也就不敢聚集大隊進攻。我們常常走過一個地方穿過樹林，找不到一點敵軍底蹤跡，可是我們剛剛轉身回去，又聽見他們在後面開槍了；我們知道他們在鄉間徵收一種愛國稅；如果有一個農民給我們軍隊效了一點勞，那末這個人就會被革命軍絞死在一株樹上。這樣地相持了幾個月，毫無進步之機會，等到米魯丁與柴爾加斯來解放了農民，把土地分給他們以後，於是形勢完全變了，一切障礙都消滅了，農民擁護我們了；他們幫助我們捕獲革命軍的徒黨，暴動最後便完結了』。

『一個革命在最初爆發的時候就應該做一件爲那般「被踐踏的與被虐待的」謀福利之正義的行爲，不要單是空言允許將來才做這樣的事。不然革命必歸失敗。不幸事實上領袖們常常專心一意地想到戰術上去，竟忘掉這件大事。如果革命黨人不能夠使羣衆相信一個新紀元已經爲他們而開始出現，那麼他們底企圖必敗無疑。』

上面這段引文能教訓我們一些什麼東西，聰明的讀者想來是毋須解釋的吧！雖然我們東鄰的將軍中決不會有米魯丁那樣的人；但是中國的『被踐踏的與被虐待的』，如果沒有得到『福利』，那末獨立戰爭的大業，是否也會踏一八六三年波蘭的覆轍呢？

安那其主義在中國

張道同

一天，在重慶的書店裏，翻閱汗牛充棟的新出雜誌，抱着滿懷的奢望，想領略後方人們的抗戰意見。可是翻來翻去，今天和昨天一樣，稍微有點內容的，八股氣味較輕的雜誌，實在太少。烏烟瘴氣籠罩着一切，悶得人快要不能呼吸了。忽然發現了『驚蟄』，薄薄的周刊式的本子，米黃色的四川土紙，成都出版，無政府主義者的刊物。稍微翻閱了一下，我驚得好似在漫無邊涯的沙漠中發現了綠草與清水。即向書店夥計把他們所存的該刊前幾期，每期買了一份回寓。

我細細地讀『驚蟄』，這刊物專門宣傳無政府主義的ABC，忠誠地替主義服務。我很想知道無政府主義者的抗戰意見，但我所買到的三期（第三卷初三期）中，無一篇觸及中國抗戰問題的文字。這乍看起來不免叫人覺得可異，然平心一想，實是應該同情的——只宣傳原則，不比連原則都宣傳不出去好得多嗎？當天我寫信給一個朋友說：『今天偶然發現了幾本無政府主義者雜誌，雖然談的太玄虛了，然而在此惡濁的出版空氣中，有此亦可以清心，可喜事也。』後在港滬，又看見巴金先生主編的幾種無政府主義的著作，及重版的克魯泡特金自傳。於是我知道，中國的無政府主義者又在工作了。

自從一九二七年革命運動慘敗以後，中國無政府運動的那點萌芽，顯然也受了摧殘。李石曾吳稚暉之類到官場中去了，麵包略取等書的譯本，只在舊書攤上才有蹤跡。讓該叛變的都隨着潮流消滅吧，然忠實於主義的人，自然不會因潮流惡濁而潰散其願望與努力。像論『公式主義』那樣文章（見宇宙風），決不是無勇氣的人能寫得出來的。目前中國各方面，都需要以勇氣和血去挽救沉迷並開闢新路，無政府主義至少可以從混濁潮流中提高青年人的思想。自由是社會主義所企求的偉大目的，『沒有什麼能代替自由；牠沒有任何代替者。毀棄自由的人，就是毀棄社會主義意識的本體。』——像這樣的思想，雖然在本質上是不正確的，因為空洞的自由只是一種欺騙，而窮人在現社會中所得到的自由，往往只是失業與挨餓的自由，不過對於一般頭腦混亂，以暴力專制為進步現象的人們，也不是沒有益處的。

所以我願見中國無政府主義者的努力！

不過我雖尊敬無政府主義者的理想與再起的勇氣。但我不得不說，無政府主義運動在中國是無出路的。歷史的教訓，中國的現狀，中國無政府主義者的工作態度，都使我不得不如此說。

無政府主義在資本主義初期，曾一時蓬勃於歐美各國。後來

隨着資本主義的更前發展，社會生產組織的益加集中化，與小資產階級的社會比重的減輕，於是各國的無政府主義運動漸由衰落而歸消失，到大戰以後，只有工業落後農業經濟佔優勢的伊百利安半島成了國際無政府主義的最後巢穴，只在這裏，他們還有羣衆的組織。這點歷史事實，表明無政府主義的社會基礎不是工業國家的廣大無產者羣，而是工業落後國家的上層小資產階級。但是幾個月之前，佛朗哥的軍事勝利，而不是西班牙的經濟發展，又把無政府主義的最後巢穴摧毀了。不僅摧毀了西班牙無政府主義者的羣衆組織（C.N.T.F.A.I.）實際還摧毀了無政府主義理論的本身。因爲無政府主義者的中心主張是反對一切政權，反對組織政黨，鄙視任何種類的政府；可是當法西斯叛軍逼來時，西班牙的無政府主義者，不僅以最卑鄙的政黨身份參加了政府，不但擁護政府，而且所拚命擁護的竟是資產階級政權，並替牠壓毀無產階級民衆的政權。這事實表示，無論無政府主義的理論怎樣好聽，但在階級鬥爭的鐵的事實面前，這種好聽的理論已經破產了。並且由於他們輕視政治，所以西班牙的約三年長期內戰，又表示出他們不懂得革命的規律，不懂得革命的問題。一九三六年七月與一九三七年五月，西班牙政權本已落在羣衆手裏，但無政府主義的領袖們告訴工人說：『我們不吃這串酸葡萄』——政權，於是他們把政權又交回資本家之手，結果是資本家向佛朗哥投降，而演成了法西斯的最後勝利。像這事實，都是昭昭在世人耳目，今後無政府主義還能在世界何處建立牠的堡壘呢？

中國是個工業落後國家，經濟背景還有利於小資產階級意識的發達，因而無政府主義運動似乎還有在此得勢之餘地。但這只是一方面的觀察。就整個世界形勢看來，現在早已是帝國主義時代，而且中國早已成了國際帝國主義的決鬥場，社會鬥爭的尖銳與複雜，在上次革命時，已不亞於此次西班牙內戰的情形，更不必談今後革命來到時候了。在這種局勢中，決非鄙視政治鬥爭，不懂亦不願懂政治鬥爭的戰略與戰術的無政府主義者，所能有所作爲的，而且中國的革命民衆，在有了悲慘失敗的革命經驗後，也決不會接受無政府主義的虛幻宣傳。這種客觀條件，決定了無政府主義者在中國的悲運。

再就中國無政府主義者的工作態度說，可以說自從這種運動在中國開始以來，他們並未想到『到民衆中間去』。他們的活動方式始終是知識份子；翻譯名著並作文字宣傳。當然，翻譯介紹與文字宣傳在任何政治運動都是必要的，尤其是在運動的初期，無政府主義運動當然不能例外；然如果以這種工作方式自限（恕我用此二字的冒昧，我深願聞中國的無政府主義者並不如此，但『驚蟄』之避不觸及抗戰問題，令人更不得不更發生如此感想。）則無政府主義者便決不會在中國起改造社會的作用，甚而還毫無發展其運動之可能，因爲在帝國主義即將滅亡的時代，能改造社會的只有廣大民衆的力量，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最多只能有幫助的力量。

這種種方面，說明了無政府主義運動在中國無出路。

在『驚蟄』第三卷二期上，譯載有洛克爾(R. Rucker)的一篇反對專政的文字。他說，『一切真正的革命，其特徵不在於牠所毀滅的。而尤在於牠所創造的；而且在於引人達到新生。』這話當然是對的。但怎樣擺脫現存社會制度的桎梏而實現這樣的真正革命呢？洛克爾說，絲毫的專政手段都不許用。『獨裁強暴地破碎了革命意識的創造力，於是剛在萌芽的時候，社會進化的一切新的觀念與新的希望，便都被窒死了。所以獨裁絕不會引起革命，而只是反革命的前哨。要消除社會生活的權力原則而不是奪取權力，這才是社會主義所應企求的偉大目的。……』這幾句話可代表無政府主義者反對專權，反對權力政府的名言，同時也犯着所有無政府主義者的共同錯誤，即把個人獨裁與一般的權力混亂起來了。個人獨裁固然會窒息革命的創造力，但假使根本排斥了權力，那所謂『革命的創造力』將成爲一句空話，而『社會主義所企求的偉大目的』，也將永無實現之望了。尤其是在法西斯的野蠻獨裁壓制了一切之時，不用民衆的權力則民衆組織是否能夠

自保，是否能更進一步地進攻。對於這一問題，無政府主義者在西班牙的事實答覆是：當佛朗哥的法西斯叛軍來到時，他們急忙地躲避到權力下面，而且還是資產階級的反革命的斷送了幾十萬無政府主義者工人的生命的權力下面。

無政府主義運動假使能在中國開展，至少可以教一些青年認識社會主義社會的本質是什麼，自由與個性發達對於社會進化的關係，反過來說，即至少可以教青年消除人們那種盲目地崇拜赤色招子的意識。因此，我祝中國無政府主義運動的發展。但是歷史的教訓與當前的事實，都不容許我們承認無政府主義運動在中國有一點出路。因此，我更希望中國的無政府主義者就西班牙內戰的新鮮教訓，就無政府主義產生的時代背景與目前時代背景的差別，再就中國的客觀局勢與羣衆需要，而審察他們的主義的錯誤與缺點，而改變並確定他們的工作方式與努力方向。這是達到他們那權力消滅的個人絕對自由的社會之第一步。

祝中國的無政府主義者努力！

窮巷之一年 (小說)

謝少翁

窮巷在滬西，有個很好聽又俗氣的巷名——永慶里。當牠誕生的時候，主人就命定牠不能做富巷，連名字都沒有起一個，家家戶戶，前前後後，都只知道牠是『四十九間』。牠滿七歲的當

兒，主人才跟着一般大財主學樣，題了個很吉利的弄名，但是，人們沒有理會這件事。

窮巷本來只有四十九間房子，五條橫弄；現在，跟着主人的

發財，前後添造起幾倍的房子；有十六條橫弄，一百七十幾間房子，雖然如此，大家還是叫牠『四十九間』。

弄口沒有任何標記，已滿二十五歲的『四十九間』，實在再也不要這些東西。弄裏共有四個公用自來水龍頭，牠們總是流淚一樣的吐水。

窮巷在『八一三』之後曾遭殃一次，隔弄賽璐璐廠爆炸，燬了三間，傷了一間，四間房子裏的生命，只留下十個人不到。大人先生們大發慈悲，一條性命賠一百元至二百五十元不等。從此，窮巷留下個深刻的創痕——一塊空地，窮小癩二們多了一處遊戲打架的場所；在晚上，這裏是一批『英雄』的用武之地，他們玩石鎖和石担子。

窮巷的冬天是最不值得說的，晚上八點鐘就路無行人，白天，做夜工的窮人躲在無風而黑暗的地方睡覺，做日班的已在廠裏，單衣薄裳的女人和小孩，不敢出大門。除了上工放工時，有一羣寒得打戰又垂頭喪氣的工人，攜着或挾着飯夾來往之外，沒有一點別的現象。一切都是死的，就是這好幾千人也沒有一絲生活快樂的微笑。不過窮巷之冬有例外的一天——舊歷年初一。

年底領到的工錢不夠正月份的開支，窮人們却多少要有一種表示，對祖宗表示敬孝，對財神菩薩表示希望，希望明年所賜與的是『好』而不是『壞』；表示的方式，小孩子都明白。

窮巷之冬就只有這一天，也可以說全年只有這一天是活躍的，快樂的，狂歡的，甚至是美麗的。小孩子和女人們紅紅綠綠

的衣服，家家門上的紅春聯或小紅方塊的『財神紙頭』，便是這一天的美麗的點綴。今天，大家忍着罵人，見面就說『恭喜發財』，然而，誰都擔心着明年會更窮，憑空發財的念頭一分鐘也留不住。說『恭喜』時的強爲歡笑，等對方看不見臉容時，仍舊把那麼一付哭相掛了出來。早晨起身時人人都記着不准罵人，但是，在賭錢攤上，在轉糖攤的周圍，和平日一樣的罵着『×你媽媽！』不客氣時會不顧身上的新衣服打起架來，有些女人因爲小孩子的爭噪相互大罵；也有因爲旁人打了一下他心愛的狗罵起人來；然而，年初一這一天，罵人的人總比往常要少些。吃過中飯，賭錢的仍舊在家裏，看戲的就三五成羣的跑外去。晚上，賭錢的人講着他的『賭經』，什麼自摸三代，什麼清一色……；另一方面，看戲的人更興高彩烈地表演他所看過的『好戲』。

一天過去了！最快慰最幸福的一天消逝了！窮人們又跌進痛苦的泥淖裏。

明天，汽笛和平日一樣的催促窮人動身去流血汗。明天，工廠的鐵門又照常吞進這些有活力的窮人，直到他們精疲力盡，才把他們吐出來。接着不差一分鐘的，又吞進另一批活力銷納他們的血汗。

人們咬着牙跟，準備渡過未來可怕的三百六十四天。誰也不能給自己半點保證。保證自己不會給機輪和皮帶軋死，給疾病累死。但，人人確切地有個預測，除了少數人之外，人人一樣的證實自己的預測——今年比去年更窮些，日子更難過些。

『少數人』是窮巷裏的大亨孫大老爺，開小雜貨舖兼作賭場的陳老闆，還有個布廠女大亨小蘭子媽媽。

孫大老爺是已死孫老太爺的兒子，他是窮巷的皇帝，他不出房租，六七十個徒弟歲歲進貢季季來朝。人家做喜事喪事，他不送禮却有吃有喝，他有事却人人非送禮不可。

陳老闆在流氓中間混過十幾年，現在是『正經人』了，但，人們仍敬而遠之。聽說他本姓李，五六年前做着一筆幾十萬的『生意』，分贓之後，從此改姓換名，躲在窮巷裏，過一世安樂生活。

小蘭子媽媽有三個老公，她是好幾個布廠的『保鏢』，那裏有罷工，她單槍匹馬，一壓便沒有事了。

窮巷的春天，沒有任何象徵，除了那肺病鬼的咳嗽比較緩和減少之外。一切都和冬天一樣，一樣的死，一樣的單調，沒人能想到夏天怎麼辦，更沒有傻瓜去打算秋天和冬天。窮人不懂『一年之計在於春』這句有名的話的深長意義，但事實上是這樣，他們沒有一點『計』的可能和把握；他們不像富人可以『計』半年一年，甚至幾十年幾百年。

清明節家家都有哭聲，死總是和窮人結緣的，清明節讓活人記起了死人。

夏天偷偷的到來，人們開始麻煩，開始騷動了！

四隻垃圾箱和四個自來水龍頭差不多並列在一起，洗米洗菜會有不少額外的『香料』加入，洗白衣裳更不要想有白淨的一

天，單單隔弄的絲廠和附近工廠的煤灰，就可以使白衣服染上好多黑點，好在窮人大都是穿青色和黑色衣服的。

四個自來水龍頭，成天成夜被人們使用，沒有一分鐘停止。一百七十幾間房子，一共住八九百家，每家四口，起碼有三千多人。

白天，有二十人左右在等自來水，常常爲了這事打罵着；晚上最少的時候也有三四人，那時已是夜深二三點鐘了！

二十尺長，十尺闊的平房，攔樓下面分作三四間，攔樓上面分作二三間。沒有石灰的歪牆，凹陷的屋脊，凌亂不齊的瓦片，破銹鐵皮的天棚，破爛的木窗木門，高低不平七零八落的石子路。

窮癩三們不去管那房子已是舊得『不合衛生』，將發生倒塌的慘事。『大房東拆房子，吾們沒得地方去，吾們不搬場！』有個老太婆在乘風涼時這樣對他兒子說。

拆房子的風聲三個月以前就有了，沒有人去注意這件事。立夏節無聲無息地滑過，那天只有一個賣老白酒的小販鬧進窮巷，大叫：『甜白酒要哦！甜白酒！』

夏至接着來，吃粽子吃鹹蛋的人家家有，但要比比吃的數目那就太掃興了！前年吧，金獅子家裏的粽子，吃了三天還沒有吃完，雞蛋鴨蛋從早吃到晚，第二天還當做早點心吃了一頓。今年呢，裹三升米粽子，一共六十七隻，一家五口早上一頓吃掉四十五隻，送五隻給攔上大玲子嫂嫂，五隻給隔壁三麻子新娘子，

留下十二隻明天給金獅子帶到廠裏當飯吃。他家今年買了五隻鴨蛋，一人一個。

立夏過去了！夏至過去了！小暑大暑要來了！瘟病要來了！臭蟲蚊子要來了！（蒼蠅他們是不怕的。）

窮人沒有寒暑表，巷裏的窮教員每天看申報，他會告訴別人：『今天報上說，昨天是九十九度！』沒有人懂得『九十九度』是什麼意思，但大家也有些明白，大概『一百度』是頂熱了。

小孩子滿身紅痱子；男子赤膊，赤脚；女人穿起黑洋紗短衫褲；老太婆把髮髻打在頭頂上。

『熱呀！熱死人哪！』到處叫着。

弄裏幾十處『任意小便處』和垃圾箱競爭發揮臭氣。到處看見敲牀板捉臭蟲。

『×××死了！』『×××死了！』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中年的青年的，不斷有人死着，幾天之後，只有自己人還記着，自己家裏少了一個人。

老鼠白天公然出來尋東西吃，養貓的人家一天少一天。『人都快餓死了，養那棺材貓做什麼！』

窮人喜歡夏天每天下雨，和希望冬天每天晴天一樣。『天老爺』不管窮人，牠有牠的主張，牠在夏天和冬天一樣使窮人失望。

做夜工的人，在中午無論如何睡不着，尤其是睡在擱上的人，更熱的頭暈。

太陽落山了！每人坐到弄裏，檯，檯，牀板，門板，蓆，把所有的空地都佔滿。

說笑，講神怪故事，下流的小調伴奏着二胡，鴉片鬼說書的，趁機來做『野雞生意』。

十點鐘之後，由於白天的過度勞動，大家都就地睡覺了。露天睡覺是『不衛生』的，容易生病的。但窮人不管這些，他們有夏天的睡覺哲學：『如果關在小房子裏悶死熱死，還不如睡在露天得病死來得痛快舒服。』

夏天就像一團亂麻，人們在裏面亂過生活。今天不知明天事。擁進翻出的，像一羣沒頭的蛆。

小暑大暑過去了！秋天來了！窮人希望秋天的來臨，比在冬天希望春天更迫切。

秋之神，帶來了大批的病魔到窮巷，正似春之神帶了『幸福之花』到富巷一樣。窮人渴望的涼快天氣是到了，同時，意料之中的疾病和死亡也跟着來了。

破衣或蒲包裹着的小孩子的屍體，一個又一個的從窮巷中拿出去，塗一層車紅水的薄板棺材，一口又一口的槓出去，偶然也有一二隻『厚皮棺材』，那是家裏積下幾個錢的人家的。

傷寒，霍亂，腦膜炎，腥紅熱……，一切最利害最難醫的病，都在窮巷中猖獗着，流行着，窮人們祇看得起四毛錢一次的醫生，可是就使你出得起四塊錢，也請不到『好醫生』的，他們是怕不衛生的地方，怕不衛生的人，甚至怕窮人拿出來的不衛生的

錢的。

『打醮了！太平公醮！』大亨們手拿捐簿按家收錢，你不給，嘿！要你好看！

『起碼兩毛錢，越多越好！我們經手人是不賺錢的，以後有賬單貼在弄口，大家可以看的！』

沒有人敢說一個不字，也沒有人多出一分錢，更沒有人知道孫大老爺是否賺錢。

七月十四（陰歷）了！道士比鬼還神秘些，桃木劍東拍西打，亂舞一陣，左手端一碗清水，嘴裏咕嚕一陣，噴一口『仙水』。這樣做過多次之後，最後一幕是『上天台』。

道士手裏有一本『奏章』，這是呈給玉皇大帝的。右手拿劍，左手拿『奏章』，慢慢地小心翼翼地上檯子，再踏上椅子，口中念念有詞，爬下來把『奏章』燒掉了，接着焚化大批『紙錢』。

『玉皇大帝也要錢，沒有錢給他，他就不保佑我們了！想來有錢人一定每天敬重玉皇大帝，所以他們可以長命百歲。』

『婆婆！你錯了！有錢人吃的好，穿的好，住的好，不做工，所以他們比我們窮人死得遲，我們先生說的，就是窮人每天打醮，還是要死那麼多人的！』

婆婆嫌十八斤出不口吉利，怕得打了他一下耳刮子。（十八斤出生時已在胎裏十三個月，出生時塊頭很大，他爸爸就替他起個名字叫『十八斤』。）

秋天只有這一天有些熱鬧。老太婆，老頭兒，女人，小孩子，和大多數男人，都來看一年一次的好把戲。他們和她們是非常尊敬菩薩的，所以『身上來』的女人不敢去看，恐怕玉皇大帝知道她今天月經到來，還立在神的附近，一怒之下，全家遭殃。平時赤膊的男人，今天破天荒穿一件布衫。

鬼把戲完了，人們的眼睛花了，大家無聲無息的回家睡覺，只有孫大老爺和陳老闆很晚的還在喝酒，大家熟睡的時候，也是他倆造假賬的時候。明天，弄口貼一張黃紙，識幾個字的人看了一眼就不看了，不識字的人頭也不抬一抬。

十八斤的話一點也不錯，打醮之後，窮巷還是浸在死的恐怖裏面。

人漸漸的不死了，病的也一個一個痊愈起來，馬上重陽節又來了，袂襖袂褲穿上身，棉衣服還在當典裏，破被絮一條已不夠保暖，過期的被頭當票沒有用了。

冷了！冷了！冬天又到了！當掉單衣把棉衣贖出來，省吃省用買三四毛錢稻草鋪在牀上，單衣薄裳的過一冬。

『一個冬天好像過了一年。』窮人普遍地流傳這句話。真的，冬天一過，窮人們更顯得老些了。

窮人這樣一年不如一年的毫無意味的活下去，窮巷也跟着一年比一年破爛。

六月廿九日

我們怎樣參加西班牙的內戰

劉素英譯

蘇聯前任駐西歐軍事密探長克利維茨基作

蘇聯干涉西班牙的故事仍然成了目前行將結束底西班牙大悲劇的秘史。全世界都曉得有蘇聯干涉西班牙的事情。而且世間所知的大概止於這樁簡單的事實了。但還沒有人知道史太林爲什麼干涉西班牙，他在那裏怎樣進行他的活動，誰是負責他的活動的幕後人，又他從他的西班牙的冒險事業中得到些什麼。

蘇聯官員之直接參加組織蘇聯對西班牙的干涉者，只剩了我這一個海外餘生，而且目下還只有我能够自由揭露這近代史底戲劇式的一頁了。因爲我是蘇聯的西歐情報部主任，所以克林靈宮所採取的每一重要的國際步驟我都有份。我手裏握住了史太林外交政策的主要鑰匙，而西班牙的插戲正是這種政策的有機的一部份。

史太林的國船漂流到遼遠西班牙港口並不是出於偶然的。早自一九三三年希特拉上台以來，史太林的外交政策已成了一個苦惱的政策，這是因爲畏懼孤立而起的。在東方有方興未艾的日本

的威脅，在西方又有德國的威脅，在東西夾擊之中，史太林便向世界列強搜求一個強有力的同盟者。他拚命想和希特拉妥協，時而得到鼓勵，時而又受了挫折。他設法恢復舊日沙俄與法國的協約，但不能得到他所追求的那種強固的同盟。他與英國攜手的企圖甚至更少成功。一九三五年安東尼·艾登及賴發爾總長會正式訪問莫斯科。外交委員長李維諾夫會到華盛頓去，獲得美國的承認，並在日內瓦盡主角的作用。他得到遍及全世界的聲譽，然而他所得的僅一聲譽而已。倫敦是不會做確定的約束的。和法國訂立的條約簡直有如一根弱草，難於寄托。

莫斯科與馬德里

史太林一面追求安全，一面於佛朗哥反叛爆發後把視線轉向西班牙去。他把焦急的心情抑制着，像他一向所做的一樣。首先是一個靜觀及秘密探查的時期。史太林想證實佛朗哥的勝利不會

很快也不會很容易。

於是史太林干涉西班牙了，他滿想在馬德里造出一個克林靈宮底奴僕來。這樣一個奴僕在一方面會保證他與巴黎及倫敦的連繫，在另一方面則加強他和柏林及羅馬作買賣的地位。他一經掌握西班牙（在英法看來西班牙是生存攸關的戰略重鎮）的政府，他遂成了一個被人賞識的力量及一個被切望的同盟者了。而他的國境也找到安全了，這是他求之不得的。

但是史太林和墨索里尼不同，他在西班牙弄得很穩健。假如史太林能像墨索里尼冒險站在佛朗哥方面一樣的站在政府軍方面，則蘇聯的干涉在某一期中也許起了決定的作用了。但是史太林沒有冒什麼險。他甚至相信西班牙銀行的黃金足以償付他對馬德里的物質援助而有餘。史太林極力避免蘇聯牽入大戰中。他實行干涉政策時，他謹守着『站在砲火線外！』這句格言。這句口號通過整個干涉運動而成了我們的主要的口

號。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九日，即佛朗哥將軍揭起反叛西班牙政府的旗幟的日子，我適在荷蘭海牙的總部裏。我喬裝一個奧國古董家，和我的妻子一道住在那裏。這樣的假裝可以無形中掩飾我的華麗的住所，我所接到的大筆款項，以及我經常赴歐洲各地的旅行。

我幾乎盡全力在納粹的德國建立密探網。斯大林想和希特拉妥協的努力仍不斷失敗。克林靈宮對當時正在柏林談判的德意日協定非常關切。我正在密切的注意這個秘密協定。

帕蘭尼斯山外第一砲響的時候，我派一個密探到法西交界的漢底市，一個到里斯本，以便在佛朗哥區域內組織一個秘密的情報機關。

上述只是官樣文章的措置吧了。我沒有接到莫斯科關於西班牙的任何訓令，而且在那個時候，在我的密探和馬德里政府之間也沒有什麼連繫。我以蘇聯政府歐洲情報部底負責首腦的資格，簡單地搜集情報並把它轉寄到莫斯科去。

在柏林和羅馬，在漢堡和熱那亞，在伯里門和拿頗利，我的密探都報告我說佛朗哥正從德意得有力的幫助。

我把該項情報呈交克林靈宮，他們沈默地收下它。我仍然得不着關於西班牙的訓令。

祇有共產國際及世界各國的支部打破了莫斯科的沈默。共產國際的總機關老早就被推到無聲無臭的角落去了，同時它的宣言在我們內部會議中已起不了什麼作用了。斯大林本人曾經蔑地把共產國際視為 *Tavochka*——小店，這個形容詞就是牠流行於蘇維埃上峯間的綽號。

共產國際本來是特地為燃起世界革命而設的火炬，牠現在已墮落成爲斯大林外交政策上多少有點用處的輔助物了。他可以隨便在任何外國內利用他的 *Tavochka*，或者給一個不友好政府掀起一些內部的糾紛，或者在任何國際問題上影響輿論。

一九三五年『人民陣線』政策實行時，他便拿共產國際出來利用，在每一個民主國家裏面，共產黨的柔順的黨員都放棄了他們對統治政府的反對態度，並在『民主』底名義之下與其他的政黨聯合起來。他們的技巧便是藉助於他們的『同路人』和受騙者去選出一個親蘇的全國的執行機關。在法國，『人民陣線』——以 *Front Populaire* 傳名於世——已經把萊翁勃倫捧上台了。但是靠倫敦爲後台老板而在西班牙實行不干涉政策者正是萊翁勃倫啊。

在莫斯科的共產國際總書記特米特羅夫也是西班牙共產黨的負責人，他就是德國縱火案的英

雄，而這件案子也就是納粹統治德國的先聲。但是五年來的宣傳付了很大代價，而且還得了所有革命騷動的幫助，結果總共只製造了三千個共產黨員而已。

西班牙的職工會和所有強大的革命政黨，依然執拗地反對共產黨，西班牙的共和政府，已存在了五年，但牠仍然拒絕承認蘇聯政府而且和莫斯科還沒有外交關係，

黃金換成鐵

自然，共產國際方在臭罵佛朗哥。牠方在每一國家內組織羣衆大會和給馬德里募捐。牠從蘇聯派遣許多外國共產黨員到西班牙去，他們都是被本國政府驅逐出來在蘇聯過亡命客的生涯的。

西班牙戰爭給共產國際少數仍然懷着世界革命底理想的老領袖，帶來了新的希望。但這些革命家都是經過第一次流血清黨和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審判案』的劫餘者，他們都成了馴服的一羣了。他們的一切吶喊產生不出軍械，坦克車，飛機和一切軍需品，這些東西都是馬德里所需要而佛朗哥却從法西斯列強獲得的。

意大利和德國對佛朗哥的軍事援助已暴露於世，西班牙的各派革命領袖都拚命向外求援，克林靈宮一點回聲也沒有。西班牙內戰漸漸發展成

爲燎原之火了，但斯大林還是保持沉默和不動。

歐洲及美國的共產黨員和他們的同情者方爲這次革命激勵輿論及請求捐助，他們都在問，爲什麼蘇聯不幫助保衛西班牙的革命？

雖然馬德里的西班牙政府在西班牙銀行中握有價值七萬萬美金的黃金儲藏，但共和政府想向英國的維卡斯，捷克的史可達，法國的史納達，甚至德國的強大的軍火製造家購買軍火的一切努力都給不干涉政策挫敗了。

上述就是我的密探所注視的國際形勢，他們不斷把這消息送到海牙總部報告我。我迅速把這些情報轉給莫斯科。斯大林依然沉默。

後來到了八月間，三個西班牙政府的高級官員得到莫斯科的許可，秘密到了奧特賽港。他們是來購買軍需品的，他們提出以西班牙的黃金巨款作交易。但他們不准到莫斯科，祇靜悄悄地被關在奧特賽的一間旅店裏。

一九三六年八月廿八日，星期五那一天，斯大林向對外貿易委員會發出一道命令，禁止『各種武器，軍用品，軍事原料，飛機和軍艦等輸出或再輸出到西班牙，或道經西班牙』。

這道命令公佈了，而且在下星期一廣播到全世界去。蘇聯官方這道命令與萊翁勃倫的不干涉政策相唱和。於是激起西歐及美國的一切團體起

來加以猛烈的抨擊，而共產國際方在那些地方發狂地喚起人們同情絕望的西班牙政府哩。

當時斯大林還召集了一次政治局的非常會議。政治局是黨的最高權威，因此也是蘇聯政府的最高權威。政治局的決議案是無上的權力。牠們在戰場裏就等於命令。

在這次政治局的會議裏，斯大林宣佈要立即在西班牙動作。早在一九三六年九月那個時候，西班牙『人民陣線』政府已在馬德里上台了，拉哥·加巴列勞得到共產黨的積極幫助已組成一個聯合政府（有兩個共產黨員參加），他是這政府的總理同時又是軍事部長。加巴列勞是西班牙社會黨的領袖。他和萊翁勃倫一樣贊成和蘇聯合作。

斯大林認爲舊的西班牙已經完結而新的西班牙決不能孑然自存。牠須加入德意的陣營或牠們底敵對的陣營。斯大林說無論法國或英國都不能答應羅馬和柏林去統治西班牙的，因爲牠扼住了地中海的咽喉。一個友好的西班牙對巴黎及倫敦是生存攸關的，斯大林有這樣的見解，他認爲可以在西班牙產生一個受莫斯科操縱的政制。假如他把西班牙收入自己的夾袋裏，他就能造成一個真正的和長久的英法蘇同盟了。同時他的干涉還會重新燃起蘇聯的外國黨徒的信心，這個信心

已因爲他肅清老布爾塞維克而動搖了的。

在西班牙還有價值七萬萬美金的黃金儲藏，加巴列勞政府，正想花費這筆款子來購買軍事原料。當蘇聯官冕堂皇地堅守牠所頒佈的嚴格的不干涉政策時，究竟有多少黃金運入蘇聯以償付那批賣給西班牙的軍火，這是急不容緩要加以查究的問題。

政治局決定立即動作。斯大林再三的警告他的部屬，蘇聯對西班牙的援助必須處置得絕對秘密，爲的是消除足以使他的政府牽入戰爭的任何可能。他的最後一句話便是：Подальше от артиллерийского огня——『站在砲火線外！』這句話被那些出席政治局會議的人奉爲聖旨而且像一道命令似的傳達給所有服務的高級官吏。

兩天之後一個特別專差坐飛機來到荷蘭，把莫斯科的訓令帶給我，我的命令是這樣：『立即把你的活動擴展到西班牙內戰中。動員所有適當的密探以及用種種有效的辦法迅速建立一個購買和運輸軍火到西班牙的組織。目下正派出一特別密探到巴黎幫助你進行該項工作。他將在該地向你作報告且在你的監督之下工作。』

同時，在莫斯科，斯大林已訓令當時格柏烏首領約哥達在西班牙建立蘇聯秘密警察的支部。八月十四日，約哥達在莫斯科，在他的總部——

盧比英加大廈裏召集緊急會議。出席這次會議者爲紅軍總參謀部的烏列茨基將軍，目下的海軍委員長及當時底格柏烏軍事力量的司令官，佛侖諾夫斯基，（目前在較爲心腹的一部分人裏他已認爲斯大林親信之一了。）以及我的一個同志，即格柏烏海外部主任斯盧茨基等人。

我從斯盧茨基處知道（我在巴黎和別的地方常常和他碰面）在這次會議裏，他的衙門裏的一個幹練的官員已被派到西班牙共和政府方面去建立格柏烏組織。這個人就是尼可爾斯基，又名斯韋德，又名伏里華，又名奧洛夫。

這次盧比英加會議決定在西班牙成立蘇聯的秘密警察來負責共產國際的活動，牠又決定使西班牙共產黨的活動和格柏烏的政策相「調協」或配合。

這次會議的另外一些決議案中有一條是令格柏烏警察在各國發動派遣志願軍到西班牙的運動。在全世界的每一個共產黨的中央委員會中都有一個委員是執行格柏烏秘密使命的。

在許多國家裏面（包括美國），那一支拯救西班牙革命的十字軍宛如一支高的國際遠征隊，在人道的名義之下去拯救民主和保持正義。世界各處的年青人都自願到西班牙爲上述的理想而奮鬥。但是與佛朗哥鬥爭的西班牙共和政府無論

在政治信仰上或策略上都不是統一的。牠由許多黨派構成——社會民主黨，無政府黨，工團主義派，社會黨。共產黨人最多也不過是個少數。斯大林黨能否獲得統治權且利用牠做一個武器迫使英法和蘇聯締結同盟，完全視乎他能否在共和軍的陣營裏擊破頑強的反共產主義反對派。把派遣滿懷理想的外國志願軍入西班牙的運動加以操縱，並阻止他們與一切反對斯大林的政策和野心的份子聯合，這是非常重要的。

盧比英加會議通過了一個決議案來解決裝運軍火入西班牙的重大問題，這個決議案就是由俄國和國外同時推動該項工作。

約哥達親自處理國內方面的事宜。他負的責任甚至比我的還要困難，因爲他必須在蘇聯領土內做得干淨，不要讓人知道政府參加這宗生意。

外交的曲折

約哥達召見格柏烏的奧倫斯基上尉，同時命令他在蘇聯組織一家軍火貿易的「私人公司」。奧倫斯基上尉在秘密偵探工作中是一位非常精明的人。當安東尼·艾登和賴伐爾總理訪問蘇聯的時候，格柏烏甚至還委任他去幹護送他們的工作。

「你在奧特賽港找到三個西班牙人，他們在那裏已受冷落多時了，」約哥達對奧倫斯基上尉說。「他們在我國想非官式的向我們購買軍火，你去辦一家中立的私人店號和他們做交易吧。」

在蘇俄，政府是軍火的唯一製造家，誰也不能向牠買一支手槍，那末，在蘇聯領土上設立一家販賣軍火的私人商店，這個念頭太不近人情了，蘇聯的公民一分鐘也不相信。但在國際關係綜錯的事變中，爲了國外的用場這幕滑稽劇是必需的。實際上，奧倫斯基的責任正是組織和佈置一個偷運軍火商的網，他做得太聰明了，國外密探一點影子也發覺不出來。

「假使你弄成功的話，」約哥達告訴他說，「你回來時把你的衣襟預先開定一個洞，準備鑲上紅旗勳章好了。」

奧倫斯基上尉起程到奧特賽去，他奉令只用現款成交，他還得到一個消息，稱上述幾個西班牙人可以用他們本國的船隻裝運該項軍火，當然，這些軍火就是紅軍兵工廠交付的。他有了一些賦以全權的空白命令，而且所有奧特賽的官廳（從秘密警察地方長官到區蘇維埃主席）都受他節制。

戰爭的捐客

烏列茨基將軍代表紅軍總參謀部情報股出席盧比英加會議。正是他那一股負責辦理我們這件生意的技術的軍事事宜。在情報股中又正是他那一部決定兵工廠供給底軍需品的分量和種類，規定派送西班牙的軍事專家，駕駛員，砲隊和坦克軍軍官的數目。凡有關軍事方面者，這些人都受紅軍總參謀部的命令；此外他們便要受秘密警察的監督了。

斯大林干涉西班牙現在開始了。我一活動起來宛如處身前線一樣，其實呢，我負的責任也就是一個積極的戰爭義務。我從倫敦調一個重要的密探來，從斯托金調另一個，又從瑞士調第三個，我安排在巴黎會見他們，并和莫斯科委派給我的特別密探開一次會議。這位密探叫做季民，是一個軍火專家，又是格柏烏軍事科的科員。

九月二十一日，我們秘密會見於巴黎。季民帶來一道直白剝切的訓令，囑我們千萬不要容許任何可能，使蘇聯政府與我們的軍火貿易牽連一道。我們要以私人的名義，經過專為上述目的而成立的商號來辦理軍火。

爲了輸出入軍需品，除了我們現存的『商業』前哨之外，我們第一步便是計劃成立一些『外表上』是『獨立和私家』的商號，并把牠們連成一個新的歐洲的連鎖。這是歐洲的一門老生意。

成功與否端賴乎擇人是否得當。我們恰好有

這樣的人。他們中許多都是參加國外什麼『蘇聯之友』及許多『和平與民主同盟』等團體的，而這些團體又和國外各種共產黨中心聯合一道的。格柏烏和紅軍軍事情報股，都把這些社團的某些社員視爲戰爭後備隊和蘇聯國防系統的便衣補助隊。我們可以選擇那些在保護蘇聯的非正式工作中受過長期試驗的人。有少數人是謀私利者和事業鑽營家，但他們中多數都是忠實的理想家。

他們都是審慎的，可靠的，他們都有適當的關係，而且在任何情形中，他們都能演扮一個角色而不致露出馬脚。我們供給資本。我們佈置他們的辦事處。我們保障他們的利潤。

十天之內，在巴黎，倫敦，哥本哈根，阿姆斯特丹，蘇里茲，華沙，貝拉格，布魯塞爾及其他歐洲城市內，一連串掛新招牌的出入口商行成立起來。在每一間商行裏有一個格柏烏的代理，他是一個沉默的幫辦。他管理財政，監理一切交易事宜。萬一錯了一着，他就要賠掉他的性命。

當這些商行在歐美市場，搜購相宜的軍需品時，運輸的問題迫切地要我來注意。在斯干的那維亞可用高價找到適當的商船，困難的就是獲得裝運軍火到西班牙的特許證。我們打算先運往法國，然後又轉運到西班牙共和軍的港口。但法國

外交部拒絕批准出港單。

只有一個辦法——從其他政府獲得領事的證明書，特准該項買得的軍火輸入他們本國。我從拉丁美洲某些領事館裏可以獲得一些無限制的證明書，我們偶然又從歐洲及亞洲的國家裏得到同樣的證明書。

我們用這些證明書獲得出港單。船隻啓行了，牠不是赴南美或中國而是赴西班牙共和軍的港口的。

我們向捷克的史可達，向法國的幾個商行，向波蘭和荷蘭的其他商行大量的採購。我們甚至在納粹的德國購買軍器，這是軍火貿易的本來性質。我派一個密探代表我們的一家荷蘭商行，逕赴漢堡，我們已打探清楚在該地有一批賂爲陳舊的來福槍機關槍拍賣。那家德國商店的經理只顧講價錢，銀行證書和合法的辦貨單。

一幕海上的假裝跳舞

我們買的東西並非全部都是上等貨，因爲目下歐洲的軍器很快便過時了。但我們的目的是給加巴列勞政府採辦一些可以射擊的長槍和大砲，且要趕快採辦牠們。馬德里的形勢正變得非常惡劣。

十月中旬，運軍火的船開始抵達共和軍的西

班牙。蘇聯的接濟由兩面入來。我的組織專用外國船，這些船多數是斯干的那維亞註冊的。

奧倫斯基上尉在奧特賽開設的『私家公司』開始是用西班牙船隻，但是牠們的數目有限。因為斯大林害怕捲入戰爭，他堅持要嚴守秘密，因此，莫斯科不准利用帶有蘇聯證書行駛的蘇聯船隻，尤其是在地中海的潛水艇和軍艦開始襲擊和劫奪駛赴西班牙海岸的貨船之後。

但奧倫斯基上尉是足智多謀的傢伙。他請格柏烏護照科科長慕拉供給他一些偽造的外國出港單。慕拉的護照科已利用政府的無窮材料，把偽造的技術發展到驚人的完備。

數月之後，我在莫斯科挪揄他接受紅軍獎章時，慕拉向我說，『什麼，這是一個新的活動園地——偽造船證哩！』他又問：『你以為這是輕易易舉的事情麼？我們日以繼夜工作呢。』

蘇聯的船隻用上述的假船證，改換新名，掛外國旗，裝上軍需品從奧特賽駛出，並卒能瞞過波斯頓拉斯，蓋德意的反間諜密探正在該地嚴密監視。當船隻安然駛入共和軍港口，卸清牠們的貨物時，牠們的名字又改回俄國名字，而且掛上牠們本國的旗幟駛回奧特賽。

馬德里正在絕望的求買飛機。莫斯科來了反響，下令我辦理。佛朗哥正向首都挺進，他的意

大利和德國飛機隊霸制上空。我們的飛行員和機器匠剛抵馬德里，但政府軍的飛機寥寥無幾且都是蹩腳貨。我一定要在歐洲某地覓得轟炸機和驅逐機的供給，且要能够成交得快。當然沒有一家私家店號能够立即備辦一大批軍用機，只有一個政府才能做到這一點。

航空事業進步甚速，我們很有理由可以作個假定，一個友好的政府會允准出讓牠的軍備的，因為牠藉此可以使牠的空軍近代化。我決意在東歐方面找尋這樣的一個政府。這個政府有五十架法國製的舊式戰鬥機。

顯然這件事要找一個特別代理人。我有一個適當的人，他是一個貴族，是歐洲某一家貴族的兒子，他還有最好的交誼和無可非議的銀行保證書。他和他的妻子都是蘇聯的忠實友人，又是西班牙政府派方面的熱心保護者。他曾經替我們做過一點事。我知道我是能够勞動他的。

我請他到荷蘭來，把情形扼要地告訴他。第二天他飛赴東歐某國的首都。當晚他打一個長途電話給我的巴黎代理人，我的代理人又轉打一個電話到海牙給我，囑我於第二天早上在某時某地靜候一次直通電話。第二天電話來時，我那位貴族的朋友用極小心的隱語，把他的晦氣的經過報告我。

他已獲人介紹去謁見該國的軍事部長。他把他的卡片呈交該部長（卡片上面印有世界上最大銀行之一的名字）之後，他便把他來訪的任務直說了當的說出來：

『我來此拜謁是想向貴國政府購買一批軍用飛機。未知部長是否賜准發賣。我們想照部長定的價錢至少採購五十架飛機。』

這位部長從他的辦公桌子旁陡然站起來。他把這位來客的卡片再瞧一遍。他臉色轉白。他把介紹信審查一下。於是他向我的代理人從容地說：『我請你立即離開我的辦公室。』

我的代理人站起來想走。但他不作最後的努力不服輸。

他說：『請部長原諒。請准我再說一句話。這件事是光明正大的交易。我的任務沒有什麼可疑的地方。這是援助西班牙政府的事情。我這次是以我國各團體代表的資格來訪的，這些團體深信我們應以人道主義的名義保護西班牙共和國。我們深信貴國亦想將法西斯列強逐出地中海及防止意大利操縱牠。』

『我是軍政部長；我不是一個生意人，』這位部長冷冷地答說，『日安，先生。』

『事情沒有希望——完全沒有希望了。』我的代理人在電話裏向我說。（待續）

本刊投稿章程

- 一 本刊除「世界動向」外，其餘各欄均歡迎投稿。
- 一 本刊酌收譯稿，但須附原文，如原文不便寄來，則請詳示原著名稱，作者姓名，出版年月及地點。對原著者並須附以簡單介紹。
- 一 來稿須繕寫清楚，並加以標點符號，專門術語，須加註解，文中如有圖表，請用黑墨繪寫清楚，以便製版。
- 一 稿件用任何名號發表，悉聽作者自便，但稿末須註明真實姓名及詳細地址，以便通信。
- 一 稿件登載與否，概不預覆，亦不退回，如寄稿時附足郵票者例外。
- 一 來稿一經發表，酌致薄酬。
- 一 本刊對來稿有權加以刪改。
- 一 來稿須簽名蓋章以便領付稿費時核對。
- 一 來稿請寄上海海甯路華真坊三號華盛頓印刷出版公司收。

新連環圖畫故事

木偶遊滿洲

「木偶遊滿洲」，前在兒童日報上發表，曾受讀者熱烈歡迎，現在單行本已出版，分上下兩冊，售特價兩角，由美商華盛頓印刷出版公司發行，同行現批，特別優待。

總經售 童新書店

上海海寧路
八二六弄三號

廣告刊例

廣告價目均按期計算

長期廣告特別優待

廣告費須先惠

若製銅鋅版費用由刊登者付給

如需彩印或用彩紙另議

* 每期價目 *

(一) 底封面全頁兩色一百元一色八十元

(二) 底封裏面全頁八十元半頁五十元四分之一三十五元

(三) 插頁全頁五十元半頁廿五元四分之一十五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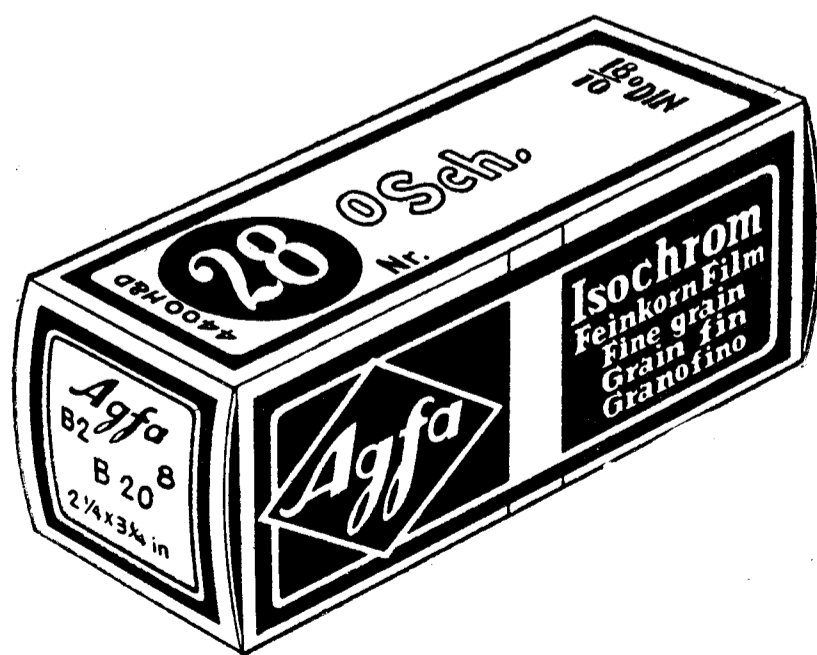
正文末每方寸四元三寸起碼

矮克發 各種軟片

感光寬容 晴雨咸宜

銀粒微細 放大滿意

保存持久性 最為高強



各大照相材料店
均有出售

LIVING AGE

新

聞

第一卷
第一期

目

代 表 會 議 之 概 況
國 際 勞 工 會 議 之 概 況
中 國 勞 工 會 議 之 概 況
中 國 勞 工 會 議 之 概 況
中 國 勞 工 會 議 之 概 況
中 國 勞 工 會 議 之 概 況
中 國 勞 工 會 議 之 概 況
中 國 勞 工 會 議 之 概 況
中 國 勞 工 會 議 之 概 況
中 國 勞 工 會 議 之 概 況

司 公 限 有 亞 歷 山 德 印 刷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The Alexander Publishing and Printing Company.

目錄 第一卷 第二期

| | |
|-----------------------|----------------|
| 世界動向····· | 鳳岡 |
| 羅曼·羅蘭新論····· | 野老 |
| 日本政治結構的發展····· | 梁石生 |
| 怎樣爭取經濟戰的勝利····· | 育才 |
| 評葉青的哲學傾向····· | 南冠 |
| 分析與結論····· | 木君 |
| 社會主義大師們的藝術觀····· | 雙山 |
| 哲學上一個舊案的重提····· | 三男 |
| Out Of The Past ····· | 白克孟 |
| 馬克思給柯格爾曼的信····· | 林超真譯 |
| 囚徒們的旅行····· | 君衡 |
| 俄國革命軼史····· | 維多·綏奇著 林伊文譯 |

TUNG SHAN

(The Living Age)

A bi-lingual monthl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rts, politics, science, history. Published by the Alexander Publishing and Printing Company, House 3, Lane 826, Haining Road, Shanghai, China, Telephone 43190. Edited by Chang Jui-chin. Single copies, Sh. \$0.15; per year, Sh. \$1.50. Registered with the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No. C-584.

All communications should be addressed to The Editor, The Living Age. No responsibility is taken for unsolicited manuscripts not accompanied by a self-addressed stamped return envelope. Advertising rates given on application.

—0—0—

動向 (每月二十五日出版)

第一卷 第二期

民國廿八年八月二十五日出版

編輯者 張瑞清

發行者 白克孟

出版者 美商華盛頓出版印刷公司

上海海寧路華真坊三號
電話四三一九〇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店

定價 零售每册一角五分
預定全年壹元五角

(本刊工部局登記證C五八四號)

世界動向

鳳岡

太平洋上的微妙關係

這次東京的英日會議，又一次地表示出太平洋上的微妙關係。被褫奪衣服的紳士剛才對東洋武士屈膝，忽而大洋的彼岸響出了一聲霹靂：『老羅來也！』於是紳士的腿勁似乎就硬了一點，而各個『株式會社』的股票竟暴落下來。我們中國的報上，見到這樣一種英美合作的表示，也就頓趨樂觀了。

其實呢，站在自力奮鬥的立場上，中國固毋須見紳士們之屈膝而悲觀，也不必因美國的強硬姿態而存過分奢望。『不要哭，不要笑，祇要理解』，這是不錯的。我們應該理解國際的動向，更應該理解太平洋的微妙關係。

太平洋上具有重大關係的強國凡四：英、美、日、蘇，不過蘇聯這國家的性質不同，不事侵略，同時又在閉門建設，對外不採取積極政策；故在本節中僅能附帶述及。這兒所談的將以英、美、日的關係為主。

在英國經略遠東的歷史上，第一個遇到的大敵是沙俄。那時英國的對策是：扶植日本，幫她

擊退沙俄，使她做英國在遠東勢力的看守人。然而結果却養大了日本。尤其在歐戰以還，這個往日的同盟者與看守人，竟成了威脅英國在遠東權益的主要敵人，甚至比過去的沙俄更加可怕了。

不過遠東如果祇有日本這一個敵人，那還不見得會叫『約翰牛』寢食不安的，因為這個先天不足の後進資本國家，在英國看來，總覺得難逃倫敦金錢的魔掌。所以張伯倫先生在英國下院中說過：『即使日本占據了中國，她總還得向英國借錢來進行善後』，這句話裏是沒有紳士式的偽善的。

不幸歐戰以來，太平洋的競技場上又多添了一個美國，而這個國家，無論在經濟或軍事上，竟無一不強過了英國，這却使英國人遇到真正的難關了。因為美國如果獨霸了太平洋，其意義即是英國利益之根本退出遠東。這個打擊可予英國的損失，將比日本所能給的更為澈底，故英國對她插足遠東的企圖，是具有更大的戒心與恐懼的。

『門戶開放』的口號，不僅打擊着日本，同樣也威脅了英國。在戰後短短的時期內，美國對

華貿易躍居中國進出口業的首位；由於文化與經濟的關係，中國社會的中上階級，都逐漸地趨向於美國，尤其當國民政府在南京成立之後，美國在遠東的地位，甚至在政治上都很快提高了。這不僅引起了日本的醋意，同時也贏得了英國的仇恨。所以一般地說來，英國戰後在遠東的態度，與其說她聯美以制日，毋寧說是和日以對美。

這一態度的例證很多，最顯著的有如倫敦的海軍會議，英國相當偏袒日本的要求；九一八瀋陽事變發生後，美國採取強硬的態度，而英國則以延宕與寬容的政策，承認日本占領滿洲的『既成事實』，間接鼓勵了日本對華的繼續侵略；此次抗戰發生後，英國始終不願利用九國公約來對付日本，無時無刻不在準備與日本成立有利的妥協。

不過問題又不完全這樣簡單，因為英美的衝突雖然是最嚴重的，但至少在目前這個階段上，却並沒有英日衝突那樣地直接。這裏就發生了太平洋上的微妙關係。這關係如果用相當圖式化的話來表示，則可得如下的方式：

英國：在暫時間或部分的問題上，擬聯美以

使日本就範，但在總的方向上則欲和日以對美。

美國：一方面利用日本的侵略來削弱英國在華的勢力；另一方面則欲利用中國的抗戰，同時也利用英國的抵抗，藉以根本消滅日本，而建立以『美國經濟為基礎的新中國』（美大使詹遜語）。

日本：暫時和美以對英，企圖屈服英國，藉以根本摧毀中國抗戰的力量，建立『東亞新秩序』，最後與美國作太平洋上的爭霸戰。

懂得了這三國的基本政策以後，纔能了解遠東國際關係中一切似矛盾而非矛盾的現象。例如：英美兩大『民主國』為什麼始終不能聯合起來反對日本的侵略？美國既同情中國的抗戰，為什麼又供給日本以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軍火原料？也祇有懂得了這三國的基本政策，才得明白東京會議與美日商約宣告廢止的意義。

廢止美日商約與東京會議

美日商約的宣告廢止，與東京會議具有密切的關係，這是誰都知道的；但是怎樣的關係呢？那就得回顧我們上面的分析了。英國這次因東西不能兼顧而被迫在東京屈膝，這自然不是心服情願的；照英國的本意，在目前是需要取得美國的協助來制服日本，例如英美加商約的簽訂，英皇

陸，無一不表示她這種苦心。但美國是『不願被人利用的』，她遵循着自己的道路。對於英國在遠東利益之減退，她心裏寧可說是歡喜的；不過英國如果澈底對日妥協，或竟導成中國抗戰之終結，使日本完全統治遠東，那就不能使美國歡喜了。所以羅斯福得悉了有田克來祺協定之後，遂以迅速行動，宣告商約的廢止，藉以阻止英國對日之完全屈服，并增加中國長期抗戰的決心。

羅斯福這一行動是收得了他預期的結果的。行將功德圓滿的東京會議，事實上差不多已經決裂；而中國抗戰的情緒，也沒有東京協定宣佈時那樣悲觀了。

英國態度所以轉硬的緣故，一方面固然因為羅斯福這一姿態來得恰好，替她在東京撐了一下腰；然而另一方面，則又因為華盛頓這一表示，使倫敦不敢對東京作過分的妥協。這話怎麼講？難道英國懼怕美國嗎？問題自然不那麼簡單。英國此次之所以不得不尊重美國的態度，原因就在英國目前的處境，不僅在遠東，而尤其在歐洲，都有借助於美國『友誼』的必要。英國在未來的戰爭中，如果得不到美國的援助，那是很難談到勝利希望的。所以在此次英日會議上，對於美國最所關心的法幣與白銀問題，不敢單獨妥協，聲明須由九國公約簽字國來解決了。

始終與美國一致行動，那也是錯誤的，不談別的，但看哈里法克斯要『公正調解』遠東『衝突』的宣言，以及倫敦關於引渡天津四華人的決定，已足以證明英國仍信守着『綏靖』日本的不變政策。

同時日本的軍閥，現正積極加緊反英運動，甚至企圖封鎖上海；威脅香港，恐怕也會影響英國的態度；而最近德蘇協定之突告簽訂，則更促成了英日妥協的機運。

德蘇關係的『突變』

德蘇互不侵犯條約的簽訂，全世界的報章都認為是一種『突變』，但在一些深刻而敏銳的觀察家看來，這不過是一種長期漸變的表面化而已。

在我們上一期的世界動向上，關於德蘇關係曾經有過這樣的一段話，我們現在可以不改一字地把牠抄在下面：

『講到蘇聯方面，我們知道她也不是很願意締結這個同盟的。自從去年慕尼黑會議以後，再加以本年西班牙及法國人民陣線的失敗，蘇聯的領導者早就放棄了『民主陣線』與『集體安全』的口號。迨希特勒此次吞併捷克，故意把喀爾巴仟烏克蘭送給匈牙利，避不與蘇聯接壤，並放棄了『大烏克蘭』的口號，停止在報章上攻擊蘇聯

太林的態度更不同了。李維諾夫的「辭職」，莫洛托夫的演說與齊丹諾夫的論文，便明確地表示了這一轉變。莫斯科現在的心願很明白：『不做火中取栗的貓爪』。與其和『民主』國家締結不可靠的同盟來替人作戰，還不如直接與法西斯妥協來取得中立的地位。雖然這種『妥協』與『中立』很成問題，但我們不能否認這是目前蘇聯統治者中一個重要的思想。

『有些人說：「蘇聯與納粹黨的德國決無妥協的可能」。這祇能證明這班人頭腦之公式化，硬把「民主主義」或法西斯主義等思想來決定國際關係，更可憐的，他們甚至連史大林的報告，與杜朗底及安娜·魯意·斯屈朗的文章都不讀一下。』

我們上面這一段分析，曾有人加以斥責，因為根據這些人的意見，凡是說蘇聯有與德國妥協的可能，都是別有用心的宣傳。如今見德蘇互不侵犯條約竟告締結，就不得不張皇失措，大叫『突變』了。其實驚駭不過是無知的結果。

史大林與希特勒的接近，不僅可以根據我們上述的理由來預測，並且可以從去年蘇聯對於德國反猶運動的緘默不言，以及本年二月二十六日美國共黨之拒不參加反納粹大示威等事實中看出來的。

蘇聯因客觀形勢的需要，與德國成立外交上

的協妥，這本無不可之理；不過為要準備這個妥協，竟在思想上與行動上早就作了讓步，那才是全世界進步勢力的一個大不幸哩。究竟德蘇協定的內容如何，因外交方式之極度秘密，一時還很難確知。不過全世界反法西斯主義的人士，大概總希望蘇聯的執政者不致作過度的思想上與政治上的讓步吧！

德蘇妥協之後，國際局勢將有極大的變化，這是沒有疑問的。第一個結果當然是英、法、蘇談判的壽終正寢。但澤或將迅速歸入第三帝國的版圖，而波蘭全國恐怕也要倒入希特勒的懷抱，（當然因她立即引起戰爭亦有可能；）第二，德意勢力在歐洲突增的結果，中南歐的小國將悉數傾向德意軸心；第三，英法或將對德轉取『綏靖』政策，奉還殖民地，以企圖購取希特勒和平的諾言；或將拚命拉攏美國，離開德意，切實對德備戰，另一方面在遠東則更將與日本謀取妥協，以便注全力於歐洲。

蘇聯在西歐暫時免除了參戰的束縛，在遠東或將採取較前積極的立場，這是可能的，但非一定的。因為蘇聯此次和德的目的，只有一小半為要對付日本，而大部分在於保持中立，以便於『閉門建設』。

德蘇協定對於日本的影響是很大的，首先是反共協定之失去作用，使日本陷於孤立地位。這

對於主張加入德意軍事同盟的日本軍閥，自是一個莫大的打擊。在這時，日本的統治者大概要努力同英國妥協，以圖對付蘇聯與美國吧。

至於日本與蘇聯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以便全力對英，這當非絕對不可能，不過這可能性是很小的。

在這瞬息萬變的國際局勢中，我們上面的預測當然都是相對而非絕對的。不過至少在遠東，英日關係或將更形接近，美蘇（尤其是美）的態度或將愈趨積極，這大概是一種可信的動向呢，至於世界大戰之即將爆發，那已經不是預測的問題了。

大戰與抗戰

歐戰爆發，對中國的抗戰將有怎樣的影響？

這個問題是相當複雜的。我們在這裏祇能作些簡單的與大方向上的預測。歐戰所能及於遠東的第一個結果，恐怕是英國對日本之澈底屈服。其次，是中國能向歐洲國家購買軍火與原料，行將斷絕。蘇聯至少在初期的戰爭中能保持中立，故對華的援助或可增加，至少可以繼續。但萬一蘇日成立了像德蘇那樣的妥協，則我們將連蘇聯的援助都不可得了。因此，歐洲如果爆發大戰，而大戰也並不波及東方（如日蘇，日美間），則在最初時期確祇有利於日本，而是（下接第二一頁）

羅曼·羅蘭新論

野 老

法國底名作家紀德自從寫了『從蘇聯歸來』以後，幾乎成了所謂『左翼』射擊的靶子，連我們這裏底大小『文豪』也跟着暴跳了一陣。據我接觸過的『文豪』，多數都是一提起紀德這個名字的時候，便擺出『先知』的神氣說道：『他本來就是這樣的人！』但到底是怎樣的人呢？却又說不出。而就在差不多同一的時期，另一個法國底名作家羅曼·羅蘭却走了紅運，被所謂『左翼』捧成了『最前進』的作家底大師。照例我們這裏底大小『文豪』又跟着叫好打胡哨，熱鬧了一通。一說到羅曼·羅蘭，我們底『文豪』也只是句話道：『他本來就和別個作家不同的！』但怎麼不同呢？却依然說不出。——這說不出主義，便是我們這裏許多『文豪』成功的秘訣。

現在我並不想來對於『倒了霉』的紀德多說甚麼，我只想單來檢討一下羅曼·羅蘭。就是說：這位走紅運的作家，到底『最進步』到怎樣的程度，到底『本來』『和別個作家不同』在甚麼地方。

實在也難怪我們這裏底『文豪』說不出，關於羅曼·羅蘭，各國吹的，捧的，介紹的文字雖然很多，但能給他一個正確的評價的，却幾乎沒有。最出名的像茨伐格（S. Zweig）底那本羅蘭評傳，也只是把他底身世，經歷，著作，按照年代地敘述了一下

而已，可以說是『傳』而不『評』。比較能說明羅蘭作品中一些主要的意義的，大概還要算佛里契在『二十世紀之文學』裏面所寫的一篇專論。但那却也並沒有明確地指出羅蘭所代表的整個傾向，而且就是指出的一點，據我看來，也還不見得正確。——雖然佛里契是著名的馬克斯主義評論家。

照我說：羅曼·羅蘭實在只是道地的一位資產階級的作家。他底『最前進』的傾向只是建築在他資產階級左派底意識上面的。無論如何，他不是佛里契所說的那樣曖昧的『一定的社會階級』的小資產階級底人物。

羅蘭在歐洲曾經搖動人心的，是他底『新英雄主義』。他給他所認為典型的『英雄』做了幾本傳記，最出名的有：『悲多汶傳』，『米格朗結羅傳』，『脫爾斯泰傳』。但這些『英雄』却都是資產階級底先賢，都是幾個國度中資產階級曙光期底偉大的個人主義者（Individualist）。在『悲多汶傳』底有名的序文中，一開首他便感嘆着歐洲『被遲鈍而腐敗的空氣所麻木』，又感嘆着『沒有偉大性的唯物主義壓住了思想並阻礙了政府和個人底行動』。他底中心思想只是因為不滿於眼前資產階級的墮落和現社會生活的機械化而想退回到過去的時代，退回到資產階級曙光期的那種過去的時代。

無疑地，作為道德家的羅蘭，他所『追尋的叛逆者』——用他自己底話——在實際上却都是一些有道德節操的偉人。他對於他底『英雄』們，與其說是尊崇他們底藝術，無寧說是尊崇他們底道德。在他，用的是『戰鬥』（Combat）和『孤獨』（Solitude）這兩個字作為他所選的『英雄』的標準。這自然也是真的，那些曾經為資產階級前途奮鬥的有教養的市民，都是和自己頭上的制度，帝王，教會，作着不可調解的鬥爭，而且也是必然地在他們當時的環境中要感到幾乎是絕對的孤獨。這種道德的節操，在羅蘭底心目中已經成了一種宗教的形式，他想喚回這種精神以挽救資產階級社會底頹風，或者更恰切地說，也就是要挽救資產階級社會的淪亡。

但這也就正說明了羅蘭對於他託足的這個社會實際上還是在愛護着的。他所厭惡的是這個社會底『現狀』，所以他沒有想到破壞這個社會，而且也不願意破壞這個社會，只想把這個社會底新興時代復活轉來。同時他又認為只有非羣衆也非集團的偉大的個人主義者纔能夠支持這個社會。

然而這是沒有出路的。他著名的十冊巨製的小說『約翰·克里斯多夫』（「Jean-Christophe」）便給我們答復了這個問題了。

這部小說中的主人公約翰·克里斯多夫本是村鎮的市民。他第一次到巴黎去觀光便感到了那兒只有金錢，虛偽，醜惡，覺得不是自己底住所。第二次再去時，巴黎已經改了外觀，那兒出現的人物都準備着給帝國主義作戰爭的工具。於是他感到極深的悲

哀，覺得那兒依然不是自己底住所。他參加了一下工人運動，但即刻便覺得民衆並不比資產階級更好。這位孤獨的市民所發見的『真理』是：個人的價值總在集團的價值以上。他便決心以孤立的姿態去追求他底理想：忍饑，受苦，不斷地工作，……結果是孤獨地死。

這給我們答復的是：悲多汶——約翰·克里斯多夫底前身——型的人物在羅蘭眼前的社會上是不能立腳的，要勉強來立腳，也只有孤獨地死。羅蘭用『超階級』的智識階級這一個榮耀的名目加在他創造的人物底頭上，但『超階級』的結果却只是暗地在保護壓迫階級。約翰·克里斯多夫『超階級』的努力，一點沒有動搖他所仇視的巴黎底一切，而只落得自己孤獨地死。羅蘭想把資產階級底先賢對另一階級的『戰鬥』用在對本階級的鬥爭上面，所以那『戰鬥』遂變成了無力，而所獲得的『孤獨』也只是沒有出路的『孤獨』。——這正是羅蘭自身底最好的寫照。

在這以前，羅蘭曾做過『信仰劇』和『革命劇』。他一面宣揚宗教感情的必要，一面對十八世紀資產階級的革命作着誇耀的回顧。他底『革命劇』——『七月十四』（「Le 14 juillet」）『羣狼』（「Les loups」），『丹東』（「Danton」）——中雖然也填滿了羣衆的足跡，但他底主旨却只是為的表揚資產階級歷史上的英雄時代，羣衆不過是那些『英雄』們周圍的『華飾』而已。他所提出的『民衆劇場』的計劃則又完全是一七八九年革命時代社會救濟委員會所決定的計劃，這依然為的是復活百

年前資產階級光榮的時代。要說是布爾喬亞底左派完全無視民衆，那是錯誤的。相反地，這樣的左派在某種時期，尤其是在『孤獨』的時期，還要走向民衆。但那結果却必然地是約翰·克里斯多夫底結果：不相信民衆，最後離開民衆，甚至嫉視民衆。羅蘭雖然提出了爲民衆的計劃，但他到頭還是回到他『英雄』崇拜的理想中去，他始終以他現身的個人主義創造他底藝術。

傾仰着十六世紀文藝復興期底巨人，同時又接受着十七世紀英國清教徒底精神，更憧憬着十八世紀大革命底陳迹，宗教的感情，藝術家底教養，以偉大的個人主義爲絕對道德的標準，——具着這樣混合體思想的羅蘭，必然地要仇視帝國主義時代的。也正因爲是這樣，所以他必然地只能仇視這個時代，而決不仇視作爲這個時代底基礎的土台。因之，他要保護這個土台，要用過去的磚泥來復修這個土台。從布爾喬亞本身上看來，羅蘭是進步的；但從整個歷史的進展上看來，羅蘭却又是向後退走的。

不過羅蘭在現代却也找到他底一位『英雄』了。這位『英雄』不是別人，便是演『不合作』的戲法的甘地。他稱讚他，崇拜他，而且還給他寫了一本他底『英雄』傳記之一的傳記。關於這層，決不是像一般批評家所說的那樣簡單，以爲他是因爲甘地實行了他先前崇拜的脫爾斯泰底無抵抗主義的緣故。這兒實在是有兩重極重要的意義在。第一，甘地也正是印度新興資產階級底代表者；第二，所謂『不合作』，即是無抵抗主義的實行，在政治上恰可以保護資產階級的土台。

一九二二年，他在『光明』雜誌上和巴比塞激烈地辯論暴力

革命之可否存在時，果然便抬出甘地底政治方式作他底武器了。這場辯論是極著名的，但注意這場辯論的人都只認爲是人道主義者激進論者所爆的火花，却都忽視了辯論後面的階級背景。身爲小資產階級的巴比塞，是接受了當時共產國際底理論的。而羅蘭却是爲了維護他所託足的社會底安全，認爲暴力比他所仇視的帝國主義更爲可怕。

自然，羅蘭底非暴力論在很早便已經發表了。他著名的書簡中有不少的直白的宣言，說他不反對革命，只反對暴力的革命，無論何種暴力都是他所痛恨的。但似乎也沒有人問過他，他自己也沒有說明過：他所禮讚的十八世紀底革命，却就正是暴力的革命，這豈非自己在和自己『戰鬥』起來了嗎？——然而這却很容易解釋的。十八世紀底革命是資產階級推翻另一階級的革命，所以用暴力是應該的；但一到現在，若是還容許暴力，資產階級却要成被推翻者了。這種意德沃羅基的構成，要說不是道地的資產階級的，那除非是有意的欺瞞。

羅蘭一生中最有『前進』生命的一頁，便是第一次大戰時的非戰活動。自然，這在當時確是代表着歐洲智識階級前進的意向的，但這却並不能掩蓋他依然是充當着布爾喬亞底守衛的立場。作爲布爾喬亞左派的智識者，並不一定便贊助帝國主義的戰爭的。但那非戰論底內容，却是爲了戰爭的結果，會使資產階級本身陷於絕境，會使資產階級底文化，秩序，都走向毀滅，而且還會引起『暴力』的叛亂，使資產階級跟着倒台。羅蘭在『約翰·克里斯多夫』中便已經宣言德國和法國所以必須維持和平，是爲

了『我們底文化』。就是他後來著名的『超戰論』（「Au-dessus de la Mêlée」）以及『給霍卜德曼的公開狀』（「Lettre ouverte à Gerhart Hauptmann」），內中所宣布的他底反戰的主要意義還是爲了文化。一面反戰，一面又極力倡言『超階級』的必要，這都不是偶然的。最明顯的是他底以反戰爲主題的文集之一的『先驅者』（「Les Précurseurs」），內中所記的却又並不是真正『先驅者』底事蹟。——這層，佛里契也已經給了很正確的批判。在那書中，他敘述了尼歌萊底『戰爭生物學』，巴比塞底『砲火』，還揭載了高爾基底書信，但對於大戰中集合於瑞士的國際社會民主黨底左翼所發表的反戰宣言，以及他們底活動却沒有提到一個字。這兒依然有他底階級的立場，也決不是偶然的。自然，事實上羅蘭是不容於戰時的法國了，於是他只有到瑞士去度約翰·克里斯多夫底生活。但他所表現的工作却更加無力，只有到醫院去爲傷兵服務，成了一個——這是布爾喬亞左派在『孤獨』時常取的態度——有意造作的慈善家了。

以上便是我對於羅曼·羅蘭底全貌的檢討。我相信要明白這位在二十世紀歐洲文化洪流上捲起不小的波紋的人物，應該很客觀地這樣去認識他。不過有一個問題還沒有說到：那便是他在目前走紅運的問題。就是說：像這樣道地的資產階級的作家，像這樣反對暴力革命的作家，怎麼目前却會認真地擁護起蘇聯來了呢？

這好像是『奇蹟』，然而却不是的。這兒也有牠底必然性在。

羅蘭對於蘇聯的態度，我們不應當忘記下面兩件事實：第一，他曾經對二月革命表過同情，但那也是對於克倫斯基政府的同情，等到了十月革命，他却曾經用反對革命中『暴行』的名義，發過一次『抗議』的電文（這事，他四年前在蘇聯做的自敘的文字中完全沒有提及，但我想注意革命與文化的人一定總還記得的）；第二，一九二八年，巴比塞初次赴蘇聯的一年，蘇聯曾經邀他赴蘇聯參加國際作家的會議，然而他却拒絕了（這事，現在再也沒有誰提起，但我想注意革命與文化的人也一定記得的）。——這兩件事實所告訴我們的是：他已往對於蘇聯不但沒有熱情，而且還冷淡得很。目前他所以能表示『堅決』地擁護蘇聯，實在是因爲蘇聯底『和平建設』，『和平外交』，合了他底『胃口』的緣故。於是正當『人民戰線』口號叫得最響的時期，他踏上蘇聯土地了。在他底眼中，現在的蘇聯，正是他所期望的那種理想政治的實現，就是非帝國主義的市民政治的實現。因之反對『暴行』的他，到了蘇聯黨案的發生，却又表示出他底讚美來了。這也是很自然的。在他看來，蘇聯所處決的罪人，都是要妨害他所擁護的這個市民政治的人物，都是屬於另一階級的。這到底也被他說出來了，他說：基洛夫事件的出現，是和一七九三年法國底絞殺案一樣，足以表現領袖的偉大。用這樣的觀點擁護着蘇聯的羅蘭，對於紀德那樣以批評的態度擁護蘇聯的作家，必然地要認爲是罪大惡極的仇敵。

說到這兒，附帶地再說幾句關於紀德的話。我以爲紀德和

羅蘭不同的，便是他一向便具有着小資產階級的傾向。雖然他在

『轉向』以前『繞了最大的圈子』——愛倫堡在未會罵他以前寫的捧他的文章中的話——是真的，但他不安於個人主義的表示却一向就露着顯明的痕跡。關於他底剛果旅行，就不說也罷，只就他前期的作品來說，他和羅蘭最歧異的是：羅蘭以『孤獨』為滿足，他却表現着『孤獨』的惱恨與痛苦（譬如「窄門」「田園交響曲」等）。由於這種惱恨與痛苦，便決定了他走向飛躍的前途了。他所以始終不能和羅蘭同調，其實還是由於兩種不同的意識

日本政治結構的發展

梁石生

本文也要以上次分析日本經濟那樣的冷靜態度，研究日本自明治至目前的政治結構的發展。

日本資本主義一出世，便得與一羣強梁的先進國作殊死的競爭，因此，牠必須採取綜合的，帶有熱性的，飛躍的發展；但這種發展却與薄弱貧乏的原始積壘的基礎形成一個不可解消的矛盾，牠迫使日本資產階級對農民和工人作極殘酷的剝削。所以日本資產階級自始便和工人階級與農民處於緊張的對立狀態中。再

相鬥爭着的緣故。

我知道，我這樣的檢討羅蘭，會惹起我們這裏底大小『文豪』的怒目相向的。因為我們『文豪』們底脾氣都是自己說不出，却又討厭別個說得出。況且我這種說法又是從來沒有人這樣說過的，這將更是大罪狀。不過我可以聲明：我並無故意輕視羅蘭的意思，我只是說明羅蘭之所以為羅蘭。誰要一定把羅蘭捧成『最前進』的作家底大師，仍舊有他着色眼鏡中的羅蘭在，我這篇文章並不妨礙他底工作的。

加以十九世紀之末，當日本資產階級踏上政治舞台時，國際間的勞動者在政治上久已成熟了。一八四八年六月，法國工人們已表演了一次震動全世界的獨立鬥爭，牠首先教訓了德國資產階級，現在也來教訓日本資產階級，使牠在新興階級行動的驚嚇之下，迫得像德國資產階級一樣，『不論價格便把自己賣給同盟者』，這些同盟者就是封建貴族，地主和皇朝。

明治維新以來，日本資級便以全力擁護皇室的政治權力，極

力依賴於皇室的扶植，并經過牠與地主實行妥協和同化。此後工商業的發展愈迅速而愈趨集中，土地與銀行資本的結合也愈厲害，則資產者與地主的結合也就愈加密切。日本的大資級經過一羣高利貸，商人和富農三位一體的地主，榨取農民的最後一滴血。農村的封建剝削和城市銀行資本已發生密切的有機的連繫。現在在日本已沒有獨立的地主階級，這個階級最初孕育了他的新的同盟者——資產階級，很快又寄托於後者的金融勢力了。

但日本資本主義的過度集中，不僅使地主迅速隸屬於銀行貴族之下，且使獨立自由的中小工業家很快也受壟斷業的兼併和消滅。中小資產階級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迅速失去了獨立或半獨立的地位。階級的分化達到異常緊張的程度。從這裏，我們就可了解日本資產階級何以那麼早就懼怕了民主主義的武器。在明治初期，資產階級與皇室雖然經過一度『民主』的紛爭，但旋即在普魯士式的反動憲法的基礎上，言歸於好。日本資產階級之抄襲普魯士憲法并不是偶然的，因為牠是連結地主利益與資產階級利益的契約，同時也是拿破崙主義與議會主義的混合物。資產階級把這道憲法當做防止人民革命企圖的重要武器。牠一方面小心翼翼地保存封建政治機構的神秘外衣，保存一切中世紀的習慣和儀式，來掩飾牠從舊制度蛻變出來的社會變革，因此麻痺了人民的反抗意識。另一方面牠把大多數人民排出政權之外，把統治立法的全權歸之貴族地主和金融寡頭的貴族院和皇室，而軍人和內閣則對天皇負責，互相獨立，互相調節。這種政制可以稱之為凱撒

或沙皇主義，是日本資級懦怯和卑鄙的反映。一八八九年憲法完全滿足了日本資級的慾望，高唱民主主義的自由黨人便轉向着保守和妥協。此後日本資級就完全和地主合作，共同成立兩個統治的大黨——政友會和民政黨——共同擁護『萬世一系』的天皇和牠們的憲法。

日本軍部和議會的關係不是日本『民族特性』——武士道的表現，而是日本帝國全部社會與經濟結構的反映。日本因為是後進的先天不足的資本主義國家，她和先進國爭奪市場，必須與戰爭同時進行（一八七四年就發動侵略台灣的戰爭）因此她必須經常維持一種戰爭的機構，而且還要隨着領土的開拓而擴大牠；其次日本國內各階級間及本國與殖民地間的矛盾，業已達到異常緊張的程度，故資級必須依賴於完善的軍隊和警察力量來維持整個帝國的秩序。而長期的對外侵略與對內鎮壓，結果則提高了日本軍人的地位，使他們可以在和平時代作半吊子式的議會的保鏢，平衡於議會與人民之間，在多事之秋則起來駕御議會，用刺刀來推動議會，這便是凱撒或沙皇主義的特質。

日本軍部與高級將領是大資產階級的直接代表，中下級軍官多數是中小地主和資本家的兒子，在一般士兵中，農民佔絕對多數。日本國內的階級矛盾在軍隊中以集中的形式表現出來。每一度社會的危機都必然反映到軍隊內部的危機。高級將領們因為必須顧全整個大資級的利益，他們每一次行動不能不計算到國內外的環境，因此他們客觀上便表現為穩健派，事實上他們却是大

資級的最精明的代表，他們與元老重臣及政黨領袖保持密切的連繫。中下級軍官就是所謂少壯派，他們多份反映破產和無出路的中小資本家地主的煩悶。他們每每以『反資本主義』，『昭和維新』，『清君側』等混亂和矛盾的口號舉行暴亂和暗殺，企圖改變現狀。但日本的土地問題太過嚴重，農民與資產階級地主的對立太過緊張，不僅大資產階級，即中小資本家和地主也不能而且不敢去煽動農民起來，而且最重要的是日本的工人階級力量尙沒有直接威脅到資產階級的安全，因此，日本資產階級解決國內（同時也是解決軍部內）矛盾的唯一辦法不是訴諸法西斯主義，而是直接訴諸對外戰爭。而主張對外侵略的急先鋒就是少壯派，日本的少壯派是日本資產階級的應急的工具。

日本資產階級既然一開始便充分表現牠的帝國主義和反民主的性質，民主主義的武器便自然而然的轉到工農大眾的手中了。遠自一九〇〇年，當工人階級剛剛開始團結時，就遭到治安警察法的打擊，隨後又忍受了長期的鎮壓。一直到大戰之後，日本產業工人運動方才重新抬頭，並逐漸發展到最高峯，結果促成了普選法，但工人的組織立即又遭到田中內閣的破壞和鎮壓。這些事實表明日本工人的民主鬥爭與推翻資級地主的反動統治是不可分離的。日本的封建式政治機構與金融寡頭貴族的利益連結得愈是密切，則工人階級的民主鬥爭就愈加要直接動搖資級私有財產的原則。這一點在日本的土地問題上表現得更清楚。土地愈隸屬於銀行資本，則農民的土地鬥爭愈帶反資級的性質。總之，日本資

本主義的發展愈帶綜合性和不平衡性，則工人階級愈無法把民主任務與社會主義任務截然分開，而這兩種任務的實現將愈採取並行的與綜錯的形式。這表示日本未來的階級鬥爭將較之任何先進國都來得激烈和複雜，因為一下子掃除中世紀的奴役和近代的工資奴隸制，必須要流雙倍的血。

上述的分析可以測定日本工農中間的關係：日本農民必須在工人的領導之下，才能得到澈底的解放。

日本農民在明治維新初期會起來和地主鬥爭，結果都給新興的資級和地主聯合鎮壓了。往後農民在按額地租，重利盤剝和獨占價格的重壓之下，過着一種難以忍受的非人生活。他們從資級的『維新』中所得的只是在舊的鎖鍊之上再加上一個新的鐐銬。

現在在日本有五百五十萬農戶，其中沒有土地的佔百分之七十五，（但全國一百多萬個寄生的地主却握有百分之四十以上的土地。）貧農的數目是三百五十萬至三百八十萬，中農一百五十萬至二百萬，富農二十萬。而這一百五十萬至二百萬的中農在日本的過度惡劣的經濟條件之下，已加速的沒落。日本農村的階級分化和鬥爭的發展是非常急激的，這可於農民的組織力量和『租佃爭議』的數字中窺知。一九一八年，日本的農民協會只有三百七十六個，到一九二五年末，協會增至三千四百九十六個，會員三十萬七千人，一九二二年以後並由地方的組織發展而為全國的組織，會員數增至五十萬人。所謂『租佃爭議』的次數也一年年增加了。一九二四年比之一九一九年曾加兩倍多。一九二九年是

一·九四九次而一九三四年是四·五八四次。參加爭議的人數也大大增加，一九三三年有三萬七千佃農，一九三四年却在六萬六千以上。農民鬥爭與城市工人鬥爭差不多採取同等速度的發展而且互相影響，互相推進。一九二二年以後，農民鬥爭與工人鬥爭一致向上發展，而恰好在這個時期，工農聯盟的傾向非常濃厚。在一九二六年一年當中，成立了三個以聯合農民和工人組織爲目的的工農黨（勞動農民黨，社會民衆黨和日本勞農黨）。日本農民與城市工人之間的這種密切聯繫不僅含有深刻的歷史意義而且還反映一種更親切的血緣關係。據一個著作家的統計，在日本五百多萬產業工人中，女工和童工佔了多數，而『日本的女工，差不多全是鄉村的女孩被父母賣給資本家做工廠中的奴隸』。但正因爲農民與工人之間存有這種不可分離的關係，日本的農民鬥爭在政治上必然要受工人很大的影響。

但正因爲這個密切的血緣關係，再加以日本工人階級腐敗生長，腐臭與卑屈的政治氣氛，所以牠雖然比中國工人階級年長，牠的政治覺悟力和鬥爭經驗却遠落在後者的後面。日本工人階級一直到了一九一二年才認真開始組織工會。而牠的正式參加政治鬥爭還是一九二二年的事，自此以後，日本工人的工會組織才加速增長起來。但一直到最近，日本工人階級在組織方面還表現得非常薄弱。日本九百五十個工會只有三十八萬工人，即只佔全產業工人的百分之七。政治覺醒的遲緩，鬥爭經驗的缺乏，與組織力量的薄弱，是日本工人階級解放運動的最大障礙。同時也是牠

易於受敵人欺騙和出賣的基本原因。日本工人階級長期陷於孤立和無領導的狀態。牠的隊伍中侵入了許多明目張膽的社會帝國主義者和并不改良的改良派。在一九二八年的普選運動中，日本工人階級自始至終受了三個改良派政黨的玩弄，結果使這一運動停留在合法的圈子裏，不敢澈底發展下去。日本工人階級在政治上這種幼稚性不僅無法打破農民隊伍內的改良的幻覺，把農民從資級地主的欺騙中拉開，而且還無法抵抗農民的落後意識的侵蝕。這是日本工農解放運動的最大危機。不錯，日本資本主義的過度集中化使日本工人階級能夠迅速集合和統一行動。其次，日本資本主義對工人的過度剝削，也不能給改良主義留下多大活動的餘地。這是日本工人階級的有利的一面。但要想有效的發揮牠的長處和澈底克服上述的危機，日本工人階級必須在國際勞動者的幫助之下，儘量吸收國際的寶貴的鬥爭經驗。日本工人階級之需要這種經驗比之任何國家的同一階級都來得迫切。本來在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成功之後，日本工人階級已有可能得到一個勝利的工人階級的幫助，但不幸整個國際的新領導很快又轉入新的墮落過程中。結果，日本工人階級在『工農黨』與『國民革命』的庸俗『路線』之下與社會帝國主義派社會大衆黨相競賽，並終於向後者屈服。一九三一年的侵略戰爭就是這種屈服的後果。今後在帝國財政和軍事危機的推動之下，日本工農的解放運動將必然採取更兇猛，更大規模的形式爆發起來，但他們如果想順利地走上勝利的道路，首先必須找尋新的正確的領導。

怎樣爭取經濟戰的勝利

育才

近幾月來法幣匯價之一再跌落，且尙在跌落不已（已跌入每元匯四便士以下），已引起國內各方面的不安。已有人提出法幣是否將成戰後德國馬克之續的問題（見八月初申報經濟專刊），又有人說四便士的匯價亦難於維持，因為背後無有力者為之支柱（見銀行週報第二十三卷三十一期一週金融談話）。當然，法幣不至於成爲戰後馬克之續，因為法幣的發行額至今尙不到三十億元，自不能跌到每一萬億元匯一元硬幣之程度（一九二三年終，每一萬億紙馬克僅值一金馬克）。但在此時，社會人心已因法幣跌價不已而極度恐慌與憂慮，且認爲此種貨幣災難已無可挽救，至少是如無有力者支柱便不可挽救，則是不庸諱言之事實。數週以來金融市場情形之驚惶紊亂，以及物價的一日千里的高漲，都是這種事實的證明。這種可怕風潮的癥結何在呢？牠對於抗戰的影響如何？我們難道真地無法抵抗這種災難了嗎？這是我們今天所必須答覆的問題。

誰造成了我們的法幣跌價呢？這當然是日本的魔手。日本想把中國吸入『日元集團』以完成其此次的軍事侵略，因而先成立了華北所謂聯合準備銀行，發行毫無基金的鈔票，想用這種鈔票破壞法幣，後又成立了華中所謂華興銀行，欲同時利用並破壞法幣。華興鈔票對華中的影響怎樣，尙不顯著，現在可置無論；聯

銀在華北消滅法幣的目的雖至今未能達到，但牠已以強暴手段收集了大量法幣，而把持了天津外匯的百分之六十，而影響了上海法幣匯價的跌落。加之我國關稅收入的十分之八已落日人之手（此項稅款在過去一年中已達二萬萬元法幣以上），他們用這項收入以及其較小收入不斷套取外匯，於是他們一方面既由外國購得棉花等原料救濟了其本國的經濟貧窮，他方面又消耗了中國約一千萬磅的法幣匯價基金（在一千萬磅平匯基金成立之前，我國政府在十二個月的抗戰中爲維持法幣匯價，曾耗去了四百六十萬磅；平匯基金成立之後三個月，又失去了四百萬磅）。英國之成立一千萬磅平匯基金，本是想借維持法幣的匯價，以維持其對華貿易，所以有人說，實質上中日的貨幣戰是英日的貨幣戰；但到平匯基金因日本套買而大量損失後，英國覺得以基金維持法幣匯價的辦法是利於日本的辦法，因此羅潔士便撒手『暫不維持』，而聽令中國法幣『自覓其適當的水準』，於是法幣的匯價便由八便士而一直下跌到四便士之下了。

就一般情形說來，我國在兩年抗戰中既消耗了法幣基金的一部分，又增發了大量紙幣（據七月底政府公布，中，中，交，農四行現在發行的紙幣數爲二十六億餘元，戰前爲十四億元），則法幣匯價的跌落自乃情理之常。以平匯基金維持之亦未嘗不是一

法。但因淪陷區域過大且爲我政治力量所不及，於是政府雖能統治上海的外匯，然却不能統治淪陷區域的貿易，於是日本得自由輸入日貨統制出口，以奪取法幣而套取外匯，於是用基金維持的辦法就不得不宣告失敗了。

然日本的套買外匯不過是法幣急劇跌價的原因之一。此外還有一原因，乃投機者的乘危操縱以圖發財。戰後全國資金大都集中於香港上海兩地，兩地遊資過多，資本家不願投用於正當事業，而乃用於投機。因此，在上海，則金子，外匯，棉紗，公債，糧食，豆油等的暴漲風潮，每隨法幣的跌價而急劇發生；在香港，則只七月二十九日以前一星期內投機者之收買外匯，據說即達一百萬磅之多。假如他們不這樣地乘危而推波助瀾，則法幣的跌價與外匯的緊縮也決不至於如此猛烈。投機者的投機助成了法幣的跌落。

法幣的跌價，並且如果無有力者支柱之似乎還要繼續不已的跌價，自然要造成物價的高漲，這對於我們的抗戰前途與社會生活，會發生怎樣影響呢？戰爭的破壞，本已使社會的交通關係，生產與分配的機構都發生了障礙，故已起了提高物價的惡作用了，現在再加上敵人的有計劃的統制與操縱，自然要更加甚物價的高漲，這對於我們的抗戰與社會生活會起怎樣的影響呢？

近來有一種說法，認爲法幣的跌價能刺激土貨的出口與限制洋貨的進口，故於我國經濟生活有益而無害云。這說法如果是出於真正愛國熱忱，也是臨淵而自己蒙眼，雖忠而實愚蠢。在平時，一國貨幣的貶值在某種限度內自有限制外貨輸入與刺激土貨

出口的自然作用。然目前在廣大淪陷區中，經濟上已處於受人統制的狀態，主要物品不斷被人以規定價格收買而去，這樣，法幣跌價對於刺激土貨出口的作用即使有之，亦非國民經濟之利，而是敵人之利了。另一方面，就過去半年間全國入超的大量增加來看，（入超全在淪陷區，其額竟已約略恢復了戰前的水平！）法幣的跌價實已失去了限制外貨輸入的作用。由此看來，法幣跌價毫無益於中國的經濟，而大大有害於中國的經濟。其最明顯的害處是：在戰爭廢墟之上更破壞國民的購買力，更阻礙社會生產的機能，而造成社會的困窮與不安；因貨幣制度的混亂更使日本有更進一步破壞法幣制度的機會，因而或會有使某些地方脫離法幣統治的可能；在物價飛漲而法幣破壞時，人民因生活過分窮困，會更喪失其抗戰意志。如果這種戰時物價高漲與人民更窮困的狀態繼續下去，則中國社會將更破壞，更紊亂，使日本在中國所能榨得的利益，也要減少（目前法幣的跌價已使日本對華貿易蒙受不利了），然而日本爲了維持其國內的經濟不破產，必將在中國的更窮困的經濟基礎上，更加殘酷地榨取。

總之，法幣跌價，且繼續不已地跌價，使我國的經濟生活與抗戰，受了重大的打擊。最近一期密勒氏評論報（八月十二日號）上論此問題道：『如果讓中國通貨崩潰了，則現存的國家政治與經濟機構將隨而倒台，蔣介石將軍及其在重慶，昆明，桂林，西安，蘭州，成都，以及全國幾千小城市與鄉村中的愛國同僚們，都要停滯他們的抗戰努力。』這話未免過分杞憂了。因爲像中國這樣大的國家，而且是農業國家，其社會生活對於法幣制

度的依賴程度，決不若工業國家之甚。加之，國際變化不可知，只要英國美國一天還承認中國存在外國的準備金的價值，則西南與西北仍不妨是法幣的天下，法幣不至於崩潰。但無論如何，法幣跌價之大有影響於抗戰力量及削弱淪陷區人民的抗戰情緒，則當然會是事實，即此一點，已急需我們深思熟慮以圖挽救了。

我們應該立刻起來挽救此種法幣跌價的危機，但怎樣挽救呢？同期密勒氏評論報呼籲英美各國起來救濟：『應立即合作以制止中國貨幣的跌價，在某種新的水平上使牠穩定。美國與英國須起而救濟。急遽需要大膽的行動與處置，因為現在不應再事躊躇了。』假如英美果真合作而救濟了法幣，同時還有較善辦法以制止今後日人的利用法幣套取外匯，則這當然是我們所歡迎的。但無奈這樣好事是可望而不可即的。英國的大量對華信用放款能否實現，現在還在兩可之間，因為英國近來還在東京與日本討價還價，作私下的什麼買賣哩。美國最近購買中國的銀雖是事實，然可惜所購者僅二百萬元，對於法幣的維持，真是杯水之與車薪，無濟於事。最近又有蘇聯借款給中國的傳聞，然只是傳聞，至今無法證實。救國抗戰是多麼重大事業，而我們如把這大事業

依賴在外國帝國主義或官僚們的身上，必然要自己上當，而且殷鑑不遠，現在法幣之所以弄得如此跌價者，豈不是由於過去太依靠英美的支持了嗎？所以密勒氏評論報所主張的救濟法幣的道路，即使實現也是治標的辦法，而不應作為我們法幣政策的原則。

政府所施行的救濟辦法是統治外匯，近來又頒布禁止非必需品入口的法令，以圖減少入超。然而政府事實上對於黑市場中外

匯的買賣既無法統制，而對於淪陷區域之輸入日貨亦無法禁止。現在法幣的跌價，淪陷區域中日貨的充斥，都是表示政府的這種救濟辦法已歸失敗了。

有些專從貨幣一點着眼的人，主張由貨幣方面來杜塞日本的套取外匯，其方法為改善統制外匯辦法，以政府力量平衡物價等等。此類方案當然更不會成功，因為廣大淪陷區的生產，分配與運輸工具等既大都握在日本人之手，則此等小辦法怎能改變整個經濟形勢呢？

那麼怎樣挽救目前法幣跌價的災難呢？

在目前環境下，要謀法幣跌價與物價高漲問題之解決，我們必須從認清如下幾點着手：

第一，這種問題是整個戰爭問題與政治問題的一部分，必須從整個問題的解決上設法才有好辦法，否則枝枝節節地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只有日漸墮入日本人的陷阱中，坐待他們統制的加緊而已。

第二，今日的經濟災難問題，只有由當地人民的組織力量才能獲得正當的解決，在政府力量達不到的淪陷區中固須如此，即在政府力量所能及之地方也須如此。過去那樣由上層政治機關包辦一切，而壓使民衆處於被動地位的事實，在淪陷區中已表明實是有助於日本的辦法了。從這個基點去認識，假如淪陷區域的人民都有了真正的自衛的組織，則各地法幣之被奪取，聯銀與華興鈔票的使用，各種主要農產品之被統制，是否能達到現在這樣的惡劣狀況呢？假如上海市民有組織，有力量，能真正制止投機者

的操縱，則今日的法幣跌落與米價飛漲的情形，是否會發生呢？

第三，當然，即從這種大處着眼來想辦法，目前由戰爭所遺留下的種種悲慘經濟後果，仍無法消除，有的還要日趨悲慘（如失業問題），但中國民衆決不害怕因抗戰而受痛苦，而最足以破壞他們的抗戰情緒的，是這種痛苦受得太不公平，太不平等了：同是中國人，有的乘機大發國難財，有的在以血肉抗戰；有的將要餓死，有的則華服汽車出入舞場。如果在國難務求平等負擔這一點上切實地澈底地而不是表面上地想辦法，以澈底改良此等不合理的現象，則法幣跌價與物價高漲情形之對於人民抗戰情緒的打擊，要減輕到無數倍。十月革命後，俄國經濟情形的壞比今日的中國要甚幾倍，然而俄國人民之能那樣長期地對抗外國帝國主義與國內反動勢力者，其基本原因，就在人民經濟生活的平等。

法幣問題已成了抗戰中的最大最嚴重問題，英國的金融時報且說已成了英國的最棘手問題。但關於此問題今後當然還有曲線的發展，法幣的價格當不致於一直跌落下去。因為美國不願中國被併入『日元集團』，英國更不願如此。但無論今後的發展是怎樣曲線，我國的法幣問題與物價問題如果不從上述三點着眼來求解決，則無論是靠英美也好，靠其他『有力者之支柱』也好，其結果必然是日壞一日，而打擊到整個抗戰的前途。這是個中心點，凡是愛國者所都當三思的。

★

★

兩個數目

Nathaniel Peffer

『誰假使要測驗日本的生活力，那就得注意她關於輸出與黃金供給量的兩個數目。在一九三八年，連對日圓集團各國的輸出在內，日本的輸出低落了百分之十六；假使祇對那些可以換取外匯的國家說，則差不多低落了百分之三十三。對那些必須以外匯貿易的國家而論，日本的入超幾達五萬萬日圓。入超必須用黃金來平衡：講到黃金的供給量，不能作確定的說明，因日本發表的數字是有意彎曲了的。不過就是最樂觀的人，也說現在該國所有的黃金祇值五萬萬日圓了。該國每年的產金量，約為二萬萬圓。因此，照目前的情形看來，不到一年，日本將用盡她的黃金了。此後，她祇有靠輸出貨物來換取原料。當此關稅壁壘有增無減之時，又因戰爭的結果加重了稅收及生產消費，日本將遭遇到物價高漲的困難。因輸入的原料品中有一大部分得用以生產軍需品，所以輸出一定要繼續以愈來愈大的速度而退縮。因輸出退縮而形成輸入退縮，然後又造成了更大的輸出退縮。那時日本的真正困難，將在國內開始了，而在中國將遭到更大的困難，因那時她軍火上較優的配備，行將不能保持了。她那時唯一的出路，就是要從中國奪取富源……』

摘譯自美國新共和國雜誌。

★

★

評葉青的哲學傾向

南 冠

——『哲學消滅論』，『心物綜合論』與『思維科學』——

葉青是近數年來我國哲學界上（肩着新哲學招牌的）一位風頭頗健的作家，好像俄國的波格達諾夫一樣，由於他那多產和詭辯，曾在某些智識份子和青年當中散播了不少的影響。當我們現在開始進行清算過去一切思想運動時，對於葉青的哲學似乎有首先加以批評之必要。

固然，這種批評工作已有不少的人作過，但批評者本身的觀點（如艾思奇，陳伯達等），並不見得比被批評者的高明多少，所以結果往往是『五十步笑百步』。因此我們現在把葉青的哲學思想重新來加一番檢討和批評，大概不是『錦上添花』吧！

但我們必須首先聲明一點，就是要想從各方面來批評葉青哲學的錯誤是不可能的，而且也絕對沒有必要。因為在葉青那些一大本一大本的哲學書中，以及無數的論文中，不但充滿了錯誤，而且也充滿了矛盾，重複，曲解，虛誇和詭辯等等，那是駁不勝駁，評不勝評的。因此，我們在本文中只能簡略地概括地指出葉青哲學的基本傾向，使青年們認識牠的本來面目及其社會意義，

免致再受欺騙，並獲得教訓，如是而已。

哲學消滅論

葉青的哲學，概括說來，約有三個基本部份，那就是『哲學消滅論』，『心物綜合論』和『思維科學』，也可以說，這是葉青哲學的『三部曲』。葉青的哲學思想雖然是充滿了矛盾，但這『三部曲』中間却有其『內在的聯繫』，是互相聯貫，自成『系統』的。而哲學消滅論乃是葉青哲學的出發點。

葉青爲了要建立自己的哲學及其體系，於是不能不從『消滅』其他一切哲學這一點着手。他好像也是遵照『先破壞而後建設』的方式進行他的工作的。他在『哲學到何處去』一書中，最大部份就是在『證明』『哲學之消滅』。並且還從恩格斯的哲學著作中找到了『根據』！

不錯，恩格斯起初在他的反杜林中，隨後在他的費爾巴赫論——費爾巴赫與德意志古典哲學的終結中，都提到了哲學『終結』的問題。可是恩格斯的本意，並不是說任何哲學都『終結』或

『消滅』了，而所指的僅僅是舊哲學（如自然哲學及歷史哲學等），『古典哲學』，或用恩格斯自己的話說來，就是『傳統意義上的哲學』。這在恩格斯自己已說得十分明顯。

恩格斯在反杜林的導言中，曾指出近代唯物論乃是二千年來哲學史的發展及近代科學的發見之總的成果。因此他說：『近代唯物論，在本質上說來是辯證法的，而不需要任何超越他種科學之上的哲學。……這樣，以前的哲學，只留下了一部份爲獨立的科學，這就是關於思維及其法則的科學——邏輯與辯證法，其他一切都歸屬於自的科學——歷史的實證科學之中了』。與這完全同樣的思想，恩格斯在費爾巴赫論的第四章中，更詳盡地重述了一遍並且明白地宣稱：因爲他與馬克思站在費爾巴赫的唯物論基礎上接受了黑格爾的辯證法，而形成辯證法的唯物論之後，於是德意志的『古典哲學』以及一般『傳統意義上的哲學』都『終結』了。而從那些舊哲學中所保留下來的，僅僅是『邏輯與辯證法』，這是近代唯物論所能繼承的遺產，也就是近代唯物論的主要內

容。因此，恩格斯與馬克思總是常常稱辯證法唯物論爲他們自己的哲學（列寧說：『馬克思恩格斯自稱其哲學爲辯證法唯物論，已不知有多少次』——唯物論與經驗批評論序言）。也正因爲如此，後來的馬克思主義者，如蒲列哈諾夫，梅林及列寧等人，都把辯證法唯物論看做了馬克思主義的哲學。然而葉青在哲學到何處去一書上，千言萬語，重三覆四，大倡其『哲學消滅論』，究竟是爲了什麼呢？如果他所『消滅的哲學』只是馬克思以前的舊哲學或古典哲學（後來葉青在批評的壓力之下曾有這樣的聲明），那恩格斯早在半世紀以前就已經說得非常清楚了，何待葉先生來『畫蛇添足』呢？然而事實很明顯，葉青所企圖『消滅』的並不是舊哲學或古典哲學，而正是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辯證法唯物論。就是說，他企圖在『消滅哲學』的名義之下，去『消滅』辯證法唯物論這一哲學，而代以自己『新創的』或『新發見的』特殊哲學。什麼是他的特殊哲學呢？那就是：

心物綜合論

葉青爲了建立他的『心物綜合論』，在哲學到何處去出版之後，又接連著了兩大本書，哲學問題與費爾巴哈論綱研究，以及其他許多許多論文（大部份收集於發展新哲學而戰一書中），以資論證。他在哲學問題上會明白地宣稱：『本

書所陳述的理論，是心物綜合論』（見該書三三八頁）。

但究竟什麼是『心物綜合論』呢？很簡單，就是『物質論與觀念論的統一』。但物質論與觀念論又怎能夠統一呢？於是葉青先生帶着教訓的口氣告訴人們說：

『物質論與觀念論是兩個對立物，爲什麼不能統一？……我們應該用辯證法去統一物質論與觀念論。嘉爾（馬克思）就是這樣的。在他統一黑格爾與費爾巴哈時，就把物質論與觀念論統一了。人們只知道他統一辯證法與物質論，而不知道這件事，已經可惜了。……黑格爾是觀念論的辯證法，費爾巴哈是機械的物質論，把這兩者統一，則可得出辯證法加物質論和觀念論加物質論』（見發展新哲學而戰四五頁——圈點係著者所加）。

從這一段話中，我們可充分地看出葉青爲了要『證實』自己的『心物綜合論』之『正確』和『根源』，是如何毫無顧忌地施行了『偽造』和『厚誣』馬克思。

馬克思與恩格斯曾『統一辯證法與唯物論』以形成他們的辯證法唯物論，這是我們大家『知道的』（我們『只知道』這點），也是馬恩不止一次聲明過的。至於說馬克思『統一黑格爾與

費爾巴哈時』，『統一了』『物質論與觀念論』『這件事』，真『可惜』，我們實在『不知道』！也沒有人能夠知道！但尤其『可惜』的是葉先生始終沒有告訴我們：究竟馬克思幹『這件事』的證據在那裏？然而我們手邊却具有與葉青所說的完全相反的『證據』。馬克思說：

『我的辯證法方法，不但根本上與黑格爾的不同，而且還簡直與之相反。在黑格爾看來，思想的過程……乃是現實世界的創造者，而現實世界不過是這種過程的外觀。在我看來，却恰相反，觀念不過是在人的頭腦中翻譯出來的，改造過來的物質而已。……在黑格爾的哲學上，辯證法是頭足顛倒的。必須把牠倒轉過來，而從神秘的外殼裏，發現合理的核心』（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版序文）。

馬克思在這裏清楚地指示了出來：他的辯證法與黑格爾的辯證法之區別，恰在於他拋棄了黑格爾的『唯心論』，所謂『神秘的外殼』這一點上。恩格斯在費爾巴哈論中，追叙他和馬克思與黑格爾哲學的關係時，更明顯地說：

『從黑格爾的哲學脫離出來，也是回轉到唯物論的觀點上去；這就是說，人們決定不以任何唯心論的成見去觀察真實世界（自然和歷史），……這也就是說，人們決定毫不

留情地犧牲一切唯心論的謬說……人們接受了黑格爾的革命方面，即他的辯證法方法。

但在黑格爾的形式之下，這個辯證法是不能應用的。在黑格爾看來，辯證法是觀念的獨立發展。……這種思想上的混沌狀態是必須剷除的。我們的責任就在以唯物論的眼光將頭腦中的觀念看做是真實事物的反映，而不再將真實事物看做是絕對觀念發展到某種程度的反映。……以前建立在頭上的辯證法，於是建立到腳上來了。」

由此，我們可以異常明白地看出：馬克思在『統一黑格爾與費爾巴赫時』，絕對不是『統一觀念論與物質論』，而是『克服』前者的『觀念論』而『保留』其『辯證法』，與『克服』後者的『機械論』而『保留』其『物質論』，辯證法的唯物論，正是這樣形成起來的。我們想，像這樣鐵一般的事實或證據，葉青無論如何精於詭辯，是無法否認的。

不過，葉青的『心物綜合論』，還有另一個根源』，據他自己說，還是最主要的『根源』，那就是馬克思的費爾巴赫論綱。因為該論綱上第一節有如下的一段話：

『以前的一切唯物論——連費爾巴赫的也包括在內——的主要缺點，就在於牠們對於事物，實際感覺的世界，只在客觀的或直

觀的形式之下去觀察，而不看做是人類的活動，實踐，去主觀地觀察；這就說明了爲什麼在行爲方面特別被與唯物論相對抗的唯心論所發展，但只是抽象地發展，因爲唯心論是當然不能如實地認識真實的活動實踐的。』

葉青從這一段話中得出的結論是：『物質論主張物質產生觀念，觀念論主張觀念產生物質，……因爲物質產生觀念，即等於世界產生觀念，觀念產生物質，即等於觀念產生世界，但是嘉爾不滿於物質論只主張環境造人，因而批評費爾巴哈把理論與實踐分離。同時又不滿於觀念論，說牠不適於發展行爲方面，因爲牠只是抽象地發展，未能如實地認識。那末，怎樣呢？統一牠們』（爲發展新哲學而戰四九——五〇頁）。葉青先生這一個『統一』命令一下，於是『物質論與觀念』就『統一』了，這真是一個偉大的勳績！雖然如此，但這與費爾巴赫論綱的原來意義有什麼關係呢？堅決反對觀念論的馬克思能承認那『主張觀念產生物質，即觀念產生世界』的『觀念論』與『主張物質產生觀念，即世界產生觀念』的『物質論』之『統一』嗎？我們只要把前面所引馬克思與恩格斯的話稍微覆按一下，就足以答覆這個問題而有餘了。

其實，費爾巴赫論綱的全部意義都十分明

顯，就在馬克思看來，費爾巴赫及其以前的一切唯物論，都是偏重於客觀的觀察方面，沒有能了解客觀與主觀的聯繫，即客觀認識與主觀實踐間的聯繫，因而常常流於機械性與玄學性，正因爲如此，馬克思主張以辯證法的唯物論克服此種機械性與玄學性，使理論與實踐聯繫起來，即使認識世界與改革世界密切地聯繫起來，這絲毫沒有向唯心論表示讓步，或容納唯心論的影子。因爲馬克思雖然提到了唯心論『發展行爲方面』，但立刻指出牠『只是抽象地發展』，『不能如實地認識真實的活動實踐』，這就是說，唯心論的『行爲』是建築在空中樓閣之上的。葉青把這種建立在空中樓閣上的唯心論與唯物論『統一』起來，甚至說，這就是『辯證法的唯物論』（物質論——觀念論——辯證法物質論——爲發展新哲學而戰四七頁），這還不是有意曲解和捏造嗎？

總而言之，葉青的『心物綜合論』或『物質論與觀念論的統一論』，要想從馬克思或恩格斯方面找到『根源』或『證據』，是徒勞無益的。所以『心物綜合論』，只能算是葉青『新創的』理論。這理論與馬克思的辯證法唯物論毫無共同之點，僅是一種『心物調和論』或『心物折衷論』而已。關於這一點，葉青在他的哲學問題上曾不自覺地然而極坦白地招供了出來：『物質論與觀念論各有道理，必須保存……從各方面看，

又覺得物質論與觀念論各有缺點，必須補足！……因此『我們不能採取否認一方面的態度。因為那是否認物質論，就是否認觀念論。然而只要否認一個，便是承認一個，主張一個了。這樣，結果不過是加深牠們的矛盾而已，當然不是辦法』。『我們不能採取承認一方面的態度，因為這無異於採取否認一方面的態度。結果依舊是加深物質論與觀念論的矛盾。如果要解決物質論與觀念論的矛盾，只有走綜合之路，採取綜合的方法。綜合的方式只有並行論和同一論兩者』（該書三一——三四頁）。像這樣的心物『並行論和同一論』，還不是心物的『調和論或折衷論』之別名嗎？！

可是恩格斯，蒲列哈諾夫及列寧都不止一次告訴了我們：一切哲學上，尤其是近代哲學上最根本的問題，就是關於精神和物質的關係問題。由於對這個問題的答案不同，哲學家就分成兩個營壘：主張物質在前的哲學家則屬於唯物論，反之則屬於唯心論。任何的心物調和論或折衷論，都是帶假面具的唯心論或唯心論的變種。所以葉青的『心物綜合論』亦僅僅是帶假面具的唯心論或唯心論的變種而已。

思維科學

葉青既用偷天換日的手法，從表面『消滅』

般的哲學』出發，而暗地『消滅』了辯證法唯物論以建立自己的唯心論之後，於是便進而製造一個哲學體系——這是一切唯心論者的特別嗜好——這體系就是他的『思維科學』。他在哲學到何處去一書上所製定的思維科學的體系共分三大類：

第一是關於思維符號的研究，其中包含：

（一）以文字思維的語言之研究——言語學；（二）以數字思維的數之研究——數學。

第二是思維活動的研究，其中包含：（一）

注重原理的認識之研究——認識學；（二）注重法則的論理之研究——論理學；（三）注重技術的方法之研究——方法學。

第三是思維結果的研究，一般包含：（一）

就內容而說的知識之研究——知識學；（二）就形式而說的文之研究——文學；（三）就總體而說的意識或文化之研究——文化學。

葉青自定出這個體系之後，隨即又發見了少的新部門，於是在上述的第一類中再加上『圖形學』和『文字學』；在第三類中取消了『文學』而加上『觀念學』；最後又另行創立了『第四類思維科學』，其中包含『文學和修辭學』（見發展新哲學而戰一八五——一八六頁）。此外，

在葉青哲學中還有所謂『本體論』，『宇宙論』及『人生論』等。葉青單為人生論即建立了一個『人生哲學新體系』，在這個體系內，又包括了四大部門：『人的根源』，『人生的本質』，『人生的目的』以及『人生的方法』等。我們由此可以推測，也許葉先生將來還要建立其他的什麼『新體系』吧？——如『本體哲學新體系』或『宇宙哲學新體系』等。

像葉青這類的『體系』，尤其是他的思維科學體系，我們實在覺得沒有浪費時間加以批評之必要，祇要凡是懂得一點辯證法唯物論或唯物論辯證法的人，都可以一望而知其不過是一些科學名辭或術語堆集起來的垃圾箱。可是葉青不但誇說這個『垃圾箱』是『科學的科學』或『科學的哲學』，並且還硬要把牠與恩格斯的名字聯繫起來，宣稱他是在『繼承了』甚至『發展了』恩格斯的。爲了這一點，我們便不能不破費一點時間來檢討了。

恩格斯關於所謂『思維科學』的說法，第一次具見於反杜林中，這我們在前面已經引叙過了。第二次，也可以說是最後一次，則發表於費爾巴赫論一書內，其本文是：『哲學從自然界和歷史中被驅逐出來以後，只剩下一個領域可以給牠藏身了。這個領域就是純粹思維：研究思維法則的科學——邏輯與辯證法』。這就是說，從一切舊

哲學剩下來並能够保存的東西，可以當做『研究思維法則的科學』的，只有『邏輯與辯證法』。邏輯可以包括於辯證法之中，但辯證法『在舊哲學（如黑格爾）的形式之下，是不能應用的』，

必須建立在唯物論的基礎上，變成唯物論的辯證法，然後才能成為真正的『方法學』，成為『研究自然，社會和思維的運動和發展的一般法則』

之科學。如果說辯證法唯物論是一種科學的世界觀，那末，唯物論的辯證法便是一種研究科學的方法論，而辯證法唯物論應用到人類社會歷史上去，就成為歷史唯物論（或唯物史觀）——辯證法唯物論，唯物論辯證法和歷史唯物論，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哲學體系。此外，我們從來沒有看見

或聽見過馬克思或恩格斯還說到別的什麼『思維科學』體系，或其他的任何哲學體系。至於葉青所描繪的『思維科學體系』，不但與恩格斯毫無關係，而且簡直是違反恩格斯的。最明顯不過的一個事實，就是在葉青的思維科學體系中，竟連『辯證法』——這是恩格斯所極端重視的——

這個術語都沒有。然而葉青還要說他是在『繼承』甚至『發展』恩格斯，人類中的『厚顏』與『狂妄』，還有甚於此者嗎？實際上，葉青的『思維科學』及其『體系』，不過復活一切舊哲學中之最腐朽的經院主義式的哲學體系而已。由此我們可以看到：葉青從『消滅哲學論』出發，

企圖建立『新哲學體系』，兜了許多圈子，結果還是回到了最腐朽的最無出息的最舊哲學營壘中去了！於是葉青哲學的『使命』也獲得了凱旋！！歎休哉！！

葉青哲學的社會意義

凡是一種思想或哲學，只要『言之有物』（不算好與壞），稍成系統，並能影響某部份人羣者，一定不是偶然發生的，一定負有某種使命或含有某種社會意義。但葉青哲學的使命或社會意義究竟是什麼呢？要解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得從較遠的地方——歐洲先進國家的情形——說起。

近代唯物論或辯證法唯物論，自從被馬克思和恩格斯完成的第一天起，牠就變成了新興的無產階級的思想解放和指導實際運動之唯一的武器。無產階級藉着這一武器之助（自然是經過擁護這個階級利益的知識份子）不但擊破了資產階級的世界觀——一切唯心主義的哲學——暴露了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與不可避免的命運；而且還建立了自己的科學世界觀，預示了自己的勝利前途，指出了走向這一前途的路徑以及鬥爭的基本方法。正因為如此，無產階級逐漸地抬起頭來了，逐漸地變成威脅現存社會基礎的勢力了。在這樣的情形下，代表資產階級的哲學家或思想

家，當然不能不起而進行反對。於是反辯證法唯物論的運動，隨着無產階級的解放運動而日漸開展起來，並且跟着這一運動的變化而隨時改換其方式，這是從歐洲將近一百年來的歷史可以明顯地看得出來的。

當辯證法唯物論還限於在知識份子中宣傳，還沒有深入工人大眾的頭腦時，資產階級的哲學家們往往只站在外面譏笑這個理論，諷謗這個理論，攻擊這個理論，如前世紀中葉英法的不可知論者，實證論者及德國的新康德主義者所幹過的，就是如此。但當這個理論在工人羣衆中取得了某種程度的信任，並成為他們實際鬥爭的指南時，於是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便不能不稍降身份潛入工人運動的隊伍內，裝做擁護甚或表示欲為之而奮鬥的樣子（自然，這裏只是純就客觀而言），用『曲解』，『修正』，及『詭辯』等等的手段，來歪曲這個理論，分解這個理論，乃至把牠改頭換面，以便蒙混工人們的眼睛，破壞他們的運動，企圖使之永遠隸屬於資本主義的影響之下。如德國的杜林和倍因斯坦，俄國的波格達諾夫和巴柴洛夫等，就是其中著名的代表人物。這些人們之在哲學上，正如謝德曼，麥克唐納，鮑威爾，屠拉第，波特勒索夫，萊翁卜倫，耐林格，特爾曼，多萊士及狄茨等之在政治上一樣，不過是資產階級在無產階級中的代理人而已。

像歐洲先進國家這類的喜劇，當落後國家的歷史已追跡牠們的軌道而前進時，自然也不可避免地要表演出來。自從辯證法的唯物論來到我國與普羅列達利的解放運動發生了關係之後，張東蓀和郭任遠等便學着他們歐洲前輩（不可知論者，實證論者及新康德主義者）的榜樣，向這個理論進行了激烈的鬥爭（其手段當然也是譏笑，諷謗，抨擊等）。迄至看到單站在外面攻擊不能發生多大效果，尤其是看到被剝削和被壓迫的前進青年們都日漸趨向於辯證法唯物論的旗幟之下時，於是我們的倍因斯坦和波格達諾夫輩便應運而生了——這就是我們的『新哲學家』葉青，艾思奇，陳伯達諸位先生。

這些先生們所負的使命及其工作，在本質上當然也是同他們的歐洲前輩一樣，在於用『曲解』，『修正』，『詭辯』，以及『改頭換面』和『牽強附會』等等的手段（註一），把辯證唯物論弄歪曲之後，使之與一切唯心論『統一』起來，或『聯合』起來使之適合布爾喬亞的利益。

我們知道，哲學上的『心物統一論』或『哲學聯合論』，翻譯成爲政治上的語言，就是『階級合作論』，就是把被剝削和被壓迫階級隸屬於剝削和壓迫階級的統制之下並爲之服役的理論。這種理論，在當前的抗戰運動中，好像一根紅

線，把一切事實都連貫起來了，可是這正是當前思想與實際運動的危機之所在！

爲要挽救這樣的危機，在哲學上首先應堅定地依據辯證法唯物論創立者的精神邁進。那就是：

『拒絕調和唯物論和唯心論的任何企圖，而朝着明白決定的哲學坦道上走去……』

（列寧論馬克思）

『在一切問題方面，簡單明瞭地把唯物論與唯心論對立起來……』（列寧論恩格斯）

——以上兩節均見唯物論與經驗批評論。在這樣的『精神』光照之下，我們哲學上的波格達諾夫等既無法掩護，而政治上的謝德曼等也就自然不敢橫行霸道了。

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五日

『註一』（在這方面，我們的倍因斯坦和波格達諾夫比起他們的前輩來雖然淺薄得多，却也狡猾得多，因爲他們不但公開倡言『修正』，不從康德與馬赫等人借用術語而且還處處要『根據』馬克思和恩格斯以表示他們的『忠實』——這不能不說是他們『技巧上的進步』）。

（註二）（這種哲學上的『聯合論』，由艾思奇陳伯達等倡導。艾陳與葉青的區別，在於後者企圖製造一個新哲學體系，以

便暗中代替辯證法唯物論；而前者却無此種野心，他們在原則上完全接受唯物論，不過在實際運用時却毫無顧忌地實行牽強附會，從『理論上』以便『解釋』某種政治路線及其結果——至關於艾等的哲學傾向，我們將在另一文中詳加批評）。

（接自第三頁）對中國抗戰的一個打擊。

不過在那個時候，美國決不會錯失她干涉遠東的良機。如果歐洲已處在大火之中，英法等國的勢力業已從東方撤退，美國爲什麼不起來一擊日本這疲憊之師呢？所以那時美國態度之必趨硬化，乃是無可疑問的。

中國在那時的態度自然應該利用美日的大戰，爭取抗戰的最後勝利。不過這個勝利之是否真實，又得看我們之是否能自力奮鬥以爲斷了。

總之，未來大戰並不是無條件有利於中國抗戰的，尤其在牠的初期，抗戰多半將遇到更嚴重的困難；倘然渡過了這個困難，我們便能利用列強間（多半是美日間）的衝突而獲得勝利，但這時勝利的真實性也還是一個鬥爭的問題。

爲要克服未來大戰時的加倍困難，并使可能獲得最後勝利不致成爲虛幻起見，中國的抗戰必須讓大眾的興起，並由他們作爲主體才有保障。

八月二十二日

分析與結論

木 君

分析與結論的關係是相互依存的。正確的分析，必須有正確的結論來作牠的繼續，才能有實際的意義。反之，一個正確的結論，如果並不是根基了正確的分析而得，則得到這一結論的人，決不會對他有真正的了解或深刻的信心。

不過兩者間雖有這樣密切的一種關係，但我們假使就一般的學術中，尤其在與實際政治有關的理論中加以觀察，則往往能發見許多分析與結論無關，或結論與分析絕對矛盾。因此，我們在全部政治思想史中，尤其在革命時各個政治的意見中，常能見到某些相同或相似的分析，但做着極不相同，或極端相反的結論；或標榜着一個同樣的或相似的結論，却由於極不相同的分析。

這樣的實例是多得不勝枚舉的，最顯著的有如：某些封建的反動貴族，常用與社會主義者相類似的『分析』來責罵布爾喬亞的自由主義；但前者的結論是回復封建，而後者的結論却是前進到社會主義。

再據馬克思的分析；資本主義在歷史的意義上說，是有其客觀的進步性的；俄國的斯脫羅威教授也抱着同樣的意見，可是結論呢？前者指出牠必需讓位與更進步的社會組織，而後者却肯定了現存制度（即沙皇制度）的永久性。

由此可見正確的結論，不一定能得到正確的結論；至於段正

確的分析，那當然更不用說了。

相反的例子也同樣的多，有如各國所有的工黨，甚至有許多『激進的』知識分子，都深信現存社會制度是終於要過渡給社會主義的社會的。但各人達到這一結論時的分析却十分不同：有的基於人道主義的幻想；有的說由於社會合作與團結的加強；更有人則以為是階級鬥爭的必然結果。

這種分析與結論之間的矛盾與差異，一方面由於從事分析或達到結論的人，其所站的階級立場不同，以致所見亦異，這是無可避免的；另一方面則由於某些反動分子惡意利用（或部分利用）革命性的分析，來達到反動的結論，或利用正確的結論來掩護他錯誤的分析，這樣的行為當然是卑鄙與陰險的。

可是在目前中國的政治中，就有着這樣卑劣的例子：某些人正確地分析了現存統治政制的缺點及其領導路線的錯誤，并要求除去這些缺點與錯誤，藉以謀得抗戰的澈底勝利；而『某派』則利用了（當然是部分的與故意曲解的）這種分析，企圖達到他們自己投降乞和的結論。這雖是歷史上一個習見的事實，然而有些人却見後者之某些分析竟與前者的相似，於是硬指前者即是後者，則其陰險或愚蠢的程度，也決不遜於乞和論者了。

(一) 『藝術最高發展的某些時期，與社會的一般發展並無直接的關係，與社會組織的物質基礎與輪廓結構，亦無直接的關係。』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評序言。

(二)

『你顯然覺得在這本書（明娜·考次基的一本小說——譯者）裏，關於你所宣佈的對於世界的意見，必須公開地有所偏袒……但我相信偏向是應該從小說的情景與行為之本身中發生出來，毋須明顯地規定，而詩人的責任，並不在於把自己所描寫的那種衝突的前途，供給讀者以一個現成的歷史解決法。』

——恩格斯：致明娜·考次基的信。

(三)

『今天，們偶爾在新聞報上看到了馬耶考夫斯基一首關於政治題材的詩。我沒有資格來稱讚他的詩才，因為我很知道自己在這方面是不夠格的。不過我從政治與行政的觀點，很久以來就已經享受過這樣的快樂了。在他的詩裏，他猛烈地諷刺開會，他嘲笑那些共產主義者一無所事，祇從這個會跑去開那個會。我不曉得怎樣來批評他的詩，不過詩中的政治，我能替牠發誓，是絕對正確的。』

——列甯：一九二二年真理報上論文：論馬耶考夫斯基。

由馬克思的話中，我們可以知道：某些最優越的藝術品，並不是當時社會情形的一個直接與簡單的反映；恩格斯在他的信裏，告訴我們這樣的一個真理：作者的責任並不在於直率地表示出自己對於書中人物的偏向，不必把自己的意見提出來叫人家接受，而應該忠實地描寫現實與生活，讓讀者在這些現實與生活的認識中，自然而然地表示出愛與憎；列寧論文的意思是顯然的：藝術與政治不

完全是一件東西。政治家站在『行政的觀點上』，祇能批評藝術中所含有的政治，並沒有資格批評藝術的本身。但是在當今這三位大師的『衣鉢傳人』中，有誰能不把上述的意見斥為『自由主義』或『小布爾喬亞的意識』的呢？據這班人的意見，『藝術是一種武器』，『藝術是簡單為政治目的服務的一個工具』。所以最能跟着政治路線轉變的，就是最好的藝術。一九三五年以前，我們在全世界看到了立即建立『普羅文學的運動』；『第三時期』變為『人民陣線』之後，『普羅文學』就跟着變做『民主』或『國防』的文學了。現在德蘇已經簽訂了協定，文學藝術自然也得跟着適應，在不久的將來，也許會把歌頌民主與反對納粹的作品打下去吧？但這是不幸的！

哲學上一個舊案的重提

三 男

時代的進退，可以在哲學思想上找到最好的反映。當這法西斯主義猖獗一世，大戰的魔手扼住了全人類咽喉的時候，各種助紂爲虐的反動理論，得過且過的玩世思想，以及大難臨頭時急來抱佛脚的野蠻迷信，都在哲學上現出形來。而這一切魍魎魍魎的醜態，又都掩蔽在一個總的護符之下，這護符就是唯心論。

從國社主義者法西斯主義者起，一直到民主主義者，甚至連一部分所謂『社會主義者』在內，都聯合在唯心論的大旗周圍，齊向辯證唯物論進攻，更進而攻擊社會主義的學說，尤其反對布爾雪維克主義的理論與實踐。

不過在這唯心論的總商標之下，自然還因各人政治立場的不同，仍有其流派間的互異。例如國社主義者利用些尼采和費希德的學說，民主主義者拿着實際主義的武器，而某些『社會主義者』則背誦新康德派的詞句。

對於這一大批唯心論者的聯合進攻，辯證唯物論的戰士們也已經奮起迎戰了。現在這論戰業已遍及歐美兩大陸，差不多一切前進學者，革命戰士，都已加入了戰團。這運動，我想不久定會波及到我們中國的吧。

在中國這次具有進步性的偉大抗戰中，不幸我們已經看到了某種反動的與復古的思想流派，在一些參加抗戰的知識者中提倡

着與傳播着。在某些領域中，人們竟退回到五四以前的時代中去了。因此，當我們介紹目前世界上的主要論爭，及批評我國反動思想的復活之前，不得不把中國哲學論爭上的一樁舊案，先行重提一下。

十六年前（一九二三年），當中國的思想界激劇分化與前進之時，曾發生過一次震動一時的大論爭，即所謂科學與人生觀的就是。直接起因是由於張君勱先生在清華大學裏一篇講演，他的大意是：人生觀不能受科學的支配，不能爲科學所解釋，因爲：『人生觀之特點所在，曰主觀的，曰直覺的，曰綜合的，曰自由意志的，曰單一性的……』接着他又舉例來說：『亞丹斯密，個人主義者也；馬克斯，社會主義者也；叔本華，哈德門，悲觀主義者也；柏拉圖，黑智爾，樂觀主義者也。彼此各執一是非，而決無絕對之是與非。……』

演辭一出，中國的地質學家丁文江先生馬上起來應戰，在勞力週刊上寫下了幾萬字的長文；但主要的意思很簡單：科學是可以支配人生觀，解釋人生觀的。可是究竟怎樣支配，如何解釋，他却完全沒有反舉出來；而更糟的則是丁先生拿了柏克萊，皮爾遜等的經驗批判論來反對張先生的柏格森主義，所以無怪陳獨秀先生在序文裏要說擁護科學這方面『幾乎是卸甲丟盔的大敗戰』

了！

後來丁張兩方都參加了許多教授學者；但大半是像獨秀先生所說的：『下筆千言，離地萬里』，看了祇能叫人慨嘆乎學海的淵博，無從窺其邊際；至於究竟說些什麼，那恐怕連這班學者先生自己都不甚了了，所以那次論戰雖然是砲火連天，聲震遐邇，可是會幾何時，烟消灰滅，如今祇賸着亞東圖書館的兩冊小書，作個紀念，在現代人的腦海裏，可以說已經逝去得無影無蹤了。

我們現在如果重讀此書，在這些名流學者的煌煌大文中，誠如胡適之先生所云，祇有吳稚暉先生的宇宙觀與人生觀，才算稱得上『起講』，而值得胡先生『表示敬意』的。

因為參戰的全體學者中，就他們的專門學問說，雖然有許多是優秀的科學家，但是一談到哲學可就糟了，簡直是毫無例外地屬於唯心主義的營壘，擁護科學最力的胡適之與丁文江兩先生，也還只是從杜威先生那裏學來的一點實驗主義，所以無怪他們要在柏格森，杜里舒這班『玄學鬼』之前『卸甲丟盔』了。

不過吳稚暉先生這一通砲火，至多也只能破壞一部分『玄學鬼』的陣地，當然更談不到什麼『最後勝利』。因為吳稚暉先生雖然採用了法國造唯物論的手溜彈，並且還開放了英國造進化論的步槍；但他總還不肯或不敢用德國造辯證唯物論這一尊無堅不摧的大砲；所以他表面上似乎也打死過幾個『玄學』兵，但結果却祇做了一個『科學』軍敗績後的一位『押陣大將』，等得到了民國十四五年，中國另一部分兵士搬出了馬克思那尊大砲來的時候，吳老先生索性就對『玄學鬼』投了降，把所有的武器都向真

正的唯物論者投射過來了。這情形當時曾經使許多吳老先生的愛護者驚疑的，後來時過境遷，人們也就把這位『妙語驚天下』的老先生忘了；但是在哲學思想上，却從不會有人企圖對他老先生的態度，作一次鄭重其事的分析的。

在這篇短文裏，我們當然不能來完成這個任務，不過既然把問題提出來了，總不能就此算數吧，至少我們得把吳稚暉先生思想的要點，加以簡單的觀察。他所信仰的宇宙觀與人生觀，包含着以下的幾個要點：

『（一）我是堅信精神離不了物質；』

『（二）我是堅信宇宙都是暫局；』

『（三）……古人不及今人，今人又不及後人；』

『（四）我信道德乃文化的結晶，未有文化高而道德反低下者；』

『（五）我信宇宙一切皆可以科學解說。』

上面這幾點，一般的說來，當然都是唯物論的說法了，連辯證唯物論者都可承認的；那末為什麼牠們不能戰勝『玄學鬼』，而且吳稚暉反被『玄學鬼』俘虜了去呢？原因很簡單：在階級社會裏談『人生觀的科學』，如果把階級的學說拋開不要，那就別談什麼反對玄學；因為一個人既不能離社會而存在，則他無論如何，總不能不是社會中某一階級的一個成員，這一成員的資格，即確定了他的宇宙觀與人生觀（尤其是人生觀），現在假使想談某一人的人生觀而不從他所隸屬，所生活的階級立場下手，只是空空地研究他對於宇宙與人生的觀念，要想他不流於形而上的玄

學，其可得乎？

誠然，吳先生把道德，直覺等『微妙的』東西，並不像『玄學鬼』那樣地統統送進了不可知的王國，他相信這些都是環境的產物，是受着空間與時間的限制的；但是撇開了階級來談社會環境，那末這所謂環境也就抽象與空洞得可憐了。同時『玄學鬼』也決不會怕這件武器的，而且他還能給你一個反攻；譬如吳稚暉說靳雲鵬聽了要『勃然大怒』的事情，假使你對英國的勞愛喬治說，『彼亦止笑謝！』可知『羞惡之直覺，實會賦自環境……』但是『玄學』兵主帥張君勳先生也許會那樣來回答吳先生：我原已說過，『凡此問題，東西古今，意見極不一致』，所謂『東西古今』，就是所謂『時空的限制』了，你們只是重複了我的意見，並沒有進而說明『東西古今』的人生觀『不能一致』的道理。

如果張先生真的這樣反駁過來，我敢斷定吳先生是無辭以對的，因為所謂『賦自環境』也者，實在也只有說明其然，而不會說明其所以然呢。要說明其所以然，那只有借重於唯物史觀與階級學說了。靳雲鵬之所以聽見人家要『替他老母做媒』而『紅漲於臉』，以及勞愛喬治之所以祇是『笑謝』，歸根結蒂地說來，還是逃不了女子片面貞操與從一而終那些觀念的作用，靳老爺之勃然大怒，祇因為他是生長在前資本主義時代，他是宗法社會殘餘勢力的政治代表，是落後的地主階級的統治者；對於這個階層，女子的片面貞操觀是堅執着的；至於勞愛喬治則是世界最前

進資本主義的產物，是工業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對於這一階級，婦女的地位至少已經提高了，再醮婦已經算不得什麼恥辱了，所以他決不會因人勸喬治老太太再嫁而拚命；這樣看來，靳老爺的『怒』，與喬治先生的『笑』，實在不能簡單以中英國情殊異或中英國民性不同這類話來解釋的。倘簡單提到『國情』或『環境』，並不站在唯物史觀與階級學說的立場上來指出怎樣的環境，並怎樣造成這環境，那末『玄學鬼』張君勳先生也早已指出『人生觀因東西古今而不同』了；並且『東西古今』祇有比『時空限制』說得更加明確的，那末這樣說來，『押陣大將』一遇到辯證唯物論的壓迫，而立刻轉變成為『玄學軍』進攻的急先鋒，難道還有什麼可以驚疑的嗎？

至於吳稚暉先生以下的全體『科學』戰士們，讓我們不客氣地說一句，他們本質上無一不是澈頭澈尾的『玄學鬼』，不過大多披上一件實驗主義的外套罷了。所謂實驗主義也者，本來祇是一種最狡猾的唯心論，一種最煩瑣的經驗論，一種最淺見的功利論。無論對於那一個人，或那一社會事件，他們都單另地拿來放在資產階級的測量器上，在自己這個庸俗的智慧室裏，『實驗』起來，他們一方面為自己的階級利益所囿，另一方面又排斥了黑格兒哲學中的歷史的觀點，所以這班實驗主義先生們『實驗』後的認識總是極其反動與荒唐的。試看中國的例子吧，有一位實驗主義的大師，很久以來，就只曉得『外國人到中國來傳教做生意』，而怒斥帝國主義為神話，他不想從根本上解救中國，而只

願『好人出來組織政府』；這些主張，都是實現主義『科學分析』後的最好結果！

× × ×
中國那次思想界的大混戰，表面上似乎沒有什麼結果，但是民十四以後中國歷史的實際發展，給這次爭論以有力的解決，辯證的唯物論以排山倒海的力量，衝破了一切障礙，開始征服了中國一切前進青年與知識分子的心智，那時無論柏格森牌道地的玄學也好，皮爾遜牌『科學的』玄學也好，統統銷聲匿跡了，甚至連『押陣大將』的『人欲橫流』的『唯物論』，也都像太陽出現後的螢光一樣，只能在少爺小姐們那些終日幽暗的閨閣裏閃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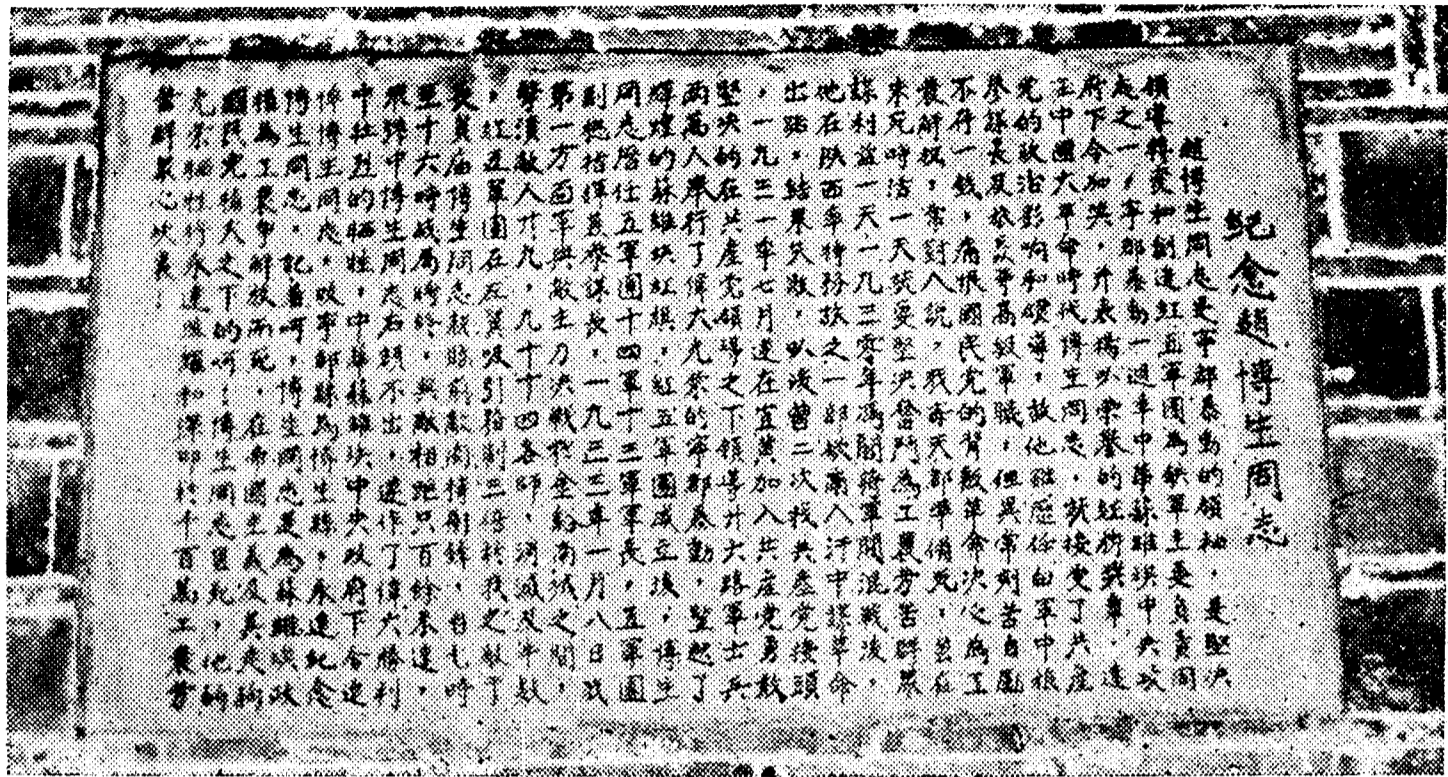
但是歷史却永遠是進兩步退一步的。隨着法西斯的抬頭，民主主義的衰落，以及社會主義的危機，全世界一切反動唯心論的哲學派系，又都張牙舞爪起來了。甚至那正在進行偉大戰爭的中國，也不能不受這一潮流的影響。這誠然是一件令人不快的事，但歷史既然要十六年前的舊案在今日重提，那我們當然也只有耐着性子重幹。真正前進的思想家決不應見歷史車輪之後退而沮喪，他應認清楚倒退的方向，阻止其更向後退確定他的到着點，並使其開始新的前進。但要完成這樣的任務，中國辯證法的唯物論者便應該向各種各樣的復古唯心論，尤其要對自命為『唯物論者』的新復古派進行無情的攻擊與批判。本文之作，也許能成爲此種進攻的一次小小的前奏吧。

編者後記

在這年頭兒，辦刊物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第一得賠錢，第二得招怨，還有第三第四……的無窮麻煩與阻難。但不管這一切，我們還是辦出來了，而且辦到了第二期。這裏首先自然得歸功於本刊發行人的熱心，其次是撰稿諸先生的贊助，我們這二期的稿子當然還不能盡副發行人的期望，即不一定能做到『讀物須有目的』的地步，但我們的內容自信是相當過得去的，至少都是作者精心研究的結果，不是陳套調調，不是人云亦云，更不是爲任何權威者曲意代言的。以後，我們還要朝着這個路向邁進。不過一個刊物的成功，主要還由於讀者與作者的打成一片；即一個成功的刊物，決不應是少數人『辦』出來給多數人讀的，而是要成爲大多數讀者自己的刊物，即能表現他們的意見的。因此，我們在這裏還要重覆一句，本刊竭誠歡迎投稿，凡不以造謠汗蠟爲能事的文章，即使思想上與本刊多數撰稿者的意見不同，亦必盡量掲載。

本期因稿件擁擠，上次預告中有兩篇文章：馬爾勞論與思想復古與抗戰，不得不臨時抽出；德蘇關係的演變則臨時代以俄國革命軼史。

本刊自第三期起，擬增闢『讀者通信』一欄，專載讀者對於本刊文字的批評，或抒己見者亦可，願讀者諸君多多賜稿（惟此欄無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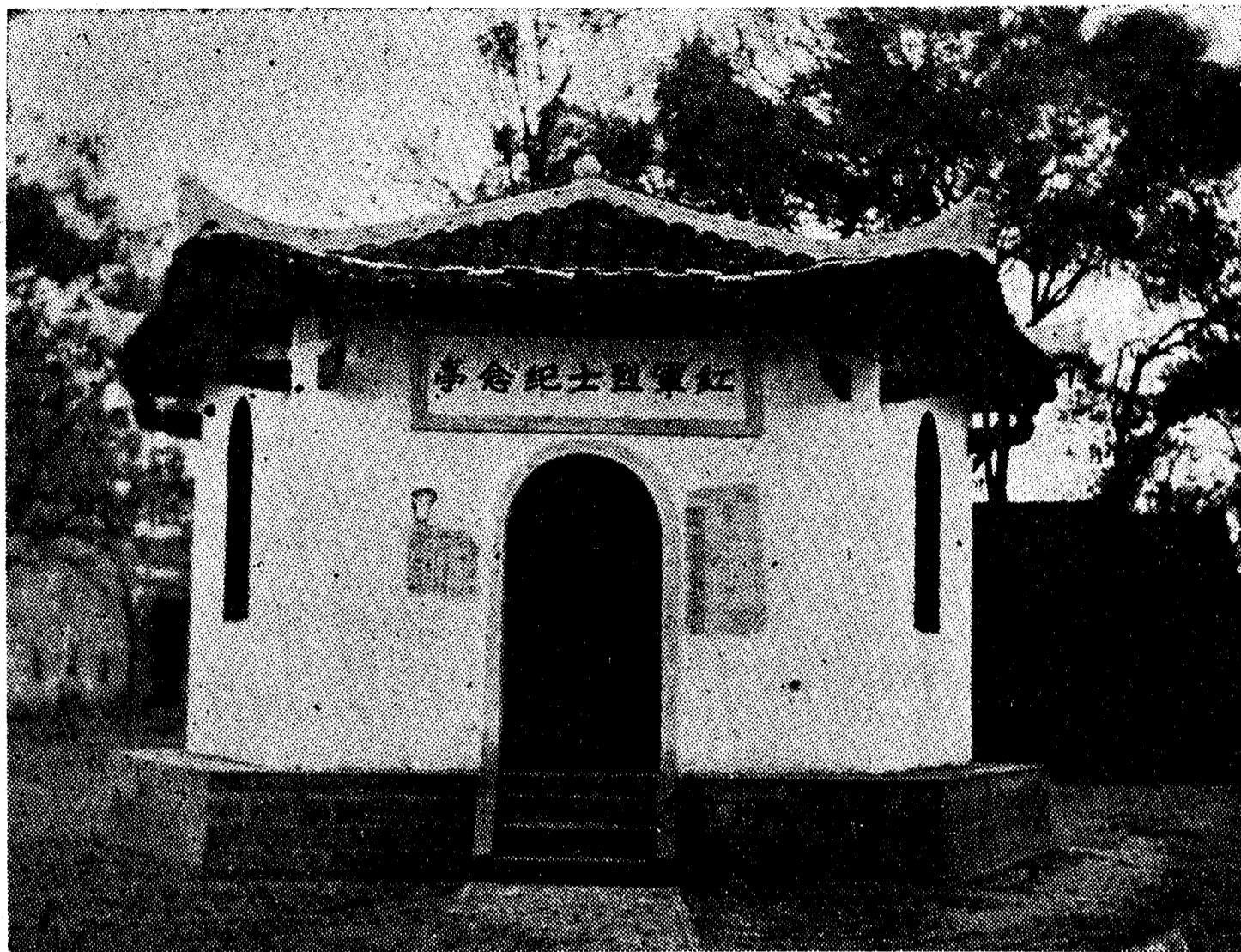
OUT OF THE PAST

The four pictures on these two pages were given to Mr. Alexander H. Buchman, publisher of *The Living Age*, by Kuomintang officials in Ningtu, Kiangsi Province, early in 1935. In view of the present political situation in China, these pictures possess more than a historical interest.

The top photo is of a memorial plaque. A translation of the inscription follows: "IN MEMORY: CHAO PU-SHEN"

"Comrade Chao Pu-shen was the leader of the Ningtu revolt, was one of the responsible Comrades who led and created the Fifth Red Army and made it an Iron Army. On the first anniversary of the Ningtu insurrection, the Central Soviet Government of China gave Comrade Chao the Order of the Red Flag. As far back as the great revolution, Comrade Pu-shen had already been influenc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was under its political leadership. Although he accepted many high posts in the White Army, for example, Chief-of-Staff to the Regiment, and later Regiment Commander,

he was still very poor. He hated the betrayal of the Kuomintang and determined to fight for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workers and peasants. He always told the people that '...I am ready to die every day... If I have but one day to live, I will devote it to the Chinese workers and peasants...' In 1930 the militarists Feng Yu-hsiang, Yen Hsi-shan, and Chiang Kai-shek fought aimlessly. Comrade Chao then was in Shensi. He led one part of the Special Service Regiment, attempting to go south toward Hanchung where he desired to make a revolution, but failed. Later he searched for the Communist Party twice. In July 1931 he entered the Communist Party in Yih Huang and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he boldly led the troops of the 26th Route Army, about 20,000 men, completed the great and glorious Ningtu Revolt, and splendidly raised aloft the Red Banner of the Soviets. After the Fifth Red Army was created, Comrade Pu-shen became its Commander and later became the Commander of the 14th and 13th Red Armies. Still later, he became Vice-Commander-in-Chief of the Fifth Red Army Group and concurrently Chief of Staff. On January 8, 1933 our First Route Army engaged the main forces of the enemy between Kinchi and Nancheng. We defeated the 29th, 40th, and 14th White Divisions and decimated half of the men. The Fifth Army was our left flank, and engaged the enemy, three times more powerful, in Chuan Yuan Miao. Comrade Pu-Shen personally led the



attack, beginning from 7 a.m. and ending at 4 p.m. The distance between our men and the enemy was only 100 meters. A stray bullet hit Comrade Pu-shen in the right forehead, and he sacrificed his life in great triumph.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 the Chinese Soviets, in order to remember Comrade Chao, issued an order to change the name of Ningtu into the Pushen District. Remember forever that Comrade Pu-shen died for the Soviet Government and for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workers and peasants. He died under the fire of imperialism and its lackey, the Kuomintang. Although Comrade Pu-shen is dead, his glorious sacrifice will forever remain engraved in the minds of millions of workers and peasants!"

The second photo is also a memorial plaque. It reads: "Worker and peasant masses of the whole world! Remember forever that this is all that remains of the blood of revolutionary martyrs! Chu Teh."

This inscription was written by Chu Teh. The first two lines are smeared with the blood mentioned in the inscription.

The top photo on the second page is a Red Army Martyrs Memorial Pavilion.

The last photo, of skulls, was given to Mr. Buchman by an official who stated: "These skulls are all victims of the Red terror in Kiangsi."

*

*

*

本刊發行人白克孟先生，為美國著名的攝影記者，旅華多年，關於近年來中國各種運動的史實，所攝頗多；此次本擬為本刊選文論『中國之生產合作運動』，因事冗而未果，乃將上印四幀舊照（此非白先生自攝，乃於一九三五年初，得之於寧都某官員者）交本刊登載；而今時勢雖異，然此等希罕與珍貴的照片，固不僅具有簡單之歷史價值已也——編者。

一九三九年八月十六日

馬克思給柯格爾曼的信

林超真譯

編者按：這些有名的書信，已譯為專集，不久將由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茲徵得譯者的同意，允許我們在動向上擇要先登，這是應該表示謝意的。

馬克思致柯格爾曼的信，共五十八封，自一八六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至一八七四年八月十日止。關於這些書信出版的經過及其意義，譯者在其序文中有簡要的說明，茲摘載如下：

「世人知道有這些信存在，是從一九〇二年柯格爾曼死後起的。他死前同守財虜一樣，藏着這些信，認為是「他一生最值得誇耀的東西」。死前三年，即一八九九年，他認識考茨基，曾拿這些信給考茨基看過，而且答應，他死後可以讓考茨基公佈出來。果然，一九〇二年三月初，德國社會民主黨的中央理論刊物新時代週報就公佈了關於巴黎公社的兩封信（第四十五號和第四十六號）；接着從四月至九月，其他的信也陸續在這個刊物上公佈出來了，但有幾封信當時沒有公佈，而公佈的又被考茨基刪節了好多段落。以後，法文（同一九〇二年）以及俄文（一九〇七年，且有列甯一篇序）的譯本也出版了，但都是從新時代譯出的，因此都不完全。直至世界大戰之後，考茨基才把餘信發表了。經過莫斯科

『馬克思恩格斯學院』之整理，以前刪節的也補起來了。完全的馬克思致柯格爾曼書信，外加介紹，註釋，索隱，和附錄，第一次是以俄文出版的，一年後才有法文譯本，以後又有德文本。這回中文本是從法文本轉譯出來的，不必要的介紹，註釋，索隱和附錄，譯者曾加以刪節，但書信本身則未刪改一字。

『凡是稍微知道一點革命理論發展的人，即使未曾讀過這幾封信，也一定曉得這幾封信在幾次馬克思主義大論爭中所佔的地位。最有名的，便是俄國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後，列甯就拿關於巴黎公社的信中馬克思底議論來打擊蒲列漢諾夫。敘述這幾次論爭，以及致柯格爾曼信在其中的作用，不是譯者在此地所必需做的；但應當做這樣的斷語，即說，隨着革命的發展，以後馬克思主義仍不斷有論爭出現，而這幾封信，仍將在其中發生作用。至於如何作用，則不能亦不必預言。這個譯本之出版，對此亦不無幫助吧？』

『考茨基隱匿了將近二十年再行公佈的諸信中，有一封是馬克思斥責拉薩爾以及所謂「現實政治」的（一八六五年二月二十三日），現在自然譯在這裏了。德國社會民主黨本是拉薩爾派和馬克思派合併而成，當初拉薩爾也是黨內一個

偶像不減于馬克思，考茨基就是爲顧全拉薩爾派感情而將此信隱匿起來的。這是不應當的事情……

『此外，我們在這幾封信中，還可以找到一些珍貴的見解，關於經濟學的，哲學的，當時大事的，工人運動史料的，尤其可貴的則是馬克思的私人生活，他的妻女，他的家計，他的交遊，以及他的情感。我們讀着，彷彿他是我們同時代的人，我們的朋友，時常和我們晤談的，并非全似讀共產黨宣言和資本論時所想像的那個嚴肅老頭子。這兩種想像相合，然後你有真正的馬克思，然後你真正瞭解得馬克思主義。』

本期選登的兩封信，是取其偏重於私生活方面的；雖然並沒有什麼理論上的價值；但由此人們却很可以看到這位卓絕千古的偉人的困頓情形，和他富於人情味的『浪漫故事』。以後，我們還將選載幾封具有偉大的理論價值的。

第七號

倫敦，一八六六年十月十三日，星期六。

親愛的朋友：

我須得立刻回答你，而你的信又是恰在郵件寄發以前寄到我的手（明天星期日郵局不收信），所以我要用幾句話告訴你：我那封被竊的信底大意。（這樣沒收信札當然是件令人不快的事；我絕無意讓俾斯麥先生知道我的私事，他若是要知道我對於他的政策的意見，他儘管直接問我好了，我一定把實話告訴他的。）

我的經濟狀況，由於我的久病以及因病而起的種種消費，竟惡劣到了這個田地，使得我在很近的將來就要遇到一種財政危機，這事除了直接影響於我和我的家庭之外，也要在政治方面陷害我的，特別是在這裏，倫敦，人們必須保持着『架子』。我要問你的，就是你認識的人中是否有一個或少數幾個（因爲這事情絕不可公開的），能夠借我一千塔勒爾，兩年內歸還，以五厘或六厘起息？我現在借的小款竟至於付二分利至五分利，但無論如何我再不能拖欠我的債主了，而這是嚇人的破產。

自從倒數第二信以來，我的病已發過幾次了，所以祇能斷斷續續地繼續我的理論研究（國際會方面的實際工作則仍在進行，而且很有可觀，因爲事實上整個團體都是我來領導的）。下個月我將寄第一部分稿子給邁斯涅爾書店，以後我將繼續寄去，直至我將餘稿親自送往漢堡的時候，那時我一定去看你。

我的地位（身體上和人事上的變動不容我空閒），使得第一卷先出版，而非如當初計劃的兩卷同時出版。此外，這著作多半要分做三卷的。

全部著作事實上區分爲如下諸部分：

第一冊——資本底生產過程

第二冊——資本底流通過程

第三冊——全部過程底諸種形式

第四冊——此理論底歷史研究

第一卷含着前二冊。

第二冊我打算作爲第二卷，第四冊作爲第三卷。

我認爲第一冊必須從頭說起的，即是說，必須將我以前在頓克書店出版的那本書大意概括爲一章專論商品和貨幣。我認爲這是必要的，不僅爲了首尾完備的緣故，而且因爲即使良好的頭腦也不會完全正確瞭解的，所以在第一次發表時，尤其在分析商品之中，難免含有些缺陷。譬如拉薩爾底資本和勞動似乎是發揮我的著作底『精意』的，他在那裏面犯了些大錯誤；他那樣不難爲情地抄襲我的著作，本來常鬧這種笑話的。尤其可笑的，那是看見他把我憑記憶而未去查考做出來的文獻上歷史上『錯誤』又如何抄襲了去。我正在考慮，是否將於導言內略提幾句說到他的『抄襲』。拉薩爾那些學舌者以那種無恥態度對我，就難怪我這樣做。

『英國工會倫敦局』（牠的秘書就是我們的主席奧德格）此時正在討論是否應宣布改爲『國際會英國支部』。如果宣布了，則在某種意見之下，此地的工人階級『政府』將落入我們手裏，而我們亦將能大大地推進運動了。

敬禮！

你的卡爾·馬克思

第十一號

倫敦，一八六七年六月十日。

親愛的朋友：

這封回信延至今日才寫，確足以引起你的疑心，應有的疑心，以爲我是一個壞蛋。求你原諒，我祇能對你說：『我住在倫敦不過幾天罷了。我到曼撒斯特去過，住在恩格斯家裏。但你

和你的夫人，你們現在深知我，不致將我的疏於通信之罪過看作一件常態的事情。然而我的夢魂天天都縈繞在你們身邊的，我在漢諾威逗留那幾日，可以說是我的沙漠生活當中一塊最美麗和最愜意的綠洲。

在漢堡，我沒有遭遇其他的故事，除了認識得威廉·馬爾先生，雖然我是十分謹慎的。他的態度很像一個改信了基督教的拉薩爾，但自然遠不如拉薩爾。我在漢堡那幾天，紐曼先生正在演戲。但漢諾威地方的朋友慣縱了我，以致沒有那些好朋友作伴，我就不願在漢堡觀戲，所以沒有看到紐先生底戲。再者邁斯涅爾書店答應出版你預備寫的醫學書，你儘管寄稿子給他好了，寄時提起我的介紹。至於詳細的條件，則你自己去同他商議。

從漢堡跨海至倫敦，一般說來是很順利的，除了第一日天氣稍微不好一點。未到前幾點鐘，有一位德國小姐，她的精神態度早引起我的注意了，她對我說：當晚就要從倫敦往海濱維士東城去，但她的行李不曉得如何處置才好。英國的休假日缺少搬運人夫，使得這事情更難辦理。我探問這位小姐應當在倫敦那個車站下車。她的朋友曾把站名寫在一張片子上。那是『西北站』，恰在我經過的路上。暫時做一個慇懃的騎士罷，我自告奮勇幫她料理行李，她答應了。但細想一下，我想起了海濱維士東城是在西南方的，而人家指點給這位小姐的又爲我所要經過的那個車站，則恰在西北方。我翻翻航海指南：確然不錯；我幫助她下車的地方，是在倫敦城中與我自己要去的地方剛剛相反。但我已經答應了，我祇好耐心忍受了。我們是下午二時到的。我把這位流浪的

小姐送到她的車站去，那裏打聽得須到晚上八點鐘才有車開，如此，我就被拴住了；我必須陪着『小姐』，在海德公園散散步，在飲冰室休息休息。此時我才知道她叫做伊利薩伯·豐·普特坎美，是俾斯麥底甥女，剛在柏林俾斯麥家裏住了幾個星期。她這一姓出了好多『勇敢的軍人』。這是一位有教育的活潑的少女，但自頂至踵充滿了貴族氣和『黑白』色彩。當她曉得她是落在一個『紅黨』手裏時，是頗為驚懼的。但我安慰她，而且保證她，我們的『會遇』絕不至發生流血情事。我看見她平平安安地乘車往她的目的地去了。你試想想：布令一派入以及其他的庸俗民主派，知道了這件事情將如何得意：我與俾斯麥相勾結呀！

今天我把第十四頁的校樣寄出去了。我在恩格斯家裏時收

到了好多的校樣，恩格斯很滿意這書，認為寫得很容易瞭解，除了第二大頁。他的判斷令我放心，因為我的著作一經印出來，起初都十分不滿我意的。

我把二女羅拉底照片寄給你的夫人，我時時刻刻要誠心感謝她的慇懃而親切的招待。其他的照片都沒有了，以後還須重印，恩格斯也重印了一張他的照片和一張伏爾夫底照片。你寄來的東西，使他很高興。

請代致意『小女士。』伊列奧諾爾上學去了，不然一定會寫信給她的。

現在再會！

你的卡爾·馬克思

一個巧妙的比喻

裕森

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主任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馬洛來 (W. H. Mallory) 在紐約外交雜誌上撰文論述兩年來的日本侵華戰爭，其中有一個巧妙的比喻：

『日本軍隊好像是游泳池裏的游泳者。他們能遂心所欲地游到池子的任何地方，但他們可並不能占領這些地方。當他們游在某一點的時候，水就從四下裏包圍着他們，雖然沒有多大的抵抗；當他們移動的時候，水馬上就急沖過來，填滿了他們剛才站定的地方。但是要離開中國，可沒有像爬出游泳池那樣地容易。』

游泳者力竭之時，大概除了沉溺之外是沒有其他辦法的了。

囚徒們的旅行

君 衡

工場當中的消息最多，悄悄透露進來的緊張的戰事空氣，祕密地興奮地激動起每一個囚徒的心，他們對於眼前不斷受着的侮辱，都感到夷然不以為意了，他們都覺得前途已有了眩人的希望，只要時機一到……

印刷工場裏作工的囚徒，刑期都在五年以上，盜犯政治犯各占了一半，監獄裏怕的就是政治犯，他們有一種神祕的活動使監獄當局感到頭痛麻煩，他們並不歡迎政治犯做工，可是印刷工場是少不了政治犯的。

這兩種不同的社會成份還能夠融洽，政治犯教盜犯識字，替他們排解為了一個香烟屁股的糾紛，和在向看守主任反抗時，作他們的策劃和領導人。

政治犯忙着傳遞消息到別的監房去，忙着對於戰事作分析，估計；討論國際形勢，和國內政治的可能的變動，他們顯然沒有盜犯們那樣天真，以為自己容易走得出一座監獄的門。

盜犯們再也不能沉靜了，一看見看守轉過了背，便擠眉弄眼的互相打暗號，小三子的身子挺強壯，他在十六年打過上海的警察局，親手釋放過警察局看守所裏的犯人的，現在他一回到監房，便興高采烈，他說這一次『生路』來時，他要先把看守鬍鬚頭做掉了再跑。

『你腳上的鐐呢？』L見他高興得忘了形，提醒他說。

他不聲不響地舉起兩腳，攔在舖沿上，擰了擰鐐的斤兩，向上勒了勒，勒到小腿肚，便勒不上了，再檢看一下兩隻釘梢，鐵鐵實實，搖了搖，動也不動的。他沉吟了，可是接着又自己寬慰地說：『不要緊的，找塊石頭這樣一捫……』他兩手裝着拿起了石頭，向鐐背面捫下去的樣子，『咄，那面的釘便爆開了，我把鐐掛在腰上，走到冷地方再弄那一隻。』

『小三子，別忘了我們一起跑。』鬍子阿六熱切地說。

『我小三子不作興賣朋友，有生路了，他媽的大家走！』

看守的威風已沒有了，笑語聲漸漸響亮了起來，鬍鬚頭裝不聽見。

『今天不上工麼？』第二天早晨，過了七點鐘，還沒有來開門，大家有些像熱鍋上的螞蟻，走不是，坐也不是了。生活一走出日常的規道，便容易使人焦燥的，焦燥中混和着期待，希望，憂慮，惶惑，『生路』『？』『？。』

紛紛揣測了一會，小三子們擁到角落上馬桶跟頭抽香烟屁股去了，政治犯L拿起了書，可是看不下去，工場停工，消息斷了來源，生活便顯得窒息人。九一八時候，他的官司還沒有判定。他知道歷史正在加速進行，血的序幕揭開了，新的『百年戰爭』要

間歇地繼續下去的，繼續到新的時代來臨。

沉在獄裏的心是不睡覺的，六年的刑期，這似乎太長了，但誰知道呢，法官下判決的時候，總以為這個世界是不變的。

夜裏，在一室『難友』的呼呼的鼾聲中，祇有他和小三子聽得漆黑的天空中有飛機在飛，飛的高度很高，但辨得出那是排隊飛行。

小三子仰頭向L打了個招呼，有意義地微笑了一下，狡猾而勇敢的眼睛中，透露出他的心事：鏢，衝出去，做掉鬍鬚頭，『生路！』

L在繫念他的妻，在這緊急的時候，接見是不可能的了。以後呢？誰知道事情會怎樣演變，運命支配他，還是他支配運命？

第二天，飯開得很晏，打開鐵鏽的罐頭一看，不是夾有一半稗草石子的黃米飯，却是雪白的糯米飯，大家開心起來了，『媽媽的，今天過年，監獄長請我們吃好飯。』L說，這是囚糧起恐慌了，這句話點醒了大家，大家更是手舞足蹈起來，『我×他的姐，養不起老子，早些放了老子豈不省事。』小山東怨憤地說。

『別想吧，××人打到門口，看守跑完了，也不會放你的。』小三子有把握地說。

『一，二，三，四，五，……』窗外走廊上在報數，小三子迅捷地探頭向外一探，意外驚喜地低下身子來：

『看，看，偷飯鬼都開釋了。』

七八個人縮頭縮腦的都爭着向窗外望，一壁又怕窗外的看守看見。

窗外真的在釋放人犯：小偷，老槍，打架的，刑期六個月以下的，都在開釋了。

『監獄長開開恩，把我們都釋放了好呢，放我們去打××人。』有誰喃喃地說。

『打××人，我第一個去，偷飯鬼放完了便輪到我們了！』小三子很是起勁。

『吵什麼！』門上小洞口外面突然來了聲大喝，那是看守鬍鬚，他的聲口已沒有平時那股子兇勁，但大家在積威之下，立刻沉默了，鬍鬚頭輪着眼望了望，走了。小三子扮了個鬼臉。

『轟……隆隆！』這一夜，砲聲響起來了，先是斷續的，後來竟是連續的，一下一下的靜靜數着，大家屏息着氣，他們悄悄地對看着，無助的，無力的，四週的牆壁都壓迫過來了，這鏢，這門，這鐵的大鎖，顯得比平常特別結實，顯得對犯人們有深仇似的。怎麼辦呢？小三子也像失了主意。

第二天，亂嚷嚷中過了一天，砲聲給人聲掩住了，不大聽得出來，只偶然在順風的時候，一聲二聲的響着，大家聽了一晚，這時也不感覺新奇了。夜了，大家又無可奈何的安排着睡覺。突然，隔壁一號的門打開了，沉重的鐵鎖，厚實的門，激起長弄堂很大的回聲，也激起幾百個囚徒期待運命的不安的心。

『566，掉號子！』是吳看守長的聲音，他是專管掉號的。

566是政治犯。L的心緊張起來了，根據過去的經驗，深夜掉號子是兇多吉少的。

『789，掉號子！』

189 住在九號，也是政治犯。

『1078，』『96，』『54，』……門不斷地開，闔，吳看守長不斷地威喝着喊番號，看守推波助瀾地催促着：『快！快！』調走的都是政治犯，蹣跚的鐐聲走過L住着的號子的門，狼狽地，倉皇地，兩手抱着鋪蓋，抱着書籍。

L迅速地收拾起來，先把祕密的信件，鉛筆頭，紙片，刀片，胡亂塞進被絮裏面，然後把筷子，書，衣衫，被頭，打成一包。

L也調走了，臨走和小三子們點了點頭，他們眼睜睜地望着，緊張中的感情像有些麻木。

L走進了甲字監，那是一條最清潔的監房，監禁的多半是政治犯，管理也特別嚴格的。

『L！』『L！』認識的熟人都在那裏了，從好多洞口向着他招呼。L忽促地走着，兩手抱着的被包，不斷的要溜下地去，腳上的鐐一步一步的絆着腿。他來不及向招呼他的朋友回看，那裏大聲的叫，大聲的笑，熱鬧得和節日一樣，什麼秩序都沒有了。

進了監房，已經有五個政治犯和一個盜犯先在了，他們已得了消息，明天一早解杭州。

當夜釘好了鐐，兩個人品一副的，一個右脚，一個左脚。喧嚷笑號了一夜。

天剛亮，十人一批的出去排隊，再兩個人一副的拷上了手拷，再十人一串的練上了練條。

六百多人連成了六七十串。

雪後的晴天！太陽的明亮對於頓久了幽暗的監房的囚犯，是太眩眼了，幾個人暈倒了。

囚犯們釘住在地上不走，四面八方發出了呼聲：『發錢，發給我們存在保管處的錢！』

這是一盤混賬，囚犯們從來不知道自己存在科裏的錢有多少，也從不知道開賬買來的鹹羅卜乾是什麼價錢，只約略知道自己從外面寄來的，和做工做來的錢，很快就沒有了，打報告查問是從不答覆的。

監獄長親自出馬了，他大聲疾呼：『難友們，我們爲了你們的安全，送你們到杭州去，錢一個不會少的，到了杭州一定發給，現在來不及準備，請大家原諒！』

『誰是你的難友？鐐，手拷，鐵練，你都替我們準備得好好，偏偏我們的錢沒有準備。』做過律師的C冷冷地一字字準確的說。

『對啊，對啊，』四面哄應了起來，『不給錢不走！』

『諸位同胞，我們大家都是中國人，現在××人和我們打起來了，頓在上海危險，我們送你們上安全的地方去。至於錢，監獄長欠你們的，自然得給，不過現在時候不早了，大家走路要緊。』司令部派來監送的副官莫名其妙的演說了一陣。

『什麼大家中國人，××鬼上面打，你們下面打，頓在上海危險，你們爲什麼不釋放我們？』

又是一陣亂吼：『發錢，發錢！』

錢是發不出來的，錢明明給吸血的監獄當局挪用了，頭上遠遠有飛機在飛，聚集在這裏的六百多人是一個很大的目標，大眾給飛機嚇住了，前面的『部隊』便動起來了。

泥濘的殘雪還留在冰凍的田野上，可是尖厲的風裏已很有春意了，出了監獄的門，大家便唱起歌來，國際歌，少年先鋒歌，儘着喉嚨唱，喉嚨得到了解放。監視的軍隊，保衛團，看守都不來管這些，政治犯紛紛把預備好了的祕密信，托保衛團丟進郵筒，他們都同情地幫忙。

西北角砲聲響着，遠遠地地平線像在發吼。

裝上了牛車，天黑時分到了杭州，車站全部戒嚴，一天沒吃，一夜沒睡的囚犯都迤邐下了車，女犯打頭，大家不知道到那裏去，上了道，似乎整個杭州都闖起來了，路的兩邊打了道人牆，五步有一個警察，十步有一個兵護送着。政治犯又唱起歌來了，有幾個盜犯也附和着唱，一路上的歌聲沒有歇過，六百人的長列組成了一個很好的示威遊行。有的乘機和兵丁搭話起來，浙江的兵都是質樸的溫台一帶的農民，他們把知道的一些政治消息都盡量地告訴了出來，警察便不同了，問他們老是不聲不響的。

這時，兵士已告訴了他們要到××寺才有得歇宿，路有十多里，老是走不完的。

支持不住的，都沿途倒了下來，倒了的解開了練子，把病的和不病的一起裝上了黃包車，因為手拷和鐐都是兩個人品着一副的。

他是浙江人，可是沒有到過杭州，他走乏了，也唱累了，他踉蹌着，但他努力支持，頭上的下弦月彎成了一道圓曲線，襯着暗青色的天，這清華的春夜，在招引着他，他享受着，呼吸着，陶醉着，一個人在月夜遊行，這已是青年期的過去的夢了，但在這難得的奇特的機會裏，他不忍放過這一點對於月夜的愛好！

朦朧中他看不清杭州的人，但那總是一樣的，這裏面有的是窮人，有的是富人。至於杭州的湖光水色，他很惋惜沒有看得清楚。

××寺是一座很大的寺院，這時已打掃了一所偏殿給六百多人住宿，空洞洞的什麼都沒有，除掉冷的石板，合抱的紅柱子，和頭上飄忽飛着的蝙蝠。大家累了，但是看守還不給開鎖鍊，沒有法子坐下來。

在憤怒的抗議聲中，鍊子手拷終於鬆掉了，可是兩個人仍品着一副鍊，坐的時候一道坐，走的時候一道走，撒尿撒屎一道撒。

杭州模範監獄裏的『同道』們來盡『地主之誼』，輕輕的鐵鍊鎖着兩個人，一前一後的抬來了開水，大家忍不住笑了出來，原來杭州監獄中的『同道』頭上是留着一撮毛的，據說這是古之遺制，究竟上海『文明』多了，這一撮毛是帶着不少故意的侮辱性的。

突然，從一隻角落裏有人怪叫了起來，原來拐子馬似的連着的兩個人當中，有一個人死去了，活人駭急了，他要求開鍊，鍊還是不開，活人就這樣給死人帶住了，一步不移的陪伴了一

宵。

天天與死爲鄰的人，對於死是沒有多大觀念的，但本能的對於死的厭惡還是有的，那一隻角落沒有人跑過去了，模糊中只見一個橫的一個直的輪廓，顯得陰森怕人。

人是容易適應環境的，大家胡亂過了幾天，也就安之若素起來。尤其是給不同的刑期不同的監房隔絕了的朋友們，又聚集在一起了，這是無上的幸福。共同信念與共同遭遇密切地把他們連繫着，『同志』這兩個字是一種特殊的字，牠有特殊的連繫，特殊的內容，特殊的感情。

政治犯的活動是沒有時間休止的，『學術講演』的小組成立了起來，意見的鬥爭開展了起來，六百多人的大冶爐當中，有醉素在蔓生滋長地發酵了。

歐陽的病一天天的沉重，他是未決犯，在水上警察廳當一名小小的書記，給人告了密，夫妻倆都吃了官司，八個月沒有定讞，他的妻到了杭州移送到了女監，還不知道他在病哩！

十天過後，已沒有人的形像了，骨出，僵僵，不住呻喚，可是沒有醫生，沒有藥。

『媽的，漕河涇還有大鍋藥喝，這裏大鍋藥也喝不到了。』原來漕河涇的病監不論犯人患的什麼病，都給吃一種藥的——略帶着苦味的湯藥，在一定的時候，每人給舀一瓢。

『哇哇』，歐陽在地上爬着打轉，屎尿都撒了出來，他已不會說話了，只是『哇哇』的叫着，四圍的人慘慘地看着他。L正走向角落去小便，看見他伸着手，像在向人求援，L想拉他起

來，也許他是在要大小便了，但兩隻手一接觸，L感覺得一陣滑膩，他趕快縮回手，這是在出『油汗』了，這好像是生命絞成的原質，從最後的臨終的軀體上面掙扎擠壓出來似的。

『L，他不懂得什麼了，你拉他沒有用的。』坐在一旁的誰說。

L仔細看了看他，知道他的神智已經不清，『哇哇』的叫喊只是由傷痛凝成的無意義的叫喊。

過了一夜，歐陽死了，在這樣一種慘酷的死的前面，人人覺得自己渺小起來。

淞滬協定快簽訂了，囚犯們又由水路載送到了蘇州，磨折疲困了的身子，羔羊般的順從地上了特租的三隻內河輪船，小三子們知道『生路』沒有來，L們知道在雙重壓迫下，他們還要抱着勇敢的忍耐力，爲未來，爲真正的鬥爭，去受監獄生活的鍛鍊。

一羣醜態的，頭髮鬍子留得長長的囚徒，踉蹌地塞滿了蘇州監獄的門庭，階沿上站滿了穿西裝，穿綢袍，養得肥肥的獄官獄吏，不動情地望着他們的俘虜，他們的掌中物。其中一個摩登的，露着雪白兩隻手臂，聳起了一對大奶奶的『小姐』，拿着一條紅色的小手絹，掩住了鼻子，在囚犯們打從她面前經過的時候，嬌聲細氣厭惡地罵了聲：『癩~~~~三！』

春天是過去了，犯人不大容易覺得到春天，接着來的是漫漫長夏，在那無聊的困倦的不變的生活中，要找些輕鬆的趣味燥燥脾胃，L總是用條手帕捏住了鼻子，半幽默半含仇地學着：

『癩~~~~三！』

俄國革命軼史

維多·綏奇著
林伊文譯

編者按：維多·綏奇是一位有名的比利

時作家，但自一九一七年以來就參加了俄國革命。本書是以文學的筆調，忠實地敘述着

這次人類有史以來最偉大的事件。讀者諸

君，幸勿以稗官野史目之。本文係譯自一九

三七年一月之法文雜誌·Crapouillot

一九一七年三月，或沒有頭腦的革命

俄羅斯革命底第一時期，現在我覺得，是受

列寧及其夥伴們底公平正直支配着的。就爲這個

原故，我們才四面八方從世界各地奔赴這個革

命。一九一七年初，我們在西班牙和幾個戰士討

論俄國革命的問題，這些戰士那時已經計劃佔領

巴塞倫那，並在那裏組織一個新公社了，這年七

月某日，我們會把這公社底綱領張貼出來。撒爾

瓦多·塞季，他是『全國勞工總會』創立人之

一，二年後給人暗殺了，我會把他寫進我的小說

我們的力量之誕生裏去，寫得盡可能地像他，

——他詢問我關於布爾塞維克主義，那時布爾塞維

克主義同時惹起世人最大的憂慮和最大的希望。

我們那時都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但我們從那遠遠傳來的輾轉失真的列寧言論中已經辨別出一種希有的直率了。

『布爾塞維克主義，』我說，『就是言行相

一致。列寧底可貴之處，一句話說來，就是要實

現他的政綱……土地給農民，工廠給工人，政權

給勞動的人。這幾點，人們是時常談說的，但從

未想過由理論進於實行。列寧似乎正在實行！

……』

『那些無信仰心的奸狡的社會主義者，』塞

季反駁我的話說，『能實行他們的政綱麼？這是

自古以來未曾見過的……』

我解釋說，這是在俄國見到的。除非是

新舊大陸輿論界底無知和昏憤，才會設想俄國革

命能停止於不澈底的民主政治；實際上，一種嚴

重的貧困，加上一種嚴重的壓迫，已經將一切根

本問題：土地，和平，政權，——提出於俄國人

民之前了。一種不得不然的邏輯，推動千萬人行

動起來；但爲甚麼目的，用甚麼手段，他們却需

要一個明白的意識。他們自己能明白麼？問題就

在這裏。羣衆並非每在緊張關頭都會得到幾個

人，能毫無錯誤地表出他們的利益，他們的志願

和那埋藏在他們內部的力量。有教養的階級，即

有產階級，是有充足的代表人的，有充足的自覺

的領導者和良好的僕役的；必要時也不遲疑向下

層人民中選取這類人材……貧窮的階級則是缺乏

人材的，這也是貧窮階級命運底悲慘因素之一。

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力量薄弱，內部分裂，暗

中摸索着而奮鬥，而當時惟一的頭腦，也許能够

爲公社派指示道路的，却坐在托羅要塞地牢內冥

想着，一籌莫展——布蘭基。德國底工人階級，

一九三二年，倘若有個盧森堡底堅強理智和一個

李卜克內西底革命熱情，我們能看見他讓社會民

主黨帶着一步退一步，讓共產黨帶着耍無聊的把

戲，而終於不經一戰即投降於新起的國社黨之前

麼？

有這樣一個時候，民衆祇需要一個人和幾個

人……我說：一個和幾個，因爲這一個人將是等

於零的，倘若沒有若干行動的夥伴扶助他，他們

信仰他，他也信任他們。這就叫做黨。一個黨，

一個意識，一個意志，——歷史就做成功了。

(註一)但社會若沒有這些結晶的原素，則什麼都做不成功的，改革要流產的，人們要長久在無出路的圈子內旋轉，好多的血都是白流的。一八四八年，全歐洲的革命都流產了。距今不久，還發生所謂蜂蟻式的『神秘』(借用一個時髦的然而空洞的名詞)：這裏是計劃底神秘，那裏是領袖和暴力行動底神秘。計劃始終是計劃，而領袖收縮了，暴力行動變成了咖啡店吵架……

俄羅斯革命初期，就其內部需要說，是龐大的；就其畏首畏尾，吞吞吐吐說，又是淒慘可憐的。彼得格勒紗廠工人罷工不到一個星期就把專制政體推翻了，但在罷工正要開始那一天，布爾塞維克黨首都某區委員會反對罷工。軍隊倒戈參加暴動，因之帝國終於崩潰，但在軍隊倒戈前一日，那個委員會又在憂懼不安，考慮應否勸工人們復工……各黨派的革命分子，一生都花在準備革命上頭，此時却不明白革命就在眼前，開始了，走向勝利去了。他們在羣衆中活動，隨着各時各刻的靈感。已經沒有了帝國，沒有了政府，沒有了皇帝。七十多歲的內務大臣，顫動着嘴巴，到陶里德宮走廊內，拉着他認識的一個社會黨人底袖子。

『先生，你要甚麼？』

『是我，普洛托普普夫，……我請你叫人把我

我拘留起來……』

那時資產階級，就政治意義說，也已經等於零了；在俄國，資產階級本就沒有幾個人，而且由於牠的傳統，牠是與國家大事距離很遠的。在這時候，在二月間(俄國舊曆二月，即西方曆書三月)，第一個工兵會議中，即在國會側廳倉卒組成的第一個蘇維埃中，倘若有個列寧，有個托洛茨基，有個明見的精神，加上大動亂時代應有的非常的大膽，能看出當時真實的局勢，由此推出相應的方略，那麼俄羅斯就可以省去一次革命了。一切都是由蘇維埃政權開始的。那時沒有其他的政權。十五萬武裝的人，全部衛戍軍，以及半百萬以上的工人，除了聽自己的代表會議底話以外，不肯聽其他的命令……不過，爲他們做代言人的，祇有三大黨底社會主義者：社會革命黨(事實上寧可稱爲社會急進黨)，社會民主黨孟雪維克派和社會民主黨布爾塞維克派，——三者都是穩健的，換一句話說，都是怯懦的，都不能在精神上操縱事變。

時機雖然嚴重，但政權底競奪好像在演滑稽戲。所有這些社會主義者所繫心的，祇有一件事：即如何把政權推讓出去。自由派資產階級底最伶俐的政治家，米留可夫，二月二十七日下午二時，當一切都已成熟，舊制度之崩潰已成不可救藥的時候，還認爲要組織臨時政府『現在還嫌

太早』，因爲人們不知道事情能變成什麼樣子。等着罷，打聽一下罷。資產階級便如此在動亂之前推讓政權了。三月一日，蘇維埃執行委員會已經成立，邀請米留可夫來組織一個政府，甚至不要他接受什麼政綱。那些社會主義者祇要能把政權推讓出去就好了，所以僅僅保留一個宣傳自由權，——不錯，在俄國和西伯利亞，這確是一件前所未有的東西……

『可以做民衆和時代底好模範的慷慨行爲：那些社會主義者手裏拿着全部政權，別人能否自由宣傳須完全依靠他們定奪的，然而他們反把政權拱手讓給「階級敵人」，只以敵人允許他們自由宣傳做交換條件！羅章果不敢到電報局去，他對赤赫宰和蘇罕諾夫說：「你們有政權在手，你們可以把我們全體都逮捕起來！」赤赫宰和蘇罕諾夫(註二)回答他說：「把政權拿去罷，但不

(註一)嚴格說起來，總工會也有這個作用，同盟，陣綫，或聯合，亦然。雖然成分不勻一是其薄弱的一個原因。實比名是應當更受重視的。西班牙的『伊伯利安無政府主義同盟』從來不肯稱爲一個政黨，但實實在在是一個政黨。

(註二)羅章果是穩健的自由派資產階級一個領袖；赤赫宰和蘇罕諾夫是穩健的社會主義者，蘇維埃執行委員會委員。

要爲了宣傳而逮捕我們……」蘇罕諾夫還害怕資產階級爲了這些條件不肯接受政權，於是他提出一個含恐嚇的哀的美敦書：「那些激烈分子，惟有我壓制得住……現在祇有一條出路，就是你們接受我們的條件……」換一句話說：你們接受一個綱領罷，這綱領也是我們的。我們則替你們管束那交付政權給我們的羣衆。——這些可憐的馴服天行者！」（註三）

那些自由派受了這個溫和的壓迫，就讓步了，組織了臨時政府。他們還希望將政權推讓給君主政制，祇以施行憲政爲條件。他們企圖救護皇朝。真是貶價無人要的政權！尼古拉第二讓給彌雪爾大公，大公讓給一個遙遠無期的立憲會議……

革命有了頭腦

俄羅斯革命就是這樣成就的：初時好像沒有一個人幫助牠。從此可以得到一個大教訓，卽是：這類事變是不能人工催促而成的。惟有盲目的人，才會設想，當歷史的必然性正在進行之時，人們能够贊成或反對的。那些知道辨認事變底要領的人，此時所能做的，就只有替事變服務，爲的從中獲取最大的利益；他們愈能够與事實底不得然的進程同流，而從中發現進程底規律，則所實行的也就愈多。惟有這些人才是革命

者，不管平時的性格如何，也許是和平的書生，天天躲在圖書館裏的。到了那時可以看見他離開圖書館，搬移石頭堆在街道障礙物上面，或者貢獻意見給區委員會……

列寧未回到俄國之前，革命是停滯不進的。一九一七年是世界大戰的第四年。一千日以來，歐洲所有大國，國內壯丁都穿起了軍服。整個大陸青年人底精華，一個輩代的青年人，都被殲滅殆盡了。三千萬人動員相殺。這是大砲呈威風的時期。

「火線貫串了整個歐洲，從北海到亞德里亞海，從波羅的海到地中海。這是鮮血淋漓的戰線，每天都要死幾千幾萬的戰鬥員。壕溝底戰爭，地雷，坦克車，飛機，毒氣，潛水艇底戰爭，使人厭氣的謠言誑語底戰爭。在前方，兵士死在本國底軍法和敵國底砲火之間；在後方，人們拿兵士的流血來做買賣，來做無聊的宣傳。

「一九一七年，在法國，是克列蒙梭主義之年，是尼衛爾將軍之年，是四月十六日總攻擊，打通「達姆大道」之年。弗蘭德和凡爾登兩地無效果的會戰，砍下來地方坦克車大戰。塞爾維亞，法蘭西北部，比利時，波蘭，完全成了墳墓。德國向英國宣布無限制的潛艇戰爭……商船被炸沉，中立國人民被覆沒。海裏充塞了死人。

「人們在馬其頓作戰，在美索不達米亞作

戰，在巴勒斯坦作戰，在滿生荆棘的非洲偏僻地作戰。美國參加戰爭。黑人底軍隊，印度人，澳大利亞人，坎拿大人，葡萄牙人底軍隊：各種各族底血流做一潭，發爲一種惡臭。美國人將交戰國餘剩的金子攜去了。

「意大利前綫破裂，加普雷托，德奧聯軍進佔皮亞甫，齊伯林轟炸倫敦，哥達轟炸巴黎，哥達轟炸威尼斯，法國飛機轟炸司徒嘉德。閱兵，給獎。

「在雙方底後方，大砲和軍火製造家大發其財；戒嚴，出版檢查，老人和婦女底憂慮，重大貧困，過度豪華，麵包券，煤炭券，一切人類生活都受愚蠢和仇恨所支配。英國迫害那些有良心的抗議者，法國迫害那些失敗主義者，到處迫害國際主義者。教會，政黨，知識分子，無論在歐帝國方面，或者協約國方面，都宣傳澈底戰爭；主戰派社會主義加入了神聖聯盟……

「所有的技術都用來毀滅人類底活力和文明底成績。那些在火藥中耗費的財富，若是以合理

（註三）托洛茨基——《俄國革命史》，法文版第一卷第二百五十一頁。蘇罕諾夫底回憶錄，關於此次交涉有詳細的記載。蘇罕諾夫本人，一九三一年在莫斯科被判十年徒刑，因爲他組織了一個社會主義派。

方法使用起來，借用烏托邦派底話說：是充足
够使改造過的社會中人人都能快樂生活的……

『這就是資本帝國主義間瓜分世界大戰之第
四年狀況……』（註一）

第一個帝國場台底響聲，在這個黑暗年頭，
宛如晴天霹靂，蓋過了大砲底聲音。俄羅斯民衆
要求：和平給一切人，土地給農民，工廠給工
人。全國民衆都有武裝，因為戰爭發槍給他們。
俄國人死在戰場上的，比其他各國都多，也比其
他各國更受壓迫，更加貧困。那麼他們甚麼事都
做得出來的。他們曉得要做甚麼事麼？曉得能做
甚麼事麼？

一九一七年四月三日，列寧在彼得格勒底芬
蘭車站下車。同他一路，還有季諾維埃夫及其他
的人。尼古拉·列寧，本名佛拉底彌·依里奇·
烏梁諾夫，差不多是一個無人不認識的人。他這
年四十七歲，但已經做了三十年革命活動。少年
時，就有一個絞刑底黑影遮掩在他的生命之上：
亞歷山大第三底劊子手絞死了他的哥哥。二十三
歲時，他在聖彼得堡（一八九三年）成立一個組
織，俄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團體之一。他在西比
利亞充軍好幾年。一九〇三年，他在俄國工人運
動領袖中露出了頭角，被人視為苛刻的學理家
（由於創辦火花報和分裂俄國社會民主黨爲布
爾塞維克即革命的多數和孟雪維克即機會主義的

少數派）。亡命在倫敦，巴黎，瑞士，芬蘭，克
拉哥維，他始終不停止不間斷地工作；黨外沒
有多少人認識他，他做他的驕傲地自承的『職
業』：無產階級底理論家，宣傳家和組織家，總
而言之，革命家的職業。他的不可屈撓的黨，以
一種無限制的信任心圍繞着他；這黨，寧可說是
他組織的，他煅煉的，社會主義國際中人愛稱這
黨的人做『熱昏派』。在一次革命中，（一九〇
五年），他曾靈活地指揮過這個黨。人們討論
他，討論他的關於唯物論哲學和關於經濟學的著
作：這是一位學者。社會黨國際大會底記錄提到
過他的活動；那些新聞記者却沒有注意到他。一
九〇七年在司徒加德開大會時，他擁護羅莎·盧
森堡，但好多人很注目赫爾衛，却沒有人看見列
寧。但一九一四年八月，在最可恥的背叛風潮之
中，社會主義，工團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底名流，
大多數都突然轉變去擁護戰爭了，大家都以爲工
人運動完結了，因爲附和發昏的愛國主義去了，
此時惟有列寧確信未來屬於我們，開始一磚一石
地立下第三國際的基礎。在齊默瓦爾會議時（一
九一五年），一些國際主義者不禁驚駭起來，聽
到他平心靜氣地談論革命。

這個人，在這個大戰年頭，踏穩脚步，從他
在楚里黑的亡命寓所走出來，要去拿着一種明朗
的意識和一種堅強的魄力來指導近代第一個社會

革命。六個月之後，他要成爲『最受全球仇恨，
又最受全球敬愛的人。』

在這文明暗淡之中，他帶給無產階級一個新
的生活觀：就是要戰勝。

他說：『戰爭的目的，就是受財政寡頭統治
的諸大強國要重行分配世界。』

他說：『要轉變帝國主義戰爭爲國內戰爭。』
他說：『要組織一個新的社會主義國際，亦
即是革命行動的國際。』

他看得很清楚可能做的限度；但這個可能
性，他是要盡量利用的。他不宜告在俄國實行社
會主義，而祇說要爲農民利益沒收大地主土地，
要工人監督工廠，要一種勞動者民主專政，工人
階級在其中佔有領導權。

他剛走下火車，就問他的同黨同志說：

『爲什麼不奪取政權呢？』

立刻，他就在他的『四月大綱』上寫下了奪
取政權的綱領。人家說他瘋了，人家罵他發昏。
他狡猾地微笑着，坐在在皇帝某外婦邸宅內一張
漂亮的寫字台前面，仍舊寫他的。那些老資格
的戰士責罵他，真理報攻擊他，但人們意外地發
現，原來街道，工廠和營房裏的人傾耳聽他的

（註一）維多綏奇——列寧，一九一七年，第三
頁及第四頁

話。——一點不錯！他的整個天才就是在於知道說出這些人心裏要說但自己不曉得說的話，以前沒有一個政客，沒有一個革命者知道替他們說這些話。

在三個星期之內，無需什麼鬥爭，黨內大多數已經擁護他了。再沒有什麼同穩健派攜手來穩定一個代議制共和國的問題了。

『黨要一個更民主的工農共和國，在這政制下，警察和常備軍將被廢除，而代之以人民武裝。』（註二）

『黨要人民自主』，即是說：官吏由人民選舉和罷免，立法權和行政權同操於工兵代表會議（蘇維埃）之手，『各民族都有權利組成自治的國家』，『銀行，托辣斯，嘉狄爾收歸國有』，『沒收土地隨即交付於組成蘇維埃的農民』，——一種普遍的和平，這應當是『勞動者爲對抗一切資本案而作的一種和平』。

這政綱裏面，沒有一點是不可實行的；此時不實行這個政綱，反而是困難的和危險的。但要成功這個，就必需用武力，必需大胆，必需打破思想惰性，必需同利害關係決裂。好多人依賴戰爭爲生活的，而且俄國受牠的同盟國所束縛。有產階級害怕喪失一切，將要自衛的；他們的力量無論如何薄弱，仍會有驚人的動作。必須接受這個鬥爭。在這革命時代，列寧有了革命的勇氣和

革命的智慧。

革命的第二個頭腦

當一種觀念存在於一時代底空氣中時，即是說，當使此觀念誕生和生存的普遍條件已經實現，此時代的人就開始預感到牠，所以牠常常同時出現於幾個人思想之內。一時代底真理就是如此出現的。在科學上如此，在政治上也是如此，——從某幾方面說，政治也是一種科學，同時又是一種藝術。達爾文和華拉斯差不多是同時發現物競天擇公律的，新興的資本主義社會本就供給他們以這公律底最好典型。米爾和邁耶爾差不多同時發現能不滅律。馬克思和恩格斯同時得到關於近代社會基礎的同樣結論，他們二人以二十五年長久可欽佩的智力合作，建立下科學的社會主義。俄羅斯革命就要在行動中（但是受很堅強的思想滋養起來的一種行動）實現一種同樣驚人的合作：列寧和托洛茨基的合作。

托洛茨基，一九一七年被法國驅逐出國（一種挑唆底結果，命令是馬爾微簽字，朱爾·格德是當時的總長），又被西班牙認爲不穩分子而驅逐出國，祇好走到紐約，在那裏活動了一個時候；然後往坎拿大，爲的回俄國去。他連同他的妻和他的孩子們，被關閉在一個集中營裏，終於因彼得格勒蘇維埃的要求，才得恢復自由。他是

五月五日回到俄國首都，他上岸時第一次演說，就是主張奪取政權。他的演說家，政治家和組織家的才能，從此時起，時常使他蓋過列寧之上；列寧初見是不如他動人的。列寧是個和悅可親的人，不愛出風頭，外貌是平凡的；他同平常人在一處，並不引起人注意；他說話是非常簡單的；吸引聽衆的，並不是他的詞句，而是他的論據。他寫文章絕不留心形式，祇將他要說的話寫出就完了，絕不添加些甚麼。他的一生從來未曾對文學女神讓過步。托洛茨基，則無論到甚麼地方都觸人眼目。他的頭髮他的頭部姿勢，他的藍灰色的強烈眼光，不知含有一種甚麼威嚴的和吸引人的東西。在演說台上，他的語音常帶點金屬之聲，他的話一句一句地像槍彈一樣直射出來。他要變成這個革命的最超越的演說家。他的文筆更含有一種妥實的藝術。但最重要的，還是在這個時刻恰是他的一生所等待的，所預見的所祈求的。在社會民主黨中，他是斷革命論的理論家，即他確信：一個革命，在未會完成其工作以前，是不能也不肯止息的，因此是一個國際的革命。

他懂得多國語言，熟悉世界情事，這是俄國

（註二）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黨

會議中，列寧關於政綱的演講。

革命家中最西歐化的。然而列寧有一點無可否認地勝過他：列寧有一個黨，這黨從一九〇三年以來有了十四年鬥爭和艱苦工作底歷史了。我們剛才看見，列寧回國以後，這黨改變了精神和政綱：可以說牠走到了好久以來托洛茨基所懷抱的觀念。但托洛茨基和他的朋友加入了這個黨。當時的文書，一連好多年，都是將二個人底名字合在一起說的；這二個人其實祇有一個思想和一個行動，就是傳達幾百萬人民底思想和行動。這是革命的二顆頭，民衆的愛戴和敵人的仇恨都是集中在他們身上。高爾基每天在他的新生活報上攻擊這二個可痛恨的搗亂分子：

『列寧，托洛茨基和他的黨徒，已經吞下政權毒素了；他們對於言論自由，對於個人或對於全體權利所持的可恥態度，可爲明證，民主運動就是爲這些權利而奮鬥的……』

『列寧和他的黨徒，自以爲什麼罪惡都可以做的……』

『列寧並非一個萬能的法師，而是一個無聊的江湖術士，既不要臉，又不愛惜無產階級的生命……』

『佛拉底彌·列寧輸入社會主義制度到俄羅斯來……是迫不及待的從泥濘中走過。列寧，托洛茨基和一切跟隨他們走向現實之

破產去的人，顯然是確信；爲了丟臉的權利，可以牽着俄國人底鼻子走……』（註一）

以上都是出於一九一七年高爾基的手筆。社會革命黨，在內戰初起時想要暗殺布爾塞維克主義底首腦時候，就是屬目這二個人。他們對列寧開槍，打傷了他；那些恐怖主義者也在一個車站伺候，要炸毀托洛茨基乘坐的列車，但這列車偶然走另一條道路。當時的文書和著作都是把這二顆頭底合作安置在大事件底內心或頂點的。傑克沙都底布爾塞維克革命感想錄，約翰里德底震動世界十日記和季爾波底列寧真相，是關於這時代最可寶貴的記載。一九二三年，安得烈·莫里哲從莫斯科回來著的一本書，還題名做在列寧和托洛茨基國中。傑克沙都寫信阿爾伯·托馬士的信內說（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三日）：『托洛茨基操縱暴動，他就是暴動底鋼的靈魂，列寧仍是暴動底理論家。』（註二）

臨時政府于一九一七年六月舉行全線總攻擊，這是出于協約國底請求，意在緩和西線底戰事，——不幸大敗虧輸。俄國底衝鋒大隊給砲火轟碎了，大部份軍隊瓦解了。整團整師都在夏天太陽之下融化時候，打軍棍和槍斃等刑罰（以前就靠這些刑罰維持的）都無濟于事了。兵士帶着槍和子彈走回後方來，說應該停戰。彼得格勒底

衛戍軍和工廠工人，受了無政府黨所激勵，都到街上來，這是違反布爾塞維克黨人底意志的，布爾塞維克黨人認爲奪取政權機會尙未成熟。

克倫斯基還有忠實的哥薩克騎兵可供指揮，人數足夠壓平暴動之用。第二天，布爾塞維克黨被禁止存在。列寧和季諾維埃夫躲避在芬蘭海邊一座茅屋內；列寧就在那裏寫了他的國家與革命。托洛茨基則讓人捕去，冒私殺或槍斃之危險，爲的二人中至少有一個人高高負起自己的責任。于是敵人們發明了最大的毒物，最有效的毒物，來對付他們，幾乎殘害了他們，幾乎殘害了正在興起的革命。

（註一）見蘇瓦林——史大林傳一八四頁和一八五頁所徵引的。

（註二）見布爾塞維克革命感想錄第七十六頁。

楊匏安獄中遺詩

葛

在一九三〇年黨獄中，以楊匏安案爲最大，計被捕者二十餘人，就義者八人。時羅綺園臨難變節，致株連多人，但終不免一死。楊匏安從容就義，賦詩言志，令人讀之動容。詩有訓子寄妻諸篇，不知有否流傳于外，猶記其示同志詩一首，茲特錄出，免致湮滅。所謂『遲行笑褚淵』，指羅綺園也。

慷慨登車去，
餘生無足戀，
投止窮張儉，
者番成永別，
相視莫潸然！

臨難節獨全。
大敵正當前。
遲行笑褚淵。

國全及遍行分老最子牌

修 理 鐘 表

特 聘 專 門 修 理 技 師

原 牌 配 件 負 責 保 用

總 行 南 京 路 新 新 對 面 分 行 震 飛 路 華 龍 口

亨 得 利

新連環圖畫故事

木偶遊滿洲

「木偶遊滿洲」，前在兒童日報上發表，曾受讀者熱烈歡迎，現在單行本已出版，分上下兩冊，售特價兩角，由美商華盛頓印刷出版公司發行，同行現批，特別優待。

總經售 童新書店 上海海寧路 八二六弄三號

廣 告 刊 例

廣告價目均按期計算

長期廣告特別優待

廣告費須先惠

若製銅鋅版費用由刊登者付給

如需彩印或用彩紙另議

* 每期價目 *

(一) 底封面全頁兩色一百元一色八十元

(二) 底封裏面全頁八十元半頁五十元四分之一三十五元

(三) 插頁全頁五十元半頁廿五元四分之一十五元

正文末每方寸四元三寸起碼

上海萬昌和榨油廠

本廠自開辦以來，承蒙各界人士之愛護，業務日見發達。現因業務擴展，特聘請名師，不惜工本，精製各種油類，品質純正，色澤鮮明，香味芬芳，誠為烹飪之良伴。現將本廠所製之油類，分列於後，以供各界人士之參考。

萬昌和 洪油
 集豐 衡秀油
 震泰 裕秀油
 萬豐 裕秀油
 高恆 慶洪油
 楊慶 豐洪油

外埠經售

常州·北門外顧家巷本批發部
 崑山·朝陽門沿河路泰泰油坊
 蘇州·萬年橋堍王永順油坊
 無錫·北門外大橋堍泰泰油坊
 常州·西門外立市河下埠恆昌油坊
 鎮江·姚灣大昌生油號
 南京·健康路永春巷和記號
 靖樓·水北梅家壩北德泰油坊

總發行所：上海南京路九十六號
 電話：二一七四
 分發行所：蘇州、崑山、無錫、常州、鎮江、南京、靖樓